民国大写真

头号汉奸：汪精卫
半路汉奸：陈公博
汪伪股肱：周佛海
汪伪死党：褚民谊
另类女奸：陈璧君
特工汉奸：李士群







朝秦暮楚

MINGUO HANJIAN FENMO CHUNQIU

民国汉奸粉墨春秋

再现 …… 迹！

顾居◎编著

团结出版社



重启那段不堪回首的沉重记忆　揭开当年汪伪政权的神秘面纱

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汉奸名字　成为中华民族内心永远的伤痕

本书以翔实史料，细密笔触，

再现民国汉奸卖国求荣，叛国投敌的种种劣迹！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发行


建议上架：传记、文史
ISBN 978-7-5126-0340-0
9 787512 603400 >
定价：34.50元

朝秦暮楚

民国汉奸粉墨春秋

顾居◎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秦暮楚：民国汉奸粉墨春秋 / 顾居编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26-0340-0

Ⅰ.①朝… Ⅱ.①顾… Ⅲ.①汪伪政府（1938）-汉奸-史料
Ⅳ.①K820.6②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966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订：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170×230（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12 千字

版次：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26-0340-0/K.627

定价：34.50 元（平）

目 录

汪精卫

晚清秀才　负笈东瀛

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1883 年 5 月 4 日，他出生在其父任职的广东三水县衙内。父亲汪椒，字省斋，祖籍江西婺源，原籍浙江绍兴。汪省斋年轻时也曾寒窗苦读，却屡试不第。绍兴是个出师爷的地方，外出游幕的人很多，汪省斋因功名无望，就转而专攻做师爷的本领来了。清道光末年，汪携妻子卢氏取海道游幕至广东，从此就客居其地。卢氏也为浙江人，生有一子三女，长子名兆镛，后来也学习其父亲，游幕四方。1871 年，卢氏病逝，时汪省斋年近 50，续娶了一个年仅 17 岁的广东人吴氏为妾，生下三子三女。汪精卫即为吴氏所生。他在兄弟姐妹中最小，排行第十，在兄弟中排行第四。

汪椒以游幕为生，属封建时代小官吏，薪水不高，油水有限，加上家里子女众多，又要竭力保持官宦人家的体面生活，家里并不

富裕，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的母亲起早贪黑地为家务操劳，在他13岁那年就病逝了。翌年，汪父又因病去世。从此，汪兆铭就去粤北乐昌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生活。粤北山区生活比较贫困，加上大哥对他近乎苛刻的学习要求，让汪兆铭感到很不适应，常常怀念死去的父母。父母的疼爱与兄长的严厉形成极大反差，难免让他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尽管汪兆铭对其兄长貌似恭顺，内心却不免忌恨。幼年时期的这种生活环境，对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内心狭隘，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汪兆铭从小接受了严格的旧式家庭教育，他5岁就上私塾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后，父亲还督促他朗诵王阳明的《传习录》或背诵陶渊明、陆游的诗。到乐昌后，他又跟随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学者学习文史经世之学，准备走科举考试的老路子。

汪父死后，不仅兆铭的生活费用都来源于其兄长，而且整个家庭重担都落在了兆镛的肩上。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汪精卫后来回忆其这段生活，戏称自己是“子曰先生”。

参加科举考试博得功名曾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终目标，出身于书香之家的汪兆铭也没能例外地走了这条路。1901年底，汪兆铭随长兄返回广州。次年春，他与二哥兆鋐应番禺县试，兄弟俩双双考取了秀才。汪氏兄弟同为案首，踏上了仕途中的第一个阶梯，给艰难跋涉中的汪家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不幸的是，汪兆鋐考取秀才不久便去世了，而汪兆铭的三哥更在此之前就离开人世，留下了两个寡嫂和一个孤侄，汪家又一次陷入困顿。

此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知汪兆铭很有文采，就聘他为家庭

教师来教导自己的几个孩子。由于李准对汪的才华很欣赏，破例每月给他双倍薪水。

汪兆铭的长兄兆镛早在1889年就考取了举人，后来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府里做幕僚，在广东也算是个有名气的人物。他也曾想沿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但考试总是不顺，他也就遵循其父亲的老路，游幕四方了，最后迁居澳门，潜心著述。1939年汪精卫筹组伪政权时，曾请他在广东任职，遭到他的拒绝。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由于清廷的奖励措施，1903年以后留学生的人数激增，尤其是留日学生人数最为庞大。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被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仅仅二三十年就富强起来的事实震撼，日本改革的道路有力地吸引着中国的有志之士；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由于各种有利因素，中国当时出现了一个留日高潮，有志青年都以留学日本为时尚。其中既有官费留学，也有自费留学；既有富家子弟，也不乏清贫学子。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个数目的资助金还是比较高的，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得到消息后，极为兴奋，当即前去报名考试。结果令人喜出望外，他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同时被录取

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同年9月，汪兆铭等人夹杂在一艘小轮船的三等舱的乘客中，漂洋过海，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

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书籍中介绍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逐渐发生了转变，思想已经趋向革命。他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决心走一条与其祖辈所不同的道路。

当然，汪兆铭革命思想的确立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汪在国内时有反清思想，但还未接触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留学初期，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改良主义两者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他一度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存有好感，曾经专程拜访居住在日本的改良派主将梁启超未晤。他还特别崇拜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和胜海舟，每次逛书店的时候总要搜索与这两人有关的著作，去逛公园的时候，也尽量眺望着两人的铜像。汪兆铭如此崇拜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对君主立宪、对日本的整个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盲目崇拜，这和他后来成为近代史上的最大汉奸不无关系。

入同盟会　锋芒毕露

汪兆铭的趋向革命更是受了留日学生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东京成了留学生和民主革命家活动的大本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人都曾在东京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并组建革命团体。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团体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诸如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孙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在海外华人中有着强大的感召力；黄兴则身材魁梧，性格豪放，也很为留学生们敬仰。

1905年夏，留学生中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从欧洲重返日本。7月下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怀着兴奋和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对有一批青年学生赞成革命感到很高兴，他愉快地同大家畅谈，要他们组织起来，用革命的方法，建立民主共和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让中国早日跃居世界强国之林。孙中山先生的讲话打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汪当即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这次会见给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件事我一生不能忘怀，就是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先生。

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任。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

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并没有见过面。经过一番交谈，两位革命巨星最终决定联合。同日，孙中山主持了同盟会筹备会，汪兆铭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首先“立誓约”，然后由孙中山领着他们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并教以各种联络暗号。会议最后决定推举黄兴、陈天华、汪兆铭等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的章程。

经过短短20天的筹备工作，8月20日100多名革命党人在东京赤坂区霞关日本众议院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被选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部长，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则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这时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评议部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院，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汪兆铭能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说明他在留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也说明孙中山对他很器重。那时汪兆铭才22岁。

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预示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而此时自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仍念念不忘光绪皇帝对自己的“恩典”，他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维新变法，在国内外也拥有不少读者，迷惑了一部分留学生的思想。因此，同盟会在成立不久便也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报》，以批判康、梁的理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扫清障碍。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精卫”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炎帝的女儿，她游东海淹死后变为

精卫鸟，经常衔西山的木头石块去填东海。后人用“精卫填海”来比喻一个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汪以此作为笔名表明他誓死革命的决心。

汪精卫遵循孙中山的旨意，奋笔疾书，在《民报》的第一到第十三号上，连续发表了14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对清廷的黑暗统治和满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进行揭露，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制度，鼓吹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报》第14期以后，汪精卫因赴南洋，发稿中断。返回日本后，他又积极投入战斗，前后发稿30余篇，是《民报》所有主笔中撰稿最多的一人。而且他的文章颇为精彩，深受青年读者欢迎。这样，汪精卫由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变成名噪一时的革命者。

汪精卫在《民报》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卓越的宣传鼓动才能，使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清政府摄于《民报》的宣传威力，在该报创刊一周年后，发出通缉令，重金悬赏收买汪精卫的人头。这可吓坏了此时正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处当幕僚的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他不光为弟弟的性命担忧，也为他自己的前途和家庭命运担忧。果不其然，一天，岑故意借着酒意要汪兆镛把弟弟交出来，否则就对他不客气了。汪精卫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避免连累兄长与家庭，于1906年以“家庭罪人”落款给长兄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原来，汪临来日本之前，其长兄按照当地传统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这场婚事完全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基础。

汪兆镛接到信后，便写了一封“驱逐逆弟永离家门”的状子递送番禺县府存档，同时与刘家商量解除了婚约。汪精卫的做法受到了革命党人的支持和赞扬，汪也引以为荣。

在与《民报》的论战中，宣扬保皇立宪主张的《新民丛报》终于招架不住，败下阵来。该报主笔梁启超曾找人疏通，并与汪精卫拉老乡关系，以求自保。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都不同意，直到 1907 年《新民丛报》停刊方休。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国内连续发动了几次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逮捕并引渡孙中山回国。日本西园寺内阁一面答应清政府的要求，一面催促孙中山离境。这样既应付了清政府，也不至于得罪孙中山。日本人考虑到，礼送孙出境，即使将来同盟会革命成功，中日关系也不受影响。1906 年 11 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07 年初，日本政府又“请”孙中山出国。孙中山只得偕胡汉民、汪精卫离开东京，取道香港前往法国殖民地越南。为了领导两广、云南边境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河内甘必达街 61 号设立秘密领导机关，并派人前往各地活动。汪精卫到河内不久，就奉孙中山之命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华侨建立同盟会分会，筹款以发动武装起义。

南洋是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那里很多华侨都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支持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汪精卫到南洋后，为了完成孙中山交代的革命任务，在当地同志的安排下四处演讲，以阐述同盟会的宗旨，鼓动更多的群众支持革命。汪口才极好，擅

长演说，演说的组织者向别人介绍汪精卫的才能时说：“在彼（汪精卫）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胡汉民也对此时的汪精卫赞叹不已：“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由此可见众人对汪精卫的仰慕，而那时汪精卫还只是一位 24 岁的青年。

患难姻缘　暂作刺客

上文已经讲过，汪精卫未去日本之前其长兄为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其长兄好友的妹妹刘文贞。刘知书达理，长得亭亭玉立。双方可以说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完全符合旧式婚姻的基本要求。唯一的遗憾就是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两人不能随便见面，谈不上有什么真实感情。汪精卫因参加反清革命而与家里断绝关系，同时宣布与刘家解除婚约后，刘文贞还是一往情深，请哥哥转告汪精卫：“不管他是不是形式上的退婚，我仍愿坚贞守候着他，决不改嫁。”刘以后果然立志实现“决不改嫁”的诺言，走出闺房，发愤读书。她中学毕业后学医，曾任广东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医道很好，名噪一时，与孕妇、孩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却终生未再婚嫁。

汪精卫在槟榔屿从事革命活动时，经常到当地华侨俱乐部小兰亭和新舞台召开演讲会。当时在听众之中有一位富商的千金，被汪

精卫那富有魅力的演说所倾倒，产生了爱慕之情。此人就是后来成为汪妻的陈璧君。陈璧君，字冰如，乳名环，原籍广东新会，1891年出生于槟榔屿的槟城，父亲陈耕基在马来亚槟榔屿从事橡胶种植兼矿业，以后逐渐成为当地富商；母亲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为人思想开放，平时喜欢阅读革命党人的报刊，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妇女。受其母亲影响，刚刚十六七岁身为中学生的陈璧君就读过汪精卫的文章，对汪的文笔和才华十分钦佩。待到讲演会场一看，没想到汪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陈对汪就由敬仰转为爱恋了。

事有凑巧，汪精卫常到同盟会槟榔屿分会会长吴世荣家商谈工作，而吴家和陈璧君家关系又十分密切，陈便经常去吴家“做客”。汪、陈几次见面以后就相识了。陈璧君一见钟情，还邀汪精卫游览了槟榔屿的名胜极乐寺。为经常接触汪精卫，陈就背着父母加入了同盟会，并专程谒见了孙中山。

陈璧君是百万富翁之女，追求她的青年不乏其人，事实上，她与其表兄梁宇皋早就定了亲，两人来往密切。但她自从认识汪精卫以后，心似乎就被汪带走了，再也没有正眼瞧过梁宇皋。陈璧君年龄虽小，但从小娇生惯养，性格任性，办事泼辣。她向父母表示要退婚。其父坚决反对，认为千金小姐不能下嫁给一个亡命之徒。恰好此时汪精卫又离开槟城前往仰光、西贡等地去了，退婚之事就拖了下来。

汪精卫在南洋东奔西跑了两三年后，于1909年又回到了东京。陈璧君听说后，也离开了槟城来到日本“留学”，汪、陈二人异地重逢，别有一番感受。但此时的汪精卫正一心忙于革命活动，所以他把陈仅仅看成“革命同志”。就在汪、陈二人的关系山重水复之时，一件轰动当时的革命壮举促成了汪陈婚姻。这就是汪一生中最

值得骄傲的资本——谋刺摄政王载沣。

文质彬彬的汪精卫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去当刺客了呢？这除了和汪本身对革命的艰苦与长期性认识不足有关，也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本来汪精卫是反对搞暗杀的。同盟会成立初期专门设有暗杀组织，黄兴和鉴湖女侠秋瑾都参加过学习，而汪精卫的头脑还算冷静，他认为整个革命事业不能靠刺杀几个政府官员来完成。然而汪精卫在南洋活动的 1907 年和 1908 年两年中，同盟会频繁举行起义，却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很多优秀会员比如徐锡麟、秋瑾等先后牺牲。多次的失败使得同盟会的会员们情绪沮丧，意志消沉。而此时的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倾向，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炳麟向孙中山发起责难，诬陷孙中山将各处捐款据为己有，要求开除孙总理之名，让黄兴当总理。这时的保皇派也趁机反攻，说革命党领导人是“远距离的革命家”，让别人去“送死”，自己则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再也沉不住气，“决心与虏酋拼命”，他认为只有采取暗杀手段，才能使清廷震动，方能使国人从“迷梦”中醒悟，才能使同盟会免遭分裂。于是汪与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方君瑛、曾醒和陈璧君等七人在东京组织了一个暗杀小团体，同时在香港也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往来于日本和香港之间，筹集款物，购买炸药，制造炸弹。胡汉民知道了他们的活动后，立刻加以劝阻，并写信告知孙中山。但此时汪精卫已决定孤注一掷，回信告诉孙中山说他拼死的决心不能挽回，并扬言如果有人阻拦他，他就以陈天华为榜样，蹈海自尽。汪精卫的话含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感情，其动机也含有杂质。但他话说了，事情后来也做了。用自己的生命去博得荣誉，这也非常人所能做到。

为了研究暗杀计划，汪精卫推掉了在香港建立的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职务，一心一意准备搞一次震惊全国的暗杀活动。他致信孙中山，说同盟会的裂痕靠口舌已不能弥缝，需要有实际行动才能让革命者重燃信心。他自忖必死，在《告南洋同志书》中说："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暗杀的思想准备已经完成，尚缺乏威力强大的炸弹。暗杀组便将此任务交给了喻培伦。喻是四川人，曾上过工业学校，也曾学过医学，懂得化学知识，而且为人聪颖，机智过人。喻经过一段时间实验终于制成了一种威力强大又便于携带的炸药，而且这种炸药很像朝鲜产的一种糖粉，在海关检查时很容易蒙混过关。至此，他们完成了暗杀的物质准备。但他们对暗杀的对象还是缺乏仔细的思考，一开始的目标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因为革命党人活动大都在南方，这两人就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障碍。但是暗杀团又认为同盟会正在这里筹备军事起义，为了不至于打草惊蛇，只好放弃这个目标。后来他们又决定刺杀慈禧的外甥端方，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大力捉拿革命党人。此时端方又奉调直隶，路上行刺是个好机会。于是汪精卫等人便决定在他北上的路上炸死他，汪、黄、喻很快到了汉口，住在革命党人孙武那里，并在大智门火车站做好了暗杀准备。哪知端方行动诡秘，突然改变了行动路径，取道上海，然后坐轮船去了天津。他们煞费苦心，却扑了个空，就把携来的炸药和铁壳等物放在孙武那里。后来，孙武就是利用他们留下来的材料自己配制炸弹，不小心引起爆炸，暴露了革命机关，革命党人才被迫提前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

汪精卫等人最后决定到北京去刺杀清廷要员。临行前，他咬破手指，以血书赠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这八字反映了

汪的革命“薪釜观”，在之前他跟吴玉章索要炸药的信中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煮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汪精卫赠胡汉民的这幅血书，胡一直保留到20世纪30年代。

1909年秋，暗杀团派黄复生先到北京做准备工作。黄复生，又名树中，与喻培伦同为四川人，时任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曾在日本学习工业，也懂得化学知识。黄进京后，在东北园租赁了一处房屋，设立机关。随后喻也携带照相器材赴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设立“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汪精卫北上到达北京后负责留守。喻、黄二人则前往东京将炸药装在背心棉套里，穿在身上带到北京。按汪精卫的计划是想炸死清政府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奕匡，但奕匡侍从如云，戒备森严，无处下手。此时他们又得知皇族载洵、载涛两贝勒从欧洲考察海军回国，便决定在火车站刺杀他们。在他们回国那天，汪精卫手里拿着一个盛满炸药的大铁壶，在前门火车站等了大半天，但车站上的红顶花翎太多，看不清哪两个才是要谋刺的目标，又只得作罢。

最后，他们决定“擒贼先擒王”，谋炸当时清廷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这个难度最大，但能最大限度地轰动全国。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满清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其时溥仪刚4岁，朝中大权全在他手上。他的住所醇亲王府在什刹海北岸，每日上朝必经什刹海附近一座名叫银锭桥的小桥。汪精卫等人遂决定在小桥上埋炸弹炸死载沣。

为此他们又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观租了一处房屋，作为临时行动地点。喻培伦、黄复生二人负责在桥下埋炸弹，汪精卫则计划躲藏在银锭桥北一条阴沟中负责引爆工作，而当时负责联络工作的就是陈璧君。为了一举成功，他们还根据陈璧君的建议，在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铺专门制作了一个能装四五十磅炸药的大铁罐，以加强炸弹的威力。

1910年4月的一个深夜，天高月黑，寒气袭人，喻、黄二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银锭桥。不料他们挖土的声音引起了四周犬吠，他们担心暴露，赶快撤回。第二天晚上他们刚刚将坑挖好，将炸弹放入坑中，但临时发现引爆的电线太短，只好返回。第三天晚上，喻、黄二人正在接电线时，忽然发现桥上有人偷看，黄大惊，立即让喻赶往清虚观通知汪精卫不要来，自己则躲在附近一棵大树后观察动静。只见一名男子提着小灯笼下桥，边照边找寻着什么。等此人走后，黄复生急忙想将铁罐提走，可是一个人提不动，只好又用土将罐和电线埋好。这时，那个提灯笼的人已经领着警察赶来，黄只好撤退。

当夜，暗杀团在东北园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以后的行动方案，决定由喻返回东京购买炸药，陈璧君回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留京观察事态发展的情况。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以为不会追查到他们的身上，因而没有取消守真照相馆，也没有撤离北京。

银锭桥下的炸弹被发现后，清廷立即派要员展开调查。经检验，发现炸药是威力强大的外国货，而盛炸药的铁罐是就近制造的土货。于是派人查问城内各家铁铺，后从鸿泰永铁铺那里得知守真照相馆曾特制了一个铁罐。案情已经真相大白，4月中旬，黄复生

在去照相馆的路上被捕，接着汪精卫也锒铛入狱。

汪精卫被捕后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供词，供词中他痛斥清廷及立宪派的立宪伎俩，并声称谋刺一事全是他一人所为。5月汪精卫被移入监狱。入狱后，他写过一首悲壮的题为《被逮口占》五言诗，诗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句当时被广为传颂、脍炙人口。

按照清政府的刑律，谋杀“太上皇”，这是肯定要拉到菜市口砍头的。但负责审判的肃亲王善耆认为，现在革命党人遍天下，杀几个革命党人不足以消灭革命，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当时清政府又正好在标榜君主立宪，需要轻判以收买人心。最后，汪、黄二人被判处永远监禁。汪精卫是很感激善耆的，事隔31年后，也就是在汪精卫当了大汉奸的1941年，他对肃王的救命之恩仍不能忘怀，他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的能免一死，也许有一种政治的作用；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孙中山及胡汉民等人得知汪被捕后，立即设法营救。陈璧君初听汪被捕，准备去北京，与清廷拼命。后来得到汪精卫改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后，立即前往新加坡和槟榔屿去筹款，并将其母亲的私产全部变卖。陈璧君到北京后，和先期到达的革命党人共同商量，几经周折，托人买通狱卒，给汪精卫捎去短信一封，内有“忍死须臾”四字，汪得到信后知道大家正设法营救他，很是欣慰和高兴，但他又很担心陈璧君在北京的安全，当即咬破手指，书“信到平安”四字，同时填了一首词来委婉倾诉他对陈璧君的爱情，感激她不远千里、冒险相救。据汪精卫后来回忆说，陈手书“忍死须臾”字条被汪吞咽吃下了。此事一度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汪和陈的

爱情在患难之中得到了升华。

至于如何营救汪精卫，众人一时还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陈璧君情急之下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了挖地道劫狱的办法，但这根本办不到。就在他们还在北京一筹莫展时，胡汉民来信传达孙中山最近讲话的精神，号召他们回去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他们认为这才是救出汪精卫最根本的办法。事实果然如孙中山先生预料的一样，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继而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形势急速发展，清廷统治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危局，清廷一方面起用袁世凯，准备以武力镇压革命；另一方面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全国人民的反抗情绪。11 月初，清廷签署文件释放汪精卫、黄复生等人。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在上海完婚，随后又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在婚礼上称汪、陈为“患难姻缘”。

革命党中的妥协派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武昌起义后，清廷将汪精卫等人开释，并说要将其差往广东。事实上汪并没有回广东，他出狱后直接住进了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以静观时局变化。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的南方已经是革命旌旗遍天下，而北方却由袁把持大权，与南方对峙。当时，革命党人中长期

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汉人当了总统，不管谁来当，都算革命成功。那么谁来当大总统最合适呢？同盟会内普遍认为只要袁世凯逼迫满清皇帝退位，赞同共和政体，就可以推举他为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也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向袁表示，将来大功告成，袁当总统为“首选”。孙中山也希望兵不血刃地结束战争，并表示并不看重自己的权位。

汪精卫的看法与党内大多数人意见一致。于是，在革命党部分领导人的默许下，待在北京的汪成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络人。1911 年 11 月中旬袁世凯出山之后不久即召见了汪精卫。汪鼓动袁起来反满，建立共和。袁装出同情革命的样子，并表示愿意结识像汪这样的的革命党人。袁得知自己的心腹谋士杨度和汪精卫是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科的同学后，便要杨利用这一关系和汪联系。11 月 15 日，汪精卫与杨度在天津成立“国事共济会”，该会主旨在于要求南北双方停战，组织临时国民议会，解决君主民主问题。在成立宣言中，他们宣称若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必将招致外人瓜分或引起内乱。汪企图调和南北矛盾，遭到革命党人的指责和批判，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的同盟会喉舌《民主报》就发表《无聊之共济会》的社论，批评汪说：“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国事共济会成立 20 余天，不得不宣布解散。

国事共济会后，汪精卫又由北京到上海参加革命党人和清廷之间的南北议和。其实此次南下他是受了袁世凯的委派作为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的参赞而来的，并非受到南方革命党人的邀请。但是他到达上海后，由于他在同盟会中的声望，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并被任命为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这样一来，汪精卫一身二

任，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

正在南北双方议和进行期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抵达上海，被各省革命党人一致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心想当大总统的袁世凯听到此消息后暴跳如雷，指责南方不该选举总统。当时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妥协思想占了上风，甚至连黄兴都主张“化敌为友”，害怕袁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那样为清室出力，搞垮革命。此时汪精卫利用革命党内部浓厚的妥协空气，一面肉麻地吹捧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一面竭力地劝说革命党人让权，甚至向孙中山施压：“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党内外各种压力下，孙中山只得让步，表示如果清帝宣布退位，实施共和，他就正式解职，将政权交给袁。经过孙中山一再保证后，袁终于加紧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次日，袁即通电表示拥护共和。孙中山也于当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为临时大总统。15 日，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袁欣然接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野心家袁世凯所篡夺。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初期的妥协活动还不止这些。1911 年底到 1912 年初的时候，北方的革命党几次在通州和滦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汪精卫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阻止。他说，现在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的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当北方革命党人向汪精卫指出，停战范围不包括以上地区，而且袁仍然逮捕枪杀革命同志的时候，汪对袁的罪行辩解道：“项城（袁世凯）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此轨外行动。”而且当袁以党人起义责问汪时，他竟然让袁依法办理。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他电请

汪精卫入京当高等顾问，但汪推辞不就任。原来，当时在革命党人中流传着一种“耻于为官”的清高思想。孙中山、黄兴等都受此思潮影响。袁就任总统后，孙中山就表示十年内不参预政治，以悉心从事民主主义的铁路事业。黄兴后来通电讨袁时说：“袁氏一去，兴即解甲归农，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存权利思想，神明弃之。”汪精卫应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时，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同盟会成员组成临时政府。他也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做官，不做议员”的承诺，于1912年秋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1913年3月，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起举起了反袁的旗帜，决定武力讨袁。这就是历史上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召，从法国紧急回国。但是他并不主张讨伐，而是以调解人自居，同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张謇等人拉关系，谋求所谓“稳定统一”。表面上袁对汪的调解加以赞赏，实际上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先后罢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的职务。

袁世凯杀气腾腾，革命党人被迫应战。但是，革命党人的武装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南京陷落，标志着“二次革命”的失败。之后，孙中山被污蔑为“破坏民国”的罪人，遭到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汪精卫则被袁称为“精卫达者”，邀请他北上，但是汪精卫还是决定追随孙中山，先去了日本，后来又去了法国。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旋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1915年底，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皇帝。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讨袁运动，有人也称这次运动为“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召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的这次复辟，不光遭到革命党人的一致反对，连原来拥护袁的梁启超等人也表示反对，甚至袁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和王世珍等人也阳奉阴违，这一切导致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6月6日急病而死。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表明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君主制在中国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但是这次运动尽管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组建的国民党并没有取得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段上台后，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为此，1917年9月，孙中山先生又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借助南方军阀力量进行反段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汪精卫出任政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处理党务和军务。1920年11月，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时，汪精卫出任军政府最高顾问和广东教育会长，这是汪第一次出任“政府官吏”。不料事变突起，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汪精卫随孙中山退避上海。

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和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

孙中山身边他最信赖的三个人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都是书生，没有优秀的军事将领。于是，孙中山开始着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向俄国学习成为时代新思潮。1921年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就在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这使处于绝望之中的孙中山找到了光明的出路，决定联俄联共，并要求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

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汪精卫开始是有疑虑的。汪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就像孙行者跳进白骨精的肚内翻跟斗，这如何了得。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明确而坚定，汪精卫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转而表示拥护孙中山的这一决定。1922年9月，孙中山指定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人员，汪精卫也在其中。同年10月，孙中山又任命汪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参与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接着，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汪被指派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参与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2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汪精卫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还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会上，有代表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汪精卫与廖仲恺等人站在一起，责问反对者：“过去吴稚晖、李石曾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党都能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党员，又为什么不能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这场争论，提高了汪在国民党中的威信，也取得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感。

在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7月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孙中山任主席，汪为委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中央核心领导工作。

“一大”后，随着孙中山在党内外地位的加强，汪精卫对孙中山也越来越表现出了忠实的样子。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驱逐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冯玉祥等人多次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11月中旬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离粤北上。由于积劳成疾，孙中山到达北京后一病不起，后送协和医院被诊断为肝癌。这时，汪精卫随侍在侧，为孙中山处理对外事务，接待宾客，发表谈话，俨然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次年2月20日，孙中山的病情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于是，众人就推举汪精卫、孙科（孙中山长子）、宋子文、孔祥熙四人为代表请示孙。汪精卫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于关键时期，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

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

汪精卫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哭声，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对等候在病床边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签字。”汪遂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孙吃力地在遗嘱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次日上午9时，伟大的民主革命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溘然长逝。

勉强左派　与蒋争斗

按照孙中山临终前的愿望，国民党决定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可是，由谁来担任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呢？孙中山之下，在国民党人中间，数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的希望最大。但是廖是出名的左派，被国民党右派分子视为仇敌。胡汉民在辛亥革命后曾是国民党四都督之一，孙中山北上时，又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由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胡接近国民党右派，对平定刘震寰、杨希闵武装叛乱采取软弱的立场，威信大降。加上胡生性尖酸刻薄，素来好骂人，因此国民党内对他怀有好感的人并不多。

汪精卫和廖、胡二人不同。他言必讲联俄联共，口不离改组精神，且又善于调和，因此既为国民党左派支持，又避免了与国民党右派的敌对。同时，他处事圆滑，为人虚伪，一般人对他并无恶感。这样，1925年7月初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执全会上，与会11名委员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汪精卫也担任了主席。汪精卫跃居高位，显赫一时，成了广东政坛的中心人物。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存在派系之分。孙中山在世之日，各派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逝世后，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这

一政策，胡汉民是其代表人物，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汪精卫终于败下阵来。

事情得从处理“廖案”说起。1925 年 8 月，廖仲恺在国民党党部大门前被右派分子刺杀。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刺杀廖的凶手。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显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此时，汪的内心十分矛盾。他认为，对于此案，胡汉民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于是只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苏联考察。他以为这样既可以去掉政治上的一个竞争者，又可以避免国民党右派过于反感。不久，在汪精卫支持下，蒋介石也趁机打击粤军司令、军政部长许崇智，迫使许出走上海，蒋介石也如愿以偿，去掉了一个威胁他军权的障碍。于是，广东国民政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这就为日后蒋、汪的离合变幻埋下了种子。

“廖案”发生后不久，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反共、反广州国民政府的逆流。1925 年 11 月 23 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会议，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并采取了贬斥汪精卫、拉拢蒋介石的策略，会议的决议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对西山会议派的猖狂进攻，汪精卫进行了必要的回击。1926 年 1 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

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但是这次会议主张只开除首要分子的党籍，对其他人一律从宽处理，未能彻底制裁右派。戴季陶等人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批右派潜伏了下来，他们与国民党内的新右派勾结起来，向革命势力进行反扑。于是中山舰事件应运而生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开始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象出现，他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因此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这次事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企图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一次尝试，同时又是蒋介石向汪精卫权力的公开挑战，是国民党内蒋、汪矛盾的初次交锋。1926 年 3 月 18 日，蒋介石指使他的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时为共产党员）调派所属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又将中山舰调回广东。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污蔑共产党阴谋暴动。3 月 20 日，蒋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第二天，气愤不已的汪把几个军长召来，要求他们对蒋介石采取行动，但无人理睬，这时汪精卫才感到如果有一支听话的军队是多么重要了，但已经迟了。

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后，虽然打击了汪精卫，但也使自己陷入孤立，面临被国民党制裁的危险。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给予汪精卫以致命打击，便决定退却，他正式向汪精卫

道歉。此次事件过后，汪精卫觉得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连国民政府的军队也指挥不了，所以不久就以“迁地就医”为名，黯然隐匿。1926 年 5 月，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用这种以退为进的办法，以示对蒋介石的抗议，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左派声誉。

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 6 月 6 日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台后，立即开始着手北伐。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为了打破蒋介石大权独揽的局面，同时北伐后确实也需要有一个主持政务的人。7 月间“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7 年，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深知汪回来以后对他是不利的，但是“迎汪”呼声越来越高，他不能不假惺惺地催汪回国，并派人向汪解释中山舰事件是因为害怕不成功，所以不先告诉汪精卫，失败蒋自己负责，汪还可以自己收拾残局，是蒋对汪的一番美意，用心良苦。

收到国内发来的一份份电报，汪精卫甚是得意。1926 年 11 月下旬，他带着陈璧君急匆匆地从法国起程回国。可是行至柏林，因发高烧不得不折回巴黎。1927 年 2 月下旬，汪重新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

此时，国民党内部正处于一场激烈的争斗中。原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却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

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

从4月1日起，汪精卫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蒋介石"恳切"地向汪精卫提出，希望他不要去武汉，立刻与他们实行"分共"。对于"分共"汪并非完全不同意，他认为联俄联共为应付时代和环境的一种政策，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随之会发生变化。但汪知道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是真诚拥护自己的，他需要借助于武汉的革命力量才能重新上台。再说，中山舰事件记忆犹新，如果自己孤家寡人留在上海与蒋介石合作，今后只能成为蒋的附庸。权衡利害得失，汪决定还是先去武汉，观察一下那里的政治形势，然后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联共还是"分共"问题。最后他又向蒋介石等人表示愿意调和国共两党的关系。

汪为了履行他的所谓"负调和之责"，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两人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声称，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这个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等人的极大反感，吴稚晖当面不客气地就把他臭骂了一顿。南京方面主张，如果汪不同意"分共"就将他软禁起来。宋子文得到这个消息后，怕汪真的被扣留，他无法向武汉政府

交代，于当天夜里将他送往一艘轮船。次日，汪不辞而别离开上海赶往武汉。

汪抵达汉口的第二天，武汉举行欢迎大会，汪在会上登台演讲："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汪的态度博得了武汉各界民众的信任，在一片欢呼声中，他就任武汉国民党三中全会推选出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成了武汉政府的首脑人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并信誓旦旦地说还要流汗流血使革命一直往前进。可是不久，这些话的余音还没有消失，汪精卫的态度又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作了 180 度的大转弯。

7 月 14 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7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 20 次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分共"决议。8 月 1 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自此汪精卫集团开始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1924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以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

新统一。但是汪精卫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统党纪，并宣布东征讨蒋。冯玉祥慌忙跑出来调停，力劝宁汉息争。汪则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恰在此时，南京政府发生内讧，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矛盾激化。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 1927 年 8 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 8 月 12 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两天后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

南京政府内部这种纷争不安的状况，真叫汪精卫高兴，他随即发出一则“对迁都无异议”的电文，准备到南京攫取大权了。可是“宁汉合流”并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意图，相反，在这场国民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汪精卫一无所获，而且弄得四面楚歌，不得不于 1927 年底宣布隐退，随后再次去了法国。

汪精卫临去法国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劝陈也一起去法国，陈婉拒了他的劝说。汪精卫走后，陈公博伙同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人士组成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捧汪精卫为领袖，标榜恢复 1924 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提出恢复中国的民生、实现国家统一、实行全国裁军等口号，拉拢和争取一部分既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又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同蒋介石展开争夺权力的斗争。

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又重新上台。但是由于蒋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异己的政策，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政客和各地军阀的强烈不满，在反蒋的旗帜下，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国内战乱纷起，汪精卫也忙碌起来。他一面指使陈公博等人在各反蒋派军阀

中奔走串联，推波助澜；一面赶紧起程回国，坐等香港，准备亲自出马。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为了在政治上能与蒋介石南京政府抗衡，阎、冯等人想请出汪精卫做招牌，而汪也想借他们的力量打倒蒋介石，以恢复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于是平津、香港之间信使往来，鱼雁不绝，汪精卫准备随时北上参加反蒋大合唱。7月底，汪精卫与陈璧君等人乘轮船抵津，不久又去北平，与阎锡山等人会晤。8月初，他们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汪精卫任主席。会议还推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

当北方阎、冯联军与南京蒋军鏖战于河南、山东，反蒋联盟在北平的会议开得正热闹的时候，拥兵数十万、徘徊于关外的张学良正观望局势。南京、北平双方都派代表到沈阳，想争取张学良站到自己一方，以击败对手。9月19日，张学良倒向南京方面，东北军入关，阎、冯联军腹背受敌。第二天，北平国民政府才开张十天，就不得不向太原搬家，名存实亡了。汪精卫作为会议的首脑，也经石家庄而去太原。不久，汪带了陈璧君连夜离开了太原，在天津一个工人家里秘密住了几天，又化装逃到了香港。

这次"问鼎"失败之后，正当汪精卫百无聊赖之时，国民党政潮又起。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这样，胡汉民影响之下的粤方势力拥护汪精卫为首领，组成广州国民政府，并准备兴兵讨蒋，宁粤冲突一触即发。

正在此时，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各阶层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中国主权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唯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还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31 年 10 月，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经过数天的会谈，粤方提出三项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国民政府取消。三、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

在粤方的强烈要求之下，蒋介石只好再次下野。蒋介石在下台之前，进行了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一是拉汪，争取与汪再次合作，以摆脱困境；二是为东山再起做准备。

首先，蒋介石利用汪精卫和粤方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令宋子文去拉汪，宋子文对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头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汪精卫权衡了利弊以后，就被蒋介石拉过去了。

同时，蒋介石在其他的许多方面也做了一番布置。蒋介石走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孙科可谓独木难支，他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财务问题；二是外交问题。宋子文设下陷阱，无人敢当财政部长，当时南京周围几省都控制在蒋介石手中，东北又沦陷，财政收入减少，每月只有 600 万元，仅军需就要 1800 万元，何应钦天天要军费，孙科毫无办法。对日外交当时也是关键问题之一，孙科命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早日收复失地。

日本已经决心在中国东南发动进攻，驻于长江中的日军扬言一有事态就向南京开炮。

孙科支持不住，1932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不久，又爆发了让孙科更难于处理的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18日，日本借口本国僧人在上海被打死，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最后通牒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战斗打响后，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主动要求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1月底，蒋、汪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这次会议改组了南京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则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汪再次进行合作，达到了“汪主政、蒋主军”的目的。

对日妥协　低调领唱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坚持用交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为了掩盖蒋、汪对日妥协的政策，汪精卫发表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好像把抵抗放到交涉的前面，事实上，他所言的抵抗都是为

了交涉，为了贯彻他们的对日妥协政策。

其实蒋、汪从淞沪抗战一开始，就生怕事态扩大，不但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反而对其加以限制约束。1月31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说：“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何还致电蔡廷锴等人，要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2月中旬，汪精卫在徐州发表讲话，要“在野的勿唱高调”，说中国现有军备与日本相比“等于弓箭与机枪”，如果贸然与日本宣战，“必将演成义和团第二”。汪的这番话完全是一派失败主义的论调。

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双方谈判于3月间在英国领事馆内举行。经过几番协商后，于5月5日，由汪精卫派出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汪在此之前不久还曾经唱高调，说什么无论日本如何威胁，政府也决不签订任何有损国家权益的条约。可是，时隔不到一个月，就签署了这个协定，实在可悲可耻。

《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共有五条，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三条却规定日本可以在上述地区驻军。如此丧权辱国，当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的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冒不韪，居之不疑”，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但汪精卫一意孤行。1933年初，日本侵占了热河省以后，又进兵长城各口，向河北伸出了魔爪。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还在那里鼓吹他的“抵抗与交涉同时实行之方针”。5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

在日寇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汪精卫在1935年初还大谈什么对日亲善外交，居然说什么中日两国之间"现在发生的纠纷，终归是可以用双方的诚意来解决的。"汪精卫硬把中日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敌对斗争，说成是两国的纠纷，与其说他是痴人说梦，不如说是由于他的软骨病而发出的胡话。

就在汪精卫、蒋介石大谈对日亲善，联名通令禁止排日的时候，日本却加快了侵华的步伐。1935年6月，日本人又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求中央军撤出华北五省，召回南京方面任命的五省官员。如此狂妄要挟，等于逼迫中国投降的最后通牒。蒋介石、汪精卫竟然答应日方要求，除中央军暂时不撤出外，其余一概照办。由何应钦口头通知日方，但是日本方面不满足中国政府的口头承诺，还要签订一份书面协议。7月14日，何将日本人代拟的书面承诺稿电告汪精卫。次日，汪电复同意。这就是《何梅协定》。这份协定实际上让日本控制了河北省，而中国只剩下了形式上的治理权。此前不久，汪精卫还批准签订了丧权失地的《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对察哈尔省的控制权。

自从1932年1月到1935年7月，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期间，批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特别是最后两个条约，是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签订的。汪精卫口口声声要奉行"一面抵

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而在这几年中，日本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热河，并取得了察哈尔和河北两省的实际控制权。哪里谈得上什么抵抗呢？汪精卫的亲日、媚日心态已经完全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人民的谴责。

1935 年 11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六中全会，正当开幕典礼告成、全体中委摄影完毕之际，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穿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向站在第一排的头面人物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应声倒下。这时在汪精卫旁边的中央委员张继，马上将凶手抱住，凶手既开不了枪，也跑不了。汪精卫的卫士即向凶手开枪，凶手倒地。蒋介石的侍卫和宪兵警察及时赶到，一时现场混乱。

这时的汪精卫，斜躺在地上，脸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也全浸透着血污。他的老婆陈璧君屈首着一条腿跪在汪的身旁，把着他左手的脉搏。她的声调带着哭腔：“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似乎在和汪作最后的诀别。蒋介石未参加摄影，这时闻声赶来，也屈着一条腿把着汪的右手，只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陈璧君以为蒋不参加摄影，事出有因，毫不客气地对蒋说：“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

蒋介石这时也吃不准是否他手下的特务干的，他气急败坏地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你们每月花了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幕后的）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

事后调查的结果表明，刺杀汪精卫并不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刺客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排长，因不满蒋、汪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于 1934 年 10 月参加了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一个暗杀团。

他原来的目标是要杀蒋介石，因为蒋没有到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

汪精卫经过医院抢救，脱离危险。他身中三枪，两中要害，一在左颊，一在背肋骨间。当时手术中未曾取出而留在背肋骨的一弹，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以后正是这粒子弹要了他的性命。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1935 年 12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上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汪精卫出国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浪潮逐渐高涨，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也随形势而激化。汪虽在国外，但是通过陈璧君等人的函电往来，对情况了如指掌。当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之时，汪精卫在国外就坐不住了，急于回来，陈璧君劝他忍耐一段时间。她认为，蒋介石如果要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如果蒋继续对日妥协议和，必然引起国人反对，到那个时候，汪再来收拾时局。如果汪现在回来就捞不到这些好处了。此时，汪精卫眼中的汪、蒋矛盾已经离开了民族大义，着眼点完全在谋取个人的权位上了。

正当陈璧君和汪派人物为汪精卫归来的时机做选择的时候，1936 年 12 月 12 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前来督促他们和红军作战的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逼迫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的主张。这是汪精卫或蒋介石都预料不到的。南京中枢一时

无人主政。陈璧君等以为时机到了，即使张、杨不杀蒋介石，而何应钦等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恐怕也难以生还，即使得以生还，也已经是威信扫地。陈璧君于 12 日、13 日，即西安事变的当天和第二天，连续给汪精卫发去了四个电报，劝汪立即回国。

为了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汪精卫立即起程回国。在意大利热那亚等船的时候，他召集了中国驻德、英、法、意等国大使商讨了事变后的时局及对外政策。在途中他还发表通电赞成讨伐张、杨。

正当汪精卫踌躇满志地到达新加坡的时候，西安事变已获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容纳各党各派抗日的条件后回到南京。这一消息无异于一盆冷水浇在了汪的身上，使他一下冷了半截。取蒋而代之的美梦破灭了。但此时他的行程已经为国人知晓，再退回欧洲已经不可能了。

汪精卫回国后，国共双方的战争事实上已经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原属汪派的中下层干部也感到形势逼人，再弹反共的老调，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汪刚到南京，陈公博就到汪宅去向他汇报国内的政治形势，免得他被动孤立，成为碰壁苍蝇。但是汪精卫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媚日、反共的立场。1937 年 1 月，汪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发表讲话，竟然还说："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活现出他是一个媚日反共的顽固派。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突然获悉事变消息，蒋介石立即找来有关人员研究，进行军事部署。此时，蒋已经感到不抗战就没有出路，唯有高喊抗战，才能领导民众，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1937 年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下旬蒋介石离开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汪精卫继续举行谈话会。他在7月29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从表面上看是拥护和支持蒋介石17日的讲话，实际上受媚日、恐日思想主导的他所呼吁的抗战却没有给人以胜利的希望。他说抗战就是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在这里赤裸裸地宣扬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毁灭论，他所谓的"最后关头"的抗战，就是自我毁灭，那么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实际上是利用抗战的言论来反对抗战，继续宣扬他的妥协主义。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淞沪抗战开始，这次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但是，由于后来敌人迂回到了国军后面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汪精卫被日军发动的新进攻吓破了胆，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不到半年时间里，汪精卫不仅当着蒋介石的面"进言和平"，而且还为此事给蒋介石写了十几封信。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一致，汪精卫就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渐渐组成了一个小

团体，他们认为所谓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只是“唱高调”。胡适一度也是该组织成员之一，为这个主张“抗战低调”的团体取了一个名字“低调俱乐部”。1938年底，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赴任前他说，“仗是打一个时期为好，不必再主和议，打了一个时期再说”，此后便和“低调俱乐部”脱离了关系。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设有地下室，可作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防空洞，西流湾8号因而成为“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据点。周佛海原是蒋介石亲信，因这层关系，与汪精卫有很深的矛盾。1937年1月，周佛海代表国民党迎接回国的汪精卫时，通过长时间交谈，发现了彼此在对待中共及日本问题上的共同点，慢慢密切起来。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就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

唱低调主张妥协和平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么几个人，他们代表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人。当时调子唱得最低的要数汪夫人陈璧君，她甚至说：“能够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陈璧君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理由过问东北五省的事，因为“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五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不仅心安理得地承认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而且把热河、察哈尔两省也都奉送了。

和运魁首　逃离重庆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他们就想改变策略，运用政治手段，在军事压力下逼迫中国投降，以便实现其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1937 年 10 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进行“劝和”活动。10 月 30 日，陶德曼会见国民政府外交部负责人，传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从中联系的意向。

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是因为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国是稀土供应大国，德国的军事武器制造所需稀土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聘用 30 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只好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能够接受。

德国释放出愿意居中调停信号的第二天，汪精卫、何应钦与陶德曼以共进晚餐为名会面。据相关当事人回忆，这天晚上，汪与陶德曼“另坐一隅，款款深谈”，临别前他又邀请陶日后赴宴，“用意尤为明显”。

1937 年 11 月 5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转达了

日方的议和条件：1、内蒙成立自治政府；2、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3、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4、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5、减低日货关税；6、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蒋介石对抗战本来也不是太积极，他也希望在不妨碍自己统治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来解决战事。12月2日，蒋介石向陶德曼表示“日本所提各点，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日本这些条件已经够苛刻的了，而且避而不谈撤军问题。可汪精卫得知蒋的态度后，认为“和平有望”，“相当兴奋”，他也卖力地从旁推波助澜。

12月5日，汪精卫迫不及待地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次日，汪精卫又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

但是，日本并非真想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所谓“和谈”，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这笔秘密交易还没有来得及成交，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1. 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2. 承认“满洲国”；3. 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本人要求国民政府必须于年内答复。条件十分苛刻，态度极为蛮横，这分明要中国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向日本投降。蒋介石认为如果同意了这些条件，他的政府就会给舆论的浪潮冲倒，他希望日本至少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况，否则难以接受。

与蒋介石不同，汪认为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唯恐错失良机。当陶德曼继续出面斡旋、转达日方追加条件时，汪即

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议，主张接受。但是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定事实，迫使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请示过蒋，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意，他鼓动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孔祥熙回答道。汪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日本的追降条件，日本政府恼羞成怒。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与日本携手之新政权兴起。这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同时，对汪精卫加以拉拢的手段。18日，日本政府决定撤回驻华大使。20日，中国也相应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至此彻底断绝。

但是汪精卫见到日本要关闭和谈大门的时候，他急了，立即向蒋介石提出，"必须想出一条向日本打通的路线才行"。蒋尽管一方面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也想在战和问题上搞投机主义，为两国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

1938年2月，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同意下，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负责收集有关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及时向武汉国民政府报告。但高的主要任务还是恢复与日本的联系。高在到达香港之前，曾派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

董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告诉他日本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同时表示日本政坛中也有主和派，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董又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表示要“互相赤诚相见”地解决中日两国问题。董一个小小的科长，哪来这么大权力去谈判停战问题，显然是有蒋、汪作后台的。但是他也不能无所顾忌，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蒋、汪都不愿宣扬出去，他们怕舆论谴责、民众反对。

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他们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知道蒋介石骨子里也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他是被迫走抗战的路子的。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做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果然，蒋后来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

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后来，蒋介石怕高宗武往返多次泄露了秘密，遭舆论谴责，同时也怕他的活动会被汪精卫所利用，决定不再让他出去“活动”。但周佛海求和心切，认为高宗武如果不再去香港，与日本的联系就会中断，遂征得陈布雷的同意，催促高快走，并鼓励他去东京摸底。7 月 5 日，高单枪匹马潜赴东京。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据当时传出的消息和当事人事后回忆，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据影佐祯昭自传中回忆，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于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武汉。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见不到他，不知底细，十分焦急。7 月 22 日前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直到 7 月 22 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处，商谈对策。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

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的意见。他问到“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据周佛海回忆说，当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后，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不过蒋介石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运动”。不久高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进行秘密谈判。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公里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

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十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并由高宗武带回的这份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高宗武的后继者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并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的方案”。于是，日汪之间的勾结越来越紧，汪通敌的嘴脸也进一步有所暴露。

汪精卫在8月初撤退到重庆，主持政务。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前后，汪精卫对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吐露他的“肺腑之言”：“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大门。”十天之后，即在广州失陷的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提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公开向日本

求和乞降。

时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此言一出，令很多人颇感震惊。宋庆龄、何香凝等发出通电，“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对路透社公开发表主和言论，举国惶惑”，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

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爱国华侨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电报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据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中记述，当身为议长的汪精卫按惯例将提案题目向全会朗诵时，“面色突然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气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但汪精卫依然替自己顽强辩护说，“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其实汪精卫已经在投敌叛国沦为汉奸的路上越走越远了。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日本政府获悉汪精卫的决定以后，立即采取进一步的措施。1938年11月初，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

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介石下野，实际上就是让奉行投降主义的汪精卫上台。11 月 16 日，汪精卫和蒋介石一同吃饭时，劝蒋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后蒋介石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介石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1938 年 11 月 12 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密约》。协议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日本军队驻扎中国；2、承认“满洲国”；3、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4、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重光堂密约》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很明显的：把东北四省划给了日本作为殖民地，让日本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难道是一个主权国家所能接受的吗？所谓经济合作，给予方便，就是要随意掠夺我国资源；所谓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更是一种极端虚伪的可恶的鬼蜮伎俩，按照这一协议中国或半个中国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哪里还需要什么租界和治外法权呢？所谓不要战争赔偿费、和平撤军也完全是一个骗局，这已经为日本人后来的实际行动所证明。

关于汪精卫如何逃离重庆，双方草拟了详细的行动时间表。预定汪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日本将于12日发表近卫声明。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一连开了七八次会。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刚开始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先去昆明，12月8日，汪精卫抓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

当时从抗战后方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由重庆飞香港，很便捷，但太冒险；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图北上。后一条路比较安全，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才好行事。龙云是地方实力派，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抗战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至西南后，他深感云南这块地盘有被吃掉的危险，因此与蒋介石矛盾进一步加深。汪精卫洞悉此中情况，对龙云极力拉拢。1938年，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到昆明见了龙云，谈到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力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陈边说边哭，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

处得了这颗定心丸，所以这次汪精卫等决定取道昆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走法。成群结队走，必然引人生疑，他们商定以分散出逃为宜：周佛海以视察宣传抗战的名义先去，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而汪精卫则托词要赴各地作抗战演讲。同时，陈公博也将自成都飞昆明与汪会和。

离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汪宅的行动更加诡秘。11 月下旬，汪宅显得特别忙碌，他们有的清理东西，有的把书籍文件装进了刻有"双照楼"三字的箱子里。为了便于行动，汪精卫又把康泽派给他作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将雇用的老妈子遣散。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汪等少数人之外，连同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也没有通知汪派骨干。

在汪方准备的同时，日本方面也按照重光堂拟定的计划开始活动。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近卫将于 11 日晚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讲，并向全国广播，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对华"新政策"。

不料，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12 月 7 日，蒋介石突然从外地回到重庆，这无意中把他们的叛逃计划打乱了。汪一时无法脱身，还以为以前的行动已经暴露，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12 日那天，他身穿平时很少穿的藏青色中山装，出席蒋介石在重庆行营纪念周的讲演会。

汪精卫不能按时到达，让已经到达昆明的周佛海受了一场虚惊。当他探听到蒋介石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时，周才惊魂稍定。

由于汪精卫不能如期逃离重庆，日本主子也被搞得很被动。按计划，近卫 11 日的广播演说，只好以患病为理由，推迟到 14 日。到了那一天，汪还在重庆，近卫无奈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

回到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是否有投降诚意。

16日晚，汪精卫让人先将金银软细、日常生活用品、重要的书籍和公文秘密送往昆明。

17日上午，汪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写信，阐述他逃离重庆的理由。信封上写着“请陈布雷先生转交”等字样，放在卧室里的桌子上，等日后军统特务来索取。

汪精卫在重庆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熬过了十天，才找到脱逃的机会。18日，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正好乘机出奔。

18日凌晨5点多，汪精卫、陈璧君和汪的秘书曾仲鸣等七人在阴暗的地下室对出逃做了最后一次研究。8时，他们分乘两辆汽车先后抵达重庆机场。机场上虽然军统特务密布，对乘客严格检查，但对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一行，他们可没有这个胆子。谁知登上飞机，汪还没坐稳，忽然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飞机上，汪又是一惊，心想是不是蒋介石派他来监视他们。周至柔见是汪精卫，赶紧起身问候，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先生应云南龙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曾仲鸣也对汪低声说了对周的怀疑。

飞机航行约15分钟时，周至柔忽然心血来潮，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向汪主席作汇报表演！”说罢，走进驾驶室，亲自驾驶飞机。

顿时，汪一伙吓得心惊肉跳，他们以为周要将飞机开回重庆。曾仲鸣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递给卫士，要他们密切关注周，一旦周将飞机转向，立即将其拿下。约又过了20分钟，陈璧君透过飞机舷窗往下一看，以为地面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道：“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卫士们顿时做出掏抢的动

作。这时，飞机驾驶员哈哈大笑，说："是陀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汪曾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与昆明，他往下仔细观察，说道："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又是一场虚惊。

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笑着对汪精卫说："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周的举动，把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很不痛快，强装笑脸说："完全合格，完全合格。"

飞机终于到达昆明上空，在机场上盘旋一周，开始下降。这时，汪往下一看，又吓一大跳，只见龙云率领了省政府各厅、署、局长等文武大员，到机场相迎，而且军乐大作，到处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汪甚疑惑，龙云明知他是秘密出走的，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欢迎仪式？这龙云玩的什么把戏？

原来，汪事先派人电告龙云，只许他一人来接，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人；而龙云怕自己一人来接，会给人留下他事先是知道汪要借路溜走的把柄，将来在蒋介石面前不好交代，才布置了这样一个"热烈欢迎"的局面。

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场面，大为不满，害怕阴谋暴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膊时有间歇"，身体不适，拒不见客。龙云请汪在昆明多住几日，但汪认为留在昆明危险，怕夜长梦多，要求愈早愈快离开昆明为好。

1938 年 12 月 19 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及副官等十余人，乘上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专机，仓皇逃往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还曾打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赴昆明因飞机"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膊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

行返渝。”第二天，陈公博也从成都赶去。这伙民族败类，就这样叛离了祖国。

河内枪声　赴日谈判

汪精卫一伙抵达河内以后，暂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可是没过几天，因发觉可疑的人在周围活动，因而又租下河内高朗街27号。为了方便“开展工作”，汪精卫留曾仲鸣在身边，派周佛海、陶希圣赴港活动，陈璧君则往来于香港河内之间进行联络。

得知汪精卫逃到河内，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欣喜异常，认为中国的抗日阵线已经出现最大的裂痕，并以此推测重庆抗日阵营正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幌子下，提出：1. 中国放弃抗日，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2. 日军在指定地区驻兵；3. 中日提携合作，在经济利益和资源开发利用上，中国要向日本提供方便。这是个极端蛮横虚伪的声明，日本在中国进行了野蛮的战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却口口声声说“日本尊重中国主权”、“不在区区之领土、亦不在战费之赔偿”，夺了中国的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竟说不在乎“区区领土”，肆意残杀中国人民，难道还想要中国赔偿军费？真是一副奸诈的强盗嘴脸。连汪精卫都感到日本这个声明变卦了，条件加码，而撤军承诺没有了。汪此时也知道自己被狡猾的日本人耍了，但是他叛国决心已定，因此近卫声明一发表，他立即响应。

12月25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

27日，汪精卫派陈公博、陶希圣带了自己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亲笔信及响应近卫声明的电稿赴香港。29日，汪的信及其声明在改组派成员林柏生控制的《南华日报》上发表。因为该日代电韵目为"艳"，故汪精卫此次声明简称《艳电》。声明中，汪精卫公开要求重庆政府应立即以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不可再失此良机"。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还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要求：让日本人彻底轰炸重庆等，通过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

《艳电》一出笼，立即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声讨，一股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迅速席卷全国。海外华侨纷纷来电，齐声谴责汪精卫，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连汪寄予厚望的龙云等西南地方军阀，也都通电"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精卫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艳电》的发表，给蒋介石集团带来了被动。开始，蒋对汪的出逃消息，下令各报严密封锁，但汪毕竟是个著名的政界人物，隐瞒此事不但不可能，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内部的混乱。为了应付舆论，国民党新闻机关发布消息说汪因旅行昆明，旧疾复发，一时不能回渝。等到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掀起了讨汪浪潮，蒋才意识到事态严重。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但蒋对汪还留有余地，并没有因汪的叛国而下令通缉，相反，

对汪的做法表示“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深长，有较大影响，何况留在重庆的汪派分子还有不少，深恐汪的行动会造成国民党的更大分裂。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后的一个半月，蒋介石采取了软的一手。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对汪精卫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1939 年 2 月中旬，蒋介石又派汪精卫过去的心腹谷正鼎赴河内游说。谷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并向汪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到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 50 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谷力劝汪不要有第二步行动，将来还可以与蒋取得谅解。

汪精卫一听，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

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说：“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这是几句软中带硬的话，它的潜台词是，如蒋不采纳他的主张，他还要走得更远。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谷一走，汪精卫就警告陈璧君、曾仲鸣：“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谷正鼎使命失败，使蒋介石认定对汪精卫仅仅施行规劝、诱导是无济于事的，为了根除后患，决定采用非常手段——立即找戴笠密谋，监视汪精卫的一切行动，并随时进行暗杀。戴笠接到命令后于 1939 年 1 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调兵遣将。他任命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 年 1 月 16 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 月 17 日，鼓动发表《艳电》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 月 18 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被人开枪打死；1 月 28 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

内市内的高朗街 27 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在过境时连枪都不能带。

3 月 19 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3 月 20 日上午 9 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了好几个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 月 21 日下午 4 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 日夜 11 时 40 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 4500 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 27 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做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

么也撞不开。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特务们以为目的已经达到，立刻仓皇逃跑。实际上，这天夜里住在那儿的是曾仲鸣夫妇，汪精卫夫妇则住在另外的房间。曾因为腹部中弹累累，送往医院不久便一命呜呼。

河内刺杀案件的发生，使汪精卫极为冲动，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反击。27 日，汪发表了题为《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 1936 年 12 月 6 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蒋当时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汪精卫想利用这样一个记录为自己的乞降作辩解，并借此报复蒋介石集团的暗杀行动。

汪精卫虽作了反击，但从此却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遭到不测。

1939 年 3 月 22 日，高朗街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就收到了其驻河内总领事馆的详细报告，当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键等人前往河内，将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月 6 日晚，影佐祯昭一行登上预先租定的载重 5500 吨的"北

光丸”，日夜兼程，于16日抵达河内。18日下午，影佐等人化装成旅行家在汪精卫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周隆庠的带领下，驱车前往汪宅。一番寒暄之后，即转人正题。影佐说他们此次前来是奉日本政府的命令来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地区，并询问汪计划到哪儿去。汪精卫提出去上海最为合适。他认为香港警察监视很严，连周佛海、林柏生等人在那里开展活动都很困难，他如果去了困难更大。广州由于已经被日军占领，到那里活动，会被人视为傀儡。上海虽是暗杀不断之处，但是有租界作为保护，到那里去，能体现他的“苦心”。影佐同意汪精卫的决定，并表示要协助汪立即离开河内潜赴上海。于是双方研究如何起程的问题。影佐原计划让汪精卫一行乘“北光丸”一起走，但汪不同意，他考虑到保密和舆论影响，决定自己租借一艘法国轮船去上海。

4月25日深夜，汪精卫一行十余人，在越南警卫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到海防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了一艘只有750吨的法国轮船。按预定计划，第二天将在海上与“北光丸”相会，然后一起航行到上海。但汪精卫坐的船，由于天气不好和临时加水等问题延误了几个小时才起航。加以速度较慢，出海后，始终未能与“北光丸”的无线电取得联系。影佐十分着急，在预定的那个小岛上等了半天，还是毫无消息，只好独自向海南岛方向驶去。

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直到4月29日“北光丸”的船员们才收到了汪精卫所乘轮船发来的微弱电讯。影佐得悉汪精卫的船仍安然航行，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随后电讯越来越强，两船越靠越近，终于在汕头东南方向的碣石湾相会了。影佐看到汪精卫他们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小也不安全，便建议都转移到“北光丸”上。此时，汪精卫也不考虑那么多了，立即同意搬上“北光丸”，

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使者“同舟共济”了。

“北光丸”按照预定的航线向上海方向驶去。途中，汪精卫毫无掩饰地向影佐提出要由他自己出马建立伪政权。这使影佐感到很突然，没想到汪精卫的变化来得这么快，因为离开河内前，汪还怕人家说他当汉奸做傀儡，只愿意以在野之身组织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来推行他的“和平运动”。在三四个月以前，汪还不屑与华北大汉奸王克敏、华中大汉奸梁鸿志为伍，称他们组织的政权为“伪府”。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以后，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前，他还要求日本政府“不应使伪组织响应近卫宣言”，免得与汪精卫的声明混为一谈。现在，汪精卫又改变了主意，明确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这能不叫影佐吃惊吗？至此，汪精卫终于完成了他做汉奸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已经不耻于做汉奸了。

5月6日，“北光丸”号驶达上海。尽管影佐的行动很保密，但是汪精卫将到上海的消息还是被泄漏了出去，一批新闻记者闻讯而来。为了保密与安全，第二天，汪精卫一行才悄悄上岸，由日本军车载到江湾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公馆重光堂，在日本宪兵严实的“保护”下住了下来，并与早在4月中旬由香港到达此地的周佛海、高宗武等会合。

汪精卫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东京之行，向日本政府提出自己组织伪政权的设想，以取得其支持。为此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开会研究。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

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可见，汪精卫抛出的所谓《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由他亲自出马组织“和平政府”，说白了，就是要求自己当傀儡。

对汪精卫要组织“和平政府”，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并不是都很热心的，原来他们以为汪逃出重庆后，中国的抗日阵线就会土崩瓦解，但现在眼见抗日民族战线并没有分裂，重庆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崩溃，汪精卫又没有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原先那股支持汪精卫的热情已经大大减弱了。汪精卫提出建立“统一政府”的“主动出击”也不符合日本人对中国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方针。此前，日本于 1937 年 12 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于 1938 年 4 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是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凭他那国民党元老的政治资本，在沦陷区总比王、梁二人要更有号召力，同时日方还寄希望于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打开局面。所以，日本政府还是同意汪赴日“谈判组府”。

1939 年 5 月 31 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密，汪精卫被安排

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伪政府的要求。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 年 6 月 6 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新中央政府树立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对汪政策，规定：1.“新建中央政府”必须以承认“调整日中新关系原则”为准绳，在适应日本战争全局需要时，才准予成立；2.“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4. 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这一决定和日汪“重光堂会谈”所制定的《日华协定记录》的条款相去甚远，表明日本政府希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仅仅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降日势力的大杂烩。

但是汪精卫却被蒙在鼓里。6 月 10 日，汪精卫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藏相石渡庄太郎、前首相近卫文麿会谈。这些日本首脑们，全都掩盖了五相会议方针所规定的内容，仅以形式上的“礼仪”来敷衍汪精卫，使汪得到了某些“笼统的保证和希望”。但在与陆相板垣征四郎的两次会谈中，汪精卫看到了另一副面孔，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5 日上午，汪板会谈在讨价还价之中进行。板垣一开口就说：“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这话无疑是在奚落汪精卫。因为

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而要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显然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汪精卫就得听凭日本的摆布了。汪精卫明知此意，但为了求得支持，忍气吞声地向板垣分析了重庆“要人方面”和中国军队内部的情况。他说，先从要人而言，“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因为“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只是由于交通关系和蒋介石集团的严密监视，因而要想逃出重庆，这是极为困难的事，但“有这么多数的反共和平分子留在重庆，为了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也感到有其必要”。关于军队方面，汪精卫认为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以使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因此，汪希望日本要“深刻考虑”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日本计”，应“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言下之意，是要板垣支持他建立伪政权的如意算盘。

但板垣并不理会汪精卫对日方的这种“好心”，反而毫不客气地针对其《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了种种指责。板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板垣听后反驳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听了板垣这番话，汪精卫感到大失所望。他自从重庆出逃后，

就一直吹嘘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对中国无领土要求”，现在，这位掌握军政实权的内阁陆相，却如此露骨地强调要保留日本所扶植的那些老牌傀儡政权，这不就一下戳穿了他的谎言了吗？同时，这与汪精卫自己所设想的成立一个统一的、有实际权力的“中央政府”也大相径庭。在心灰意懒中，汪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对板垣说，与临时、维新政府的关系，归根结蒂是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有把两个政府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汪企图以撒手不干来要挟板垣。

坐在一旁的影佐祯昭一听，立即打圆场说：“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如果为了收拾时局，还是赶快组织中央政府为宜。归根结底，只要研究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就行了嘛。”板垣也解释说：“不是让地方政府有大的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限。”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临时、维新两政府可以取消，但是要给予它们较大的自治权限。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国旗”问题。汪精卫认为，对“国旗”的选择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因此力主中央政府应沿用青天白日旗，而板垣却强调必须在“国旗”和“党旗”的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黄色布片，军旗用写着“反共和平”的黄色旗。板垣说：“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一贯标榜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的汪精卫，居然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这件事

在汪精卫集团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连周佛海也不满意，称这样的三角小黄旗像条“猪尾巴”。

会议临近结束时，汪精卫鼓足勇气，委婉地提出撤军的问题。板垣却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对撤军问题避而不谈，竟说：“关于具体问题，请通过影佐大佐告诉我。”对撤军这样一个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板垣却把它列入细小的具体问题，这就是日本人的诚意。其实，汪精卫已经投入敌人的营垒，还有什么资格谈撤军呢？即使成立了伪中央政府，也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还谈什么撤军呢？

汪精卫在日本前后近二十天，6月18日，他带着沉重的心情，黯然回国，结束了东京之行。周佛海受汪的委托，则留在那里，继续与日方进行交涉。

四处拉拢　粉墨登场

汪精卫日本之行结束后，按照日本主子最好去拜访王克敏、梁鸿志和吴佩孚的吩咐，他没有直接回到上海，而是绕道平津去和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原北洋军阀吴佩孚会谈组府问题。

6月27日，汪精卫在北平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官邸会见了王克敏。王对自己卖国换来的位子一向视为命根子，因此，他一开始就对汪抱有警惕。汪向他讲述了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前准备召开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政治会议问题，王假惺惺地向汪精卫表示支持。王最后转弯抹角地说：“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

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王克敏所言十分清楚，他可以考虑与汪精卫“合作”，但应该以临时政府为主体组织“中央政府”，否则就只有留在北平，以华北为小天地，还当他的地头蛇。

按原计划，汪精卫在会见王克敏之后，要和原北洋军阀吴佩孚会谈。汪还在河内的时候就和吴取得联系，有过函电往来，吴当时还是赞成汪出来搞“和运”的。哪知这个时候汪吴一开始就在会见程序和地点上发生冲突，吴不肯首先去拜访汪精卫，于是采用折中办法，约定在杉山司令部会见，但是吴以为双方都是中国人，商量的是中国的事，拒绝到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去，并坚持要汪先到他的住宅拜访。汪不答应，只好作罢。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汪精卫还一再对吴佩孚进行拉拢。同年10月，汪又写信给吴，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鉴于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更加不愿与汪同流合污，他坦率地在汪精卫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制造的汪吴合作蓝图，就这样为现实所撕破，吴佩孚也终于保全了他的晚节。

汪精卫的华北之行毫无收获，他心灰意懒地回到了上海。这时，日本政府为筹划建立、控制汪伪政权，已经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以影佐祯昭为负责人。“梅机关”开张后，考虑到汪精卫一行还住在日军直接保护下的土肥原公馆里，必然引起外界猜疑，对汪的活动不利，因此，特将沪西愚园路1136弄一幢别墅式花园洋房拨给汪精卫做公馆。6月29日上午，汪精卫就在该弄“汪公馆”接见了伪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但是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且双方搞得很不愉快。7月5日，汪精卫应梁鸿志的邀请，

到达南京与梁进行第二次会谈，梁此次更加明确地提出："新中央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汪精卫感到失望。

在这前后，汪精卫又先后拜会了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等人，乞求他们的支持。7月24日，汪精卫顶着南国盛夏的酷热，飞往广州寻求支援，企图拉拢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薛岳等人投敌，妄想依靠他们的武装力量在广州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华南政府"。汪到广州后还通过军用电台发表讲话，煽动广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反对抗战。与汪精卫的主观愿望相反，这股投敌卖国的逆流刚掀起，就遭到各方的严厉谴责，他的计划成了泡影。8月14日，汪精卫毫无收获地离开了广东，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汪精卫历来以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作招牌。现在他要成立伪中央政府了，为了使这个政府变得合法，合乎正统，他决定召开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了衔接过去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示正统，便把这次将要召开的大会定名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召开这次大会，汪精卫真是煞费苦心。

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代表的产生。在沦陷区毫无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情况下，要立即产生各省、市和海外党部代表，颇不容易。为了拼凑代表，汪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指派大小汉奸们分区招揽，为了凑足人数和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们把各自的亲戚朋友、七姑八姨都拉进去了。陈璧君就让他的两个弟弟（陈耀祖、陈昌祖）和三个侄子（陈春圃、陈国琦、陈国丰）一齐当了代表。林柏生也趁机把他所主办报社的一班同事、朋友拉了过来。有的人根本

就不是国民党员，突然就当上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真是无奇不有。即使这样拼拼凑凑，也才网罗到了240多人，和原计划的300人比，还差很多。

第二个令汪精卫、周佛海颇为费心的问题，就是大会会址选择在哪里？本来偌大个上海，想找个开会的地点是很容易的。但此次“六全大会”却非同一般，既要保卫汪精卫等汉奸头目的安全，又要保护代表们不出事故。几经磋商，决定把会议地点选在汪伪特务机关所在的极司菲尔路76号内的一幢三开两进的石库门大楼房里。

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负责大会的保卫与汪精卫的安全。为此，丁、李作了精心布置：严密封锁会议的消息，连那些“代表”们也都是进了会场才告诉他们的。会场警备特别森严，进来的“代表”，每人都必须经过搜查。开会那天，在“76号”大门外，还特地搭起了一座彩牌坊，中间用电灯缀了一个“寿”字，伪装这宅子里有人在做寿。同时还由日本人出面，与沪西意大利驻沪军司令联系，要他们派一小队意大利士兵，于当天携带机枪，荷枪实弹，驻守在“76号”对面，名为监视，实则戒护。尽管汪宅与“76号”相距很近，但丁、李仍然担心汪去开会的途中遭遇不测，决定让汪精卫在开会前一天就到这里入住，会后又晚一天离开。汪精卫虽老大不愿，又不能不迁就。于是开会前一天晚上，汪精卫带着陈春圃和几个保镖，从“汪公馆”预先搬进了“76号”，就住在李士群的房间里。但汪对丁、李并不很信任，为防止意外，汪让陈春圃搭起一张临时床铺，同他睡在一起，汪带去的几个保镖，都睡在房门外面。

8月28日上午，汪记国民党“六大”在大雨滂沱中正式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幕词，大谈他的所谓和平建国理论："建国是目的。至于抗战和平不过是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目的则无异致。"汪精卫还把这种卖国投敌的汉奸理论，说成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真是厚颜无耻！按照大会程序，下午通过了修改国民党党章的报告，并宣布了《整理党务案》。其要点为：1.自 1939,年 1 月 1 日起，重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2. 重庆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3. 宣布废除总裁制，改为主席制。据此，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而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总裁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由他出面组织伪政权。

接着，大会授权汪精卫提名"六大"中央委员名单，交大会"讨论"。在这张名单中，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于是，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发言，他刚开口还没讲两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个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的左右，丁默邨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弄得胡志宁已经到了口边的话，只好咽了下去。汪精卫见此情况马上站起来打圆场："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

汪伪"六大"宣言先是讲一通所谓中日和平，为日本的野蛮侵略涂脂抹粉，然后就是拼命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辩解。在闭幕词中，汪竟然自欺欺人地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

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这话说得太可笑了，难道日本人不到会就能说明不是傀儡吗？其实，汪精卫的活动，有哪一项没请示过日本人，哪一项没受到日本人的监视。就在汪精卫讲这话的当天，影佐的“梅机关”就派犬养毅之子犬养健找上门来质问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为什么大会组织法中，还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这一条？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日本人一发怒，汪精卫十分惶惊，急忙临时召集大会主席团开会商量对策。有人说，大会印发的文件，一部分是照过去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不能没有这一条；有的则提出，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留此一条，确系秘书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大会秘书长梅思平照此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

汪记“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结束，但在汪伪喉舌报上，却大吹大擂地说开了三天。汪精卫投敌集团就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汪伪“六大”之后，为了加快组府的步伐，汪精卫于9月19日，偕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前往南京，同他们曾经攻击过的“没有灵魂的傀儡”、老牌汉奸头子王克敏、梁鸿志就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等问题进行正式会谈。这次会谈就是一次权力的再瓜分，是在汪精卫的主持下进行的。会议一开始，汪开门见山就要求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王、梁二人表示支持。可是当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

两个文件给他们看后，他们就转变态度了。原来，政治会议暂定的24—30名委员中，作为“社会重要人士”参加的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额只占6人。特别是《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规定对华北不给予行政权，只给处理华北“剿共”、地方绥靖、经济建设之权，连政务委员也要由中央派遣，这更使王克敏不高兴。于是，王、梁二人借口因为没有从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机关接到任何关于汪的提案的通知，所以无法答允参加中央政治会议。至于组织伪中央政府一事，王克敏干脆说：“这件事我们三人商量没用，这件事要他们商量好了，也就可以做了。”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王、梁、汪背后的日本主子。这既反映了临时、维新政府头目不愿意被汪精卫集团吞并的心情，也说明南京会谈的实质，只是一次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地地道道的傀儡会议。

就在这一天，日本方面在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邸内，也会集了山田乙三司令官、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樋口季一郎、影佐祯昭以及日本华中派遣军联络部长原田熊吉等人，他们正在研究汪、王、梁三方会谈的对策。特地从东京赶来的樋口对他们转达了阿部首相支持汪精卫的意向。原来，这时日本政坛刚刚变动，“素以同情汪精卫著称”的阿部信行大将上台组阁。阿部上台后没几天，欧洲大陆已硝烟滚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为摆脱其陷于中国长期抗战中的困境，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正在制定其一手扶汪精卫上台，一手拉蒋介石投降，促使蒋、汪合流的政策。然而，重庆蒋介石集团又不愿按日方所提的条件谈和，阿部面对困难局面，只好采取“现实主义”政策。9月13日，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声称将努力支持汪伪中央政府的成立。为此，樋口奉命到南京向驻华日军头目作了传达。

第二天上午，影佐、原田和刚从东京回来的喜多，参加了汪、王、梁会谈，影佐在会上宣布了阿部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的意向。汪听了，大受鼓舞，以为日方既有如此决定，会谈一定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

但谁知到了晚上9点钟，王克敏、梁鸿志匆匆忙忙跑来找到汪精卫：“我们对中央政治会议人事、人数分配和国旗等议题，都不同意。”王克敏还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意见，这是喜多、原田的意见。”何以阿部内阁表示支持的事，喜多、原田却要加以反对？原来，日本侵略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军队之间充满了矛盾，对上司的指示，凡不符合自己需要的，照样可以置之不理，各行其是。

王克敏、梁鸿志这一桶冷水浇到汪精卫的头上，使汪冷了半截，还有什么可谈呢？他准备立即结束会议，第二天返回上海。这时，周佛海又钻了出来，第二天一清早，他急忙去找影佐，把王、梁的意见和汪精卫的态度告诉了影佐。影佐狡黠地说：“喜多、原田昨晚喝醉了酒，他们的话不可当真。”于是，周又兴冲冲地将影佐的话报告了汪精卫。汪转忧为喜，取消了回沪的决定，与王、梁继续会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名额分配上做了些让步，9月21日，“三巨头”才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要点如下：1.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建中央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的主要项目，以汪精卫的提案为基础；2. 政府建立后，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担当议政。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所准备的条例为草案，王克敏、梁鸿志努力做到不加修正通过；3. 中央政治会议名额的分配，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维新政府占三分之一，其余三

分之一分配给伪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4. 中央政治会议的议决方法，重要的事须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的事，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决定。5. 在中央政治会议中应讨论的政府名称、首都位置、国旗问题等重要事项，事先须充分协商，以便会议中尽量做到全体一致通过。

上述《决定事项》只规定了一些原则上的条文，没有解决具体的实质性的问题。于是后来又有了所谓“三巨头”青岛会议。青岛会议是在“梅机关”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进行的。经过周密的策划，1940 年 1 月 19 日，汪精卫致电王克敏、梁鸿志，邀请他们赴青岛进行会谈，讨论“国家大计”。为了安全起见，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奉命带了“76 号”几名特务当保镖，先于汪精卫到达青岛，检查、布置安全措施。1 月 21 日清晨，汪精卫偕同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罗君强等人，在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萩那华雄等日人陪同下，登上“奉天丸”离沪，于翌日下午三时抵达青岛。这时，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以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等人都先后赶到这里聚集。这是一次群奸大集会。

会议从 1 月 24 号至 26 日，开了三天。第一天，他们就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实这都是日本人已经同意过了的。会议后两天讨论伪中央政府的人事组织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责等问题，结果是基本保留了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种种权力，大小头目很少更改；维新政府的头头，也都尽量照顾，做到各得其所。

这次青岛会议之所以比南京会谈进行得顺利，原因在于会议是由影佐祯昭等日本人亲自策划并参加指挥的。王克敏和梁鸿志等人

不得不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

在南京会议之后，至青岛会议前夕，汪精卫与日本政府就“调整日华新关系”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这个密约的签订为青岛会议的召开，为伪中央政府的组建提供了保证。早在1938年重光堂会谈之后，日本就经常讨论关于调整中日关系条约的具体内容。1939年9月汪、王、梁南京会谈以后，汪伪政权的成立已经成为现实，于是这年10月，日本侵华机构兴亚院借口“和平政府成立，为中日两国间缔结条约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与汪谈判的具体方案。这是一个十分具体、条件苛刻的灭华方案。这个方案要求的条件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包括了过去维新、临时两伪政权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全部内容，而且更甚于该年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作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参加这次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方提出的条件，所包含的区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务，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兴亚院的方案，赤裸裸地反映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意图。

10月初，当日本军部的堀场一雄带着兴亚院的方案，来到上海与“梅机关”商量，影佐祯昭看了方案以后，也不禁大吃一惊，认为“已经逸出近卫声明的范围”。当时有人问影佐：“这样的条件，汪政府能掌握民心吗?”影佐不得不回答：“不可能。”汪精卫看了日本送来的这份方案后，觉得日本人要价越来越高，深感失望，他本来想靠组织伪政府笼络人心，但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只管自己的利益，不管汪精卫那一套，汪也想过放弃组府，但骑虎难下，只好写信委婉地向影佐提出：日华关系调整所拟方案“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并宣布任命周佛海为谈判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同日本人进行谈判。

从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谈了两个月，共举行了七次正式会谈。由于日方要求太苛刻，汪伪方面为了冲淡傀儡色彩，以争取民心，同时也是为了减轻汉奸的罪责，在谈判中和日方发生了多次争论，有时争论还是比较尖锐的。在谈判过程中，争论得比较多的，几乎自始至终的一个问题，就是驻军和撤军的问题。日本引诱汪精卫离开重庆的一个诺言就是答应“两年内撤离”，这是汪精卫借以搞“和平运动”的招牌，收揽民心的法宝。所以此次谈判开始不久，汪伪方面就要求把驻兵分为长期性与短暂性。长期驻兵仅限于蒙疆及平津地区，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开始撤离，两年内撤完。汪精卫一再表示这是争取民心的关键，要求日本能理解他的心情。

但日本人对汪的话装作“不理解”，一心一意要永久占领中国，除了东北、蒙疆、华北、上海和海南岛等要长期驻军外，其余日军占领区要等“确立完全的”治安后两年才能撤兵。至于什么时候才算是“治安完全确立”，解释权完全在日本人那里。双方扯不下去，只得中途休会。

汪精卫听了陈璧君转达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思想上有反复，想打退堂鼓，要从愚园路搬到法租界一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活动，然后转到法国去。不知影佐怎么知道了这一消息，立即到愚园路去安慰汪精卫说：“日本政府对此的最后态度还不知其详，因此我还没有达到悲观的结论。”并表示“今后还要加以努力，不惜对日本政府尽居间奔走之劳，以符尊意。”11 月 16 日，影佐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畑俊六、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说明谈判情况和汪精卫集团的态度，要求当局重新考虑方案内容。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影佐临走前，陆军大臣畑俊六

命令：无论如何要努力让谈判成功。

影佐从东京回来后，为了缓和日汪矛盾，在策略上也作了一些表面的让步，谈判手法也变得相对灵活，对方案的文字作了些修改，以争取汪能在密约上签字。其实这些修改都是形式，在大的问题、实质性问题上，日本都不肯让步。然而，汪精卫"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12 月 30 日黄昏时分，汪精卫最后在密约上签字画押。

日汪密约的签订，使日本取得了几十年来梦寐以求而在临时、维新政府那里尚未完全得到的权益。按照日汪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可是不到一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伪"和平运动"的"首义分子"，但当他们逃离抗战阵营、随汪投敌后，终于尝到了当汉奸的苦果。

高宗武体会最深。1939 年 6 月间，汪精卫一行赴日谈判组府条件时，日方就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安排于东京北郊一处别墅居住，而对高宗武则以其有肺病为辞，指定他住在别处，使高与汪精卫等人隔开，并对他封锁消息。不仅如此，日方还密商乘机扣留高宗武。有一天，影佐祯昭来见汪精卫，告诉汪说：日方有不少人怀疑高宗武，说他靠不住，有可能被重庆利用，主张以养病为名，把高扣留下来，"暂时"不让他回上海，过一段时间再讲。汪精卫听了，认为这样做不妥，这事才未果，对此，高宗武也略有风闻。回国后，随着伪政权筹建工作的展开，汪精卫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权力分配的斗争。高宗武自恃牵线有功，"和平政府"成立，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够平地飞升，至少可以当个外交部长。不料他费尽周折，汪精卫却以他"年事太轻"为由，实际上害怕日

方反对，内定他为外交部次长，部长一职则让汪的连襟褚民谊充任，高的内心极为不满。

同高宗武一样，陶希圣这时也有一肚子怨气。陶是改组派老人，汪精卫一向视他为心腹。到上海后，汪因嫡系人物很少在左右，对陶更加倚重。但陶对权位志不在小，他原想当工商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已先许给了梅思平，陶被内定为宣传部长。而宣传部次长又内定为汪精卫的亲信、“公馆派”的主要干部林柏生。林依仗汪精卫夫妇作靠山，锋芒毕露，根本就不把陶放在眼里。同时，陶希圣同周佛海为首的所谓CC派之间也有矛盾。高宗武、陶希圣还都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许诺所迷惑，他们在日本的“归还租界”、“撤军”、“不赔款”等“温和”的曲调中，产生过幻想。但是，当他们参与日汪密约谈判后，对汪精卫、周佛海的过多让步明显不满，同时，他们又进一步看到了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这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这高、陶二人一经交谈，便对汪精卫大发牢骚。面对自己的处境，他们越来越感到再跟汪精卫干下去，实在太危险了，于是打算抽身出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蒋介石通过杜月笙亲笔写信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对高进行拉拢。与此同时，宋美龄也亲自出马，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要她说服高离开汪精卫。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而跑来威胁她，说如果高继续对汪精卫效忠，就要对不起了。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武准备拆伙而去，向蒋介石集团“反正”。为了“将功赎罪”，他们偷偷地拍摄了日汪秘密条约的原文，在杜月笙等人的协助下，于1940年1月3日，乘了美国“总统号”轮船离开上海，溜到了香港。

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的标题下，公开

披露了高、陶提供的日汪密约。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后来，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了蒋介石的亲信幕僚。1943年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就出自陶希圣的手笔。而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跑到美国做起了生意，1994年病逝于美国。

日汪密约的暴露，把汪精卫震得差点从马上跌下来，也把日本人惊得目瞪口呆。汪精卫在这节骨眼上挨了自己人一刀，难免痛彻心肺，他仰首号叹，连声说：“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家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可见高、陶泄密对汪精卫打击之重。这使得汪又一次自责动摇，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汉奸丑行。他说归说，做归做，继续到青岛开他的分赃会议去了。

汪精卫投敌后，四处拉拢日本军政要人和各地老牌汉奸。接着通过南京会谈、青岛会谈，汪精卫取得了日本政府和临时、维新两政府头目的支持。特别是由于中日密约的签订，取得了日本内阁和军部的支持，青岛会议又基本完成了分赃工作。伪中央政府“临产”了。

一向强调“党统”、“法统”的汪精卫，已经通过伪国民党六大完成了党统的程序；剩下的法统问题，就是要通过伪中央政治会议去解决了。为了集合“各党各派”，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1940年2月12日，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邀请了一批“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研究中央政治会议各项问题的准备工作。被汪精卫集团邀请的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所谓“各合法政党的领袖”，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党魁江亢虎，

江是一个无兵司令的光棍领袖。另一个是诸青来，当时在上海《时事新报》主笔，是一个反动文人，他以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的名义，代表该党人伙。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长赵毓松，是该党的第二流角色。

所谓“无党无派”人士，更是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一个是最早响应《艳电》的堕落文人、《申报》董事赵尊岳。一个是早已落水的老牌汉奸唐绍仪的女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浪荡公子岑广德。一个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汪精卫集团就是网罗了这样一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拼拼凑凑地搞了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3月20日上午，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大会堂正式开幕。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当天还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奢谈“实现和平”、“实施宪政”，并宣布“本月30日举行还都典礼”。

这次会议名额分配：汪记国民党10人；伪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各5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2人；“在野合法党”及“社会负有重望人士”各4人，合计30人。

会议照例通过伪政府仍称“国民政府”，仍以南京为“首都”，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但旗上遵照日本人的规定要附加三角布一块，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

伪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基本上按照重庆国民政府机构设置。甚至国民政府主席仍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只当“代主席”以示正统的承袭。会议最后还排定了各院部人选。其中行政院院长为汪精卫；立法院院长为陈公博；司法院院长为华北大汉奸温宗尧；检察院院长为梁鸿志；考试院院长为华北大汉奸王

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伪国民政府除下设五院外，还有军事委员会，又是汪精卫担任委员长。这样，汪精卫在名义上把军政大权都捞到手了。

汪精卫从青岛会议回来以后，就积极准备"还都"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以褚民谊为秘书长的"还都"筹备委员会。伪中央政治会议已经宣布3月30日"成立中央政府"。眼看小朝廷就要举行登基大典，汪精卫就等待"黄袍加身"了。正在这时，"梅机关"的犬养健带来了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命令，要汪精卫把组府延至4月15日。周佛海听后，感到十分意外，当即邀影佐面谈，告诉他新老汉奸头目已经陆续赶到南京，准备登台，组府如果再延期，"则和平既不可期，组府又告失败，必致两头落空"，乞求日方"最迟不能过3月31日"。影佐也考虑到局面的严重性，只有表示同意。

本来日本政府是公开支持汪精卫组府的，为什么板垣又突然下令汪精卫延期组府呢？因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方从来就没有相信过靠汪精卫能够建立一个解决事变的"实力政权"，认为汪充其量不过是"通过重庆的桥梁"。因此，日本背着汪精卫，为"探索一系列新的行动"，从1940年3月初开始背着汪精卫集团，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

"桐工作"在1939年11月日汪密约谈判时就已开始。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命令铃木卓尔中佐赴香港任机关长，要他设法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铃木到香港后，即与自称为宋子文弟弟的宋子良相会，进行"和平"谈判，日方将此称之为"桐工作"。1940年3月7日，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等日方代表和以"宋子良"为首的蒋方代表三人，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

平条件”。三天后，蒋方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的内容。但反对公开承认“满洲国”，主张日华两国缔结特别协定，共同做它的保护国；对于日本在华驻军，则表示“绝对不能承认部分日本军驻扎在华北”。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仍然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不仅如此，蒋方代表还坚持不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到重庆去”，向蒋介石报告，“暂在内部努力做到承认这一个备忘录”。

会议开了四天，会议结束时宋子良约定至迟一周以内携带正式答复返回香港。3月底，重庆给铃木的答复终于来了，告诉他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因为政府内部的意见严重分歧，希望延期到4月15日再作确定答复。这就是板垣命令汪精卫把“还都”日期推迟到4月15日以后的原因所在。

后来日本人才知道，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军统特务冒名顶替的。当时，重庆蒋介石政权由于受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无意于此时与日方谈和，不过借此以破坏汪政权的成立。日本鉴于“跟重庆直接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才批准“梅机关”着手安排汪政权的就职典礼。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国旗”，可在每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上方都附有一片黄色飘带的“猪尾巴”。汪伪汉奸头目一个个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下车后鱼贯进入大礼堂，参加“还都”仪式。会场气氛沉闷，与会者有穿军装的，有穿蓝袍黑褂的，彼此见面后，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便默然地站到早已用粉笔圈好的位置上。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的

身份，有气无力地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当天，伪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阐述其内外方针。对外强调“与日本共同努力，本着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则强调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同时煞有介事地规定重庆政府军政人员务必于近期内到南京报到，规定国民党军队“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并宣布“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同一天，临时、维新政府还分别发表解散宣言。

这一天，汪精卫忙得团团转，晚上还得向“太上皇”表示感恩戴德，发表对日广播，对日本政府支持他建立伪政权表示感谢，并再次发誓说，他“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

然而，使汪精卫一伙难堪的是，伪政府成立之日，既没有外交上应有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连住在南京的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也是第二天上午才到汪政府作表面上的周旋。难怪有个当过伪官的人曾经为此感叹说：“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南京是如此的凄凉冷清，可在抗日后方，却很快掀起了声讨汉奸的热潮。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学生举行罢课，冲破巡捕的阻挠，高举“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等标语，举行游行示威，沿途还散发了讨汪传单。就在这一天，重庆国民党政府发表“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谴责汪“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命令“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海外各地爱国华侨也纷纷来电讨汪，怒斥汪精卫一伙“罪恶滔天，甘作虎伥，成立伪府，有血皆愤，誓不甘休”。

贵阳人民仿秦桧夫妇跪于岳墓，亦塑汪精卫夫妇之像长跪于公园之内，让人民群众唾骂。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表《讨汪救国通电》，严正指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就是投降；所谓“反共”就是灭华。海内外反逆讨汪的声浪，铺天盖地，把汪伪汉奸“和平反共建国”的叫嚣完全淹没了。

汪伪政权号称“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不管汉奸们如何吹嘘，南京伪国民政府不过是日本控制下的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汉奸傀儡政权，日本人只是把它当作“满洲国”第二。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两个“顾问部”像影子一样地日夜跟随着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伪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要比同级官吏大得多。特别是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更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完全支配着汪精卫以下巨奸的行动。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影佐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看他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继续推行“分治合作”的原则，把整个沦陷区分割得支离破碎。汪伪政权作为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实际管辖范围却小得可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实际上是两个独立政权，就连“国旗”也各树一帜，飘扬在华北和“蒙疆”沦陷区上空的分别是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就是日本侵略者同意归汪伪政权直接管辖的华中、华南沦陷区其权力也早已被架空了。汪伪政权其实是一个政令不出南京城门的小朝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伪政权是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出来的，但当汪精卫真正宣誓就职时，日本却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伪政权的

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但这一要求也未被理睬。原来，日本希望汪伪政权和它签订条约，把以前的秘密条款以政府的形式正式签订，以取得法律效力。因此提出，承认汪政权应在签订条约的同时或之后。

为了尽快获得日本主子的承认，汪伪政权一成立，即准备与日本进行“调整邦交会议”，签订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方面也加紧活动，4月间，负责这次谈判的阿部信行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南京“庆祝”汪政权“还都”，然而，他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了签订条约。通过双方协商，7月5日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由于条约内容早已在上一年年底就已制定，因此一开始就进入正式讨论。汪方以汪精卫为首，以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工商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次长徐良以及翻译周隆庠等人为交涉委员；日方以阿部信行为首，以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松本、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顾问须贺、兴亚院调查官安藤、众议院议员犬养等为交涉委员，双方经过16次会议，先后交涉了54天，到8月31日通过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最后文本。这个条约的实际内容就是1939年底日汪秘密条约的翻版。其中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以及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五件，这是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卖国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中国将完全沦为满足日本军事、经济需要，任凭其榨取勒索的殖民地、附属国。

可就是这样，日方却仍然幻想着同重庆实现“全面和平”，因而想把签订条约的事搁一搁，千方百计抓紧对蒋介石的诱降，至11月间，日蒋“和谈”又一次暂告中断以后，日本政府才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签订日汪条约。为了能让汪精卫名正言顺地在条约上

签字，11月28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同时，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删去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和“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的规定。29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30日，日汪双方举行条约签订仪式，汪精卫和阿部信行在条约上签字。据目击者回忆，当时签字仪式气氛极其悲伤，活像一次葬礼：“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着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像霍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同一天，汪精卫又和阿部信行、伪满代表臧式毅签署了《汪日满共同宣言》，声明互相承认。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自“还都”起，经历了八个月之久，终于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了。

为虎作伥　客死他乡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以“强化国民政府”相标榜，以充当“日本的有力朋友”为目的，全面地向沦陷区人民展开进攻，欠下

了累累血债。

虽然伪府已经成立，但汪伪国民党依然是一盘散沙，沦陷区也是四分五裂，各种党派、团体各自为政。为改变这种局面，汪伪政府效法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所谓“新政治体制”。1941年春竖起所谓“东亚联盟运动”的旗号，将沦陷区内“兴亚建国总部”、“大民会”、“共和党”等组织予以解散，宣布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宣扬要在“一个领袖统率下，一个主义指导之下，集合各种政治和社会的力量”，并规定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总会“领袖”，“有绝对权力”，以树立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同时，汪伪政权还在各地设“东亚联盟运动中国总会”分会、支部；支部以下或设分部，或者即以小组作为基本的下层组织，以便加强控制。

统一沦陷区的财政金融，是强化伪政权的又一重要措施。1941年初，汪伪政府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以周佛海为常务理事总裁。该行发行储备券，规定凡纳税、汇兑及一切公私往来，一律使用伪币，与重庆发行的法币等价流通。当然，汪伪财政金融的“统一”，不能不依仗于日本帝国主义，于是由周佛海出面，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商签订了协议，日方答应出面斡旋向华兴商业银行借款五千万元，作为中央储备银行资本，但中央储备银行必须聘请日本顾问及职员，规定了顾问的广泛权力：凡有关银行营业、理事会议、国外汇兑、与外国银行的关系、国民党法币等旧通货、军事和日本通货事项，以及与华北政务委员会关系事项，都须征询顾问同意，必要时顾问并可要求该行总裁、副总裁说明情况，或列席理事会议。另外又规定该行保有的外汇，须存入日本银行，由双方组成外汇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同时要确认日本的军票与华北联银券的既成事实，并维持其价值。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在南京成立后，在日

本的允许下，先后在上海、苏州、蚌埠、扬州、广州、武汉等处设分行，把触角伸向汪伪的各个区域。

日本对华侵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以后，由于战线拉得越来越长，到处受到中国军民的反击，深感人力物力的不足。特别是日本对重庆政府诱降失败之后，日本为了确保对沦陷区的占领和对物资的掠夺，决定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在许多重大行动上，要求汪伪政权进行积极的配合。

在日本主子的要求之下，1941 年春汪伪政权在华中沦陷区开始实行残酷的“清乡”运动。他们首先以沪宁铁路沿线为示范“清乡”区，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从 7 月开始至次年夏，在吴县、常熟、太仓、昆山、无锡、江阴、武进、镇江、丹阳、扬中等地进行第一期“清乡”。日伪的“清乡”，一般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军事清乡”，这一阶段以日军为主，由汪伪军警配合，以十几路甚至几十路的兵力向“清乡”区分进合击，妄图一下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伪府主席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签署了无数的条令、法规、暂行办法等文件，作为“清乡”的法律依据，而且从伪行政院、伪军事委员会各机关中抽调大批汉奸参加“清乡”，并专门组织宣传总队、政治工作团随“清乡”部队出发。接着，就是第二步“政治清乡”，汪伪以警察、保安队等反动武装为支柱，强行将“清乡”区内居民编组保甲，发放“良民证”，并实行连坐制度，发动告密检举运动，并推行所谓“自首”政策，对“清乡”区内与新四军有过联系，有过抗日言行的居民，一律列为“自新户”，限定日期登记“自新”，凡被视为嫌疑者就送到俘虏营进行“感化”，使整个“清乡”区变成了庞大的集中营。汪自己则多次身穿“特级上将”戎装，到“清

乡”区视察，为其部下鼓劲打气。不仅如此，日伪军“清乡”时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抓丁抢粮，洗劫民财，奸污妇女，焚毁房屋，残杀人民，无恶不作。

与“清乡”运动相配合，汪伪国民政府又开展了所谓“新国民运动”，妄图在思想领域内毒化沦陷区人民，进一步从精神上强化其反动统治。他们模仿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做法，在沦陷区发起向汪精卫的所谓“宣誓”活动，胁迫人们宣誓画押，表示“誓以至诚接受最高领袖之指导；服膺三民主义”，“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一切制裁”。从1942年3月开始，依靠日伪刺刀，有数十万人参加这种“宣誓”，通过这场闹剧，汪精卫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汪伪“新国民运动”的重点，主要放在青少年身上，他们先后成立了“青年团”、“童子军”，举办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伪对这些青年“骨干”，大搞对汪的偶像崇拜，甚至规定凡听到“汪精卫”的名字就立刻“肃立”，并把这种做法逐步推向整个沦陷区。

汪精卫傀儡政权还遵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和迎合日本太上皇的旨意，对沦陷区各中小学校进行“特种教育”，大讲什么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共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以法西斯主义毒害中国年轻的一代。汪伪政府还在小学中推行日语教育，宣扬日本生活方式，教授日本民谣、儿歌，以培养中国少年的亲日感情，以便将来成为日本的奴才，为日本的殖民化服务；同时公开鼓吹“现代儿童的新使命是参加大东亚战争”，以便儿童长大后，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其险恶用心令人发指。

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完全承袭原维新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出卖中国经济权益的一切协议，不反对日本人占领沦陷区内的工厂、矿山，让侵略者对中国的资源尽行掠夺。但是为了应付舆论、蒙骗群

众，向日本人要回了很小很小一部分工厂，在华中、华南共约十分之一，在华北一个也没有，且多数已遭严重破坏。沦陷区的苛捐杂税则多如牛毛，人民不胜重负。

1941 年 12 月 8 日深夜，日本海空军几百架“神风”战斗机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极大地震惊了汪伪集团，汪精卫一伙抱怨日本在作出决定之前，完全瞒着他们。可是第二天上午，在伪政府接到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大使馆的正式通知后，立即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日本提出的“与日本采取一致立场，充分合作”的建议。17 日，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说“为尊重条约及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起见，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以确乎不拔之精神，临此难局”，同时向日本表示希望“参战”。当时，日本政府并不欢迎汪伪政权“参战”，因为这样会让汪精卫集团有了组建军队的理由，也许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容易控制了。同时，日本政府也深知汪伪政权的“参战”，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如此虚弱的汪伪政权，又哪能帮得上它什么忙呢？

1942 年 10 月，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失利，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再一次“和平”活动又毫无希望，因此开始改变策略，提出所谓“对华新政策”，妄图利用汪伪政府的参战，来打破中日长期战争的现状。接到日本人同意其参战的命令后，1943 年 1 月 9 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了对英美两国的《宣战布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与日本“同生共死”。汪伪外交部同时通知轴心各国政府，自此以后汪政权将与日本并肩作战。同一

天，汪精卫与日本大使重光葵又签订了《中日共同宣言》，宣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争，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从此，汪伪政权全面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在政治上，设立最高国防会议，对战时的方针政策加以决策；并对省、县两级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废除省、县政府委员制，实行省长、县长集权。这一机构的更动，也增强了汪伪政权军事法西斯的色彩。在经济上，积极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先后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花统制委员会”等一套推行统制经济的机构，加紧对沦陷区的物资控制，向日本提供军需物资，以支持其战争，使中国沦陷区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后方基地。就这样，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由“同甘共苦”走上了“同生共死”的道路。

汪精卫的种种努力，虽深博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绝对不能挽救汪伪政权的厄运。1943 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线的败局已定。汪精卫环顾国际大势，心如枯木，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整个汪伪集团，也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周佛海早在 1942 年下半年就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得到重庆“戴罪立功”的批示。被汪视为“忠臣”的陈公博也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向重庆政府暗送秋波，要求“将功赎罪”。

众叛亲离，使汪精卫心情愈加沉重，本来就不好的身体，这时变得越来越差。特别是一想到当年测字先生预测的“可杀可剐”，就会心惊肉跳。

原来，当年汪精卫刚“还都”南京，当上伪政府主席时，一天他微服上街，路见一测字先生，便上前抽了一字，此字为“哥”。

测字先生说："'哥'有三解，哥者，两可相连也。第一解为'可父可师'。"汪精卫听罢觉得自己地位显赫，对世人来说，的确是'可父可师'之人，心中便十分得意。测字先生又道："第二解乃'可敬可佩'。"汪听罢更加高兴，想起自己青年时代慷慨歌燕市，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之英雄壮举，实是如此。他认为测字先生很有水平，忙问第三解何意？谁知测字先生却噤声不语，说第三解乃天机不可泄露。汪精卫不便暴露身份，只得怏怏而归。为这第三解，汪精卫彻夜难眠，一心想知道结果，第二天又去找测字先生询问答案。不料测字先生已飘然而去，只在地上留下用白粉所书八个大字："可字三解：可杀可剐。"看得汪精卫魂飞魄散，从此打不起精神来。如今日本主子的势力已是日薄西山，中国人民的抗战即将胜利，每当想起当年测字先生的可怕预言，汪精卫就会不寒而栗。

1943 年 11 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 1943 年 12 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陈璧君见

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见西医不行，便求助于中医秘方。她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企盼奇迹出现。最终，陈璧君的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这位医生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气，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膏药，很快就可以好。刘一帖名扬江湖，其真名反被人忘了。

刘一帖被请到了南京汪精卫的病房。他微闭双眼，认真地为汪把脉，替汪做了仔细检查后，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儿，然后贴于汪的背后。第二天，汪感觉到后背凉飕飕的，疼痛大大减轻。陈璧君暗自高兴，即派陈春圃给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可是第二天，汪精卫的背部突然疼痛起来，手心、脚心都疼得沁出汗来。陈璧君慌忙让陈春圃再去请刘一帖。可是陈到刘住的旅馆后发现那刘先生已经离开，不知去向。陈璧君知道不妙。三天后，汪精卫收到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大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而且开始发高烧。1944 年 2 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就这样，汪精卫被抬上飞机，直飞名古屋，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楼一间特设的病房里。为了对外保密，这间病室叫做"梅号"。

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

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汪精卫到达日本的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了。汪精卫知道来日无多，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副死不悔改的汉奸嘴脸。

11月9日上午9时，美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市。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虽刚进入冬季，日本的天气却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如同冰窖。这让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到41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

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德国医学专家就说过，他顶多只能再活十年，如今刚好十年过去，果真应验了当年医生的预言。

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墓壳时，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设法炸掉汪墓。炸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前三天，往中

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1 月 21 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 3 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璧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

随后，起出的棺木被装上大卡车，运到清凉山焚尸扬灰。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埋过天字一号大汉奸——汪精卫。

陈公博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要员

陈公博是广东乳源县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出生于广州。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9岁正式拜梁雪涛为师，学习四书五经。梁雪涛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先生，他在讲解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向陈公博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从梁雪涛那里，陈公博最早接触到了新思想、新学说。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身为提督，常年在外领兵打仗，武艺很好。在请老师教授儿子文化知识的同时，他还很注意传授儿子武功。他在家里长年雇了两位拳师，教陈公博习拳舞棍。所以，陈公博从小练就一些拳术。

陈公博的家在广州大北门的长泰里，那里是八旗兵驻防的地方，八旗子弟们常在这里聚众闹事，仗势欺人。有一年的农历7月15日，当地盂兰盆会请戏班子唱戏，陈公博跑去观看。那帮八旗子

弟看见陈公博孤身一人，便围过来要打他。哪知他平时学的武功这下派上了用场。他不慌不忙，躲过了瘦高个这一拳，然后左拳右腿，一阵好打，打得几个恶少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这下可惹了祸，陈公博回到家里，这些恶少家长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陈公博的父亲只好忍气吞声，向来人赔了许多不是，并答应出钱为受伤者治伤，事情才告平息。

这件事给陈公博很大刺激，他幼小的心里，由此种下了反清的种子。

陈志美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直不满，他早年曾参加了秘密会党三合会，旨在“反清复汉”。晚年他同情、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义举，在与革命党人接触后，他决定毁家举义，与清廷决裂，开始准备一次武装起义。1907 年，15 岁的陈公博停止学业跟随父亲联络各方反清势力。凭陈志美的威望，队伍发展很快，一场起义即将打响。可由于走漏消息，清军大军压来，起义部队被迫解散。为了不连累大家，陈志美先打发儿子回广州，然后坐等清军到来，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判死罪。为救狱中的父亲，陈公博找了许多父亲的故交，通过兵部尚书铁良的关系，陈志美才由“斩刑”改判为“终身监禁”。父亲被捕，家产被抄，陈公博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艰难谋生。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任校对。一年后返广州，考人育才书社。

辛亥革命后，广东独立，陈志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并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顾问。年仅 19 岁的陈公博，依仗其父名气，成了乳源县的挂名议员和民军参谋长。其父因其学识不够，命其辞职，充当学兵（学生军）。陈公博在此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南北统一后，学生军解散，其父命其弃武习文，从英美学校教师学习。不

久，其父病逝，陈回广州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考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

陈公博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校园里一片沸腾。而这时的陈公博却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不感兴趣，成天躲在图书馆里读书，他抱着“养心性，寡交游”，“不管闲事，专管读书”的宗旨，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在他的《寒风集》中称自己“静如处子”。对于青年人敬仰的蔡元培、陈独秀，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蔡元培只见过一面，为的是求一副对联；与陈独秀也只有一面之交，为的是询问考试的日期。陈公博对北大的各种社团也毫无兴趣。整个五四期间，当时作为哲学系班长的陈公博只参加过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当军警镇压逮捕游行学生的消息传回学校时，陈公博也认为这算不得什么大事。直到北大快毕业时，他才开始对政治“动如脱兔”。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他在他的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谭平山、谭植棠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三人常常聚在一起，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决定模仿《每周评论》，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当时的广州，各种进步思想传播很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这时，汪精卫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对陈公博的文笔、才智颇为赏识，汪、陈接触日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来，谭平山是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应该是他。但由于当时他正在协助陈独秀（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正担任广东教育厅长）为办广东大学筹集经费，脱不开身。再加上陈公博工作很有成绩，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7月14日，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来到上海。为了出入方便，他们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其他代表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7月22日先召开了预备会，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思，"党必须非法地工作"，并决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防止被密探盯上。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已接到消息，说东方的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朝鲜人等，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准备好了抓捕行动。可是，当时在上海也只有李汉俊的哥哥家一处可用做会场。第一次会议后，24、27、28、29日又连续开了4次会（25、26日休会）。会议刚刚开始还算平静，可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强烈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到，"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晚，会议继续在李汉俊哥哥家一楼召开，13名代表只有周佛海没有到，因为他闹肚子，又吐又泻起不了床，躺在博文女校休息。8点多时，马林刚想讲话，忽然间，一个不速之客鬼头

鬼脑地撞了进来，后经查证此人叫程子卿，与黄金荣是把兄弟，刚进法国巡捕房任职。他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对此，马林警惕性很高，他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所有的人分头迅速离开，李汉俊与陈公博为了掩护同志们就留了下来。他们上了二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然后，将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审问。

巡捕先审问李汉俊，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巡捕的问话，称自己是商务印务馆的编辑，刚刚正与一帮朋友在家里编辑新时代丛书。

审问陈公博时，巡捕上下打量了一番，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头一抬，回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巡捕又问："你懂不懂中国话?"陈公博答道："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巡捕再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陈公博干脆答道："我就住在这里。"

陈公博不敢告诉巡捕真实的住址，因为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被法国巡捕搜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又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院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一回到房间，陈公博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文件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

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茶房告诉他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就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开会，带着妻子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 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 1923 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陈公博被开除出共产党后，决定去美国留学，并把这一想法向国民党巨头汪精卫提出来。汪精卫很注意这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年轻人，不但赞同他出国深造，而且在经济上给以帮助，当即由广东省财政厅拨专款解决他赴美留学的旅费。

1922 年 11 月上旬，陈公博从香港出发，辗转日本，于 1923 年 2 月到达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而且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初，陈公博修完了攻读博士学位所必需的课程。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凡申请博士论文者都必须把论文印300份送图书馆，而论文的排字印刷费需要一千美金。陈公博当然无法筹集这么多钱，只好写信回国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援。廖仲恺当时正忙于国民革命事业，身边正缺得力人手，而且他也很欣赏像陈公博这样有才学的青年。回信不同意他读博士，只寄去600元旅费，要求他回国效力。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三年的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广东省省务会议委员、省政府农工厅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陈又于同年9月继任国民党农民部长。12月兼代广东大学校长。在翌年1月的国民党二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赞同蒋介石限制、打击共产党的主张。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被蒋介石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并随军行动。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陈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湖北省交涉员（外交特派员）、江汉关监督。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陈于12月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内打击、排挤共产党人。当时蒋介石企图迁都南

昌，以便将革命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遭到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反对。陈公博以自己的反共立场向蒋献策："共产党虽然在武汉气势很盛，而军队毕竟附和者不多，若果总司令能够迁汉，必然可以镇压下去，未来的祸害必然可以预先无形消弭……要镇压共产党，不止国民政府要搬去，就是总司令部也要搬去。"

当然，陈公博此时心里也十分矛盾，他既理解蒋介石摆脱武汉的用心，同时也担心他在南昌另立中央，实行独裁专制。在此种情况下，他还是选择了返回武汉，投人到汪精卫的怀抱。1927 年 3 月，陈公博从江西来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工人部长。

"改组派"大将

蒋介石迁都南昌不成，但不久就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相抗衡。此时的陈公博，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他到处写文章，发表演说，散布反共言论，叫嚷什么"目前若不再分共，恐怕大家都要跟着共产党跳水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公博认为"国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时期"。他到江西，代表国民党中央支持朱培德驱逐共产党人的行动。他还竭力劝说宋庆龄、何香凝等接受汪精卫的分共主张。他因积极反共，取代了邓演达于 1927 年 7 月 15 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 8 月，蒋介石由于与桂系的矛盾而下野。9 月，宁、汉、

沪（西山会议派）三派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汪精卫主要助手的陈公博，被汉方推举为候补特别委员。但陈认为“特委会”不合国民党法统，他不但自己拒不参加，还促使汪精卫退出，与汪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对抗，陈为常务委员。同时，陈奉汪之命，到广州，打出反对“特委会”的旗帜；10月，广州政治分会设立临时军事委员会（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为主席），陈公博为政治部主任。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与宁方国民党纠纷难解之时，11月，蒋介石向汪表示“竭诚合作”，要求将李济深逐出广东。汪、陈正企图以广东为活动根据地，便策动粤军张发奎、黄琪翔举行了驱逐李济深、黄绍竑的“广州事变”。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12月，陈公博和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策划并指挥了对共产党人发动的广州武装起义的镇压。但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等反汪各派却借口激烈攻击汪、陈，南京国民政府指控陈公博等“在粤叛变”，令军队进剿，并通缉汪、陈等人。汪精卫出走法国，陈公博则逃离广州，到香港避居。

当时，陈公博“不想至南京，也不想游海外，而是深思焦虑，怎样可以在清党之外，更把共产理论肃清”。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组国民党，健全国民党的组织和理论。于是，他于1928年1月到了上海，于5月出版了《革命评论》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同时也反对联共。这些，对当时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而又对革命前途产生彷徨的一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革命评论》最高发行量达1.5万份，各地一些刊物也争相响应。这些，都为以后改组派的发起作了舆论准备。同时，陈公博还创办了大陆大学，自任校长，以培养改组派的干部。

1928年冬，改组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奉汪精卫为领袖，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当时，汪精卫留在法国，改组派反蒋活动主要由陈公博领导，正如陈自己所说："差不多反对南京的巨浪，都由我一个人煽起飓风。"蒋介石对之进行镇压。1929年3月，蒋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将陈公博永远开除出党。陈公博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策动他们进行军事反蒋，后以失败告终。

1930年，汪精卫、陈公博等又一次发动军事倒蒋，并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准备另立新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倒蒋，最终又告失败。陈公博于11月逃到香港。翌年1月，改组派组织宣布解散，陈公博离港赴欧。

投身于蒋汪合流的行列

因蒋介石非法囚禁粤派首领胡汉民，1931年5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了和南京政府对抗的广州国民政府。陈公博于10月回国。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国民党各派系被迫妥协，召开和平统一会议，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实行蒋汪合作。陈公博得以恢复国民党党籍，并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还曾一度兼任铁道部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陈公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十分愤怒。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一

起，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命令亲信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陈公博先找到军令部部长何应钦，见面后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陈公博又向撤退的士兵了解战况，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呜咽着对陈公博说："我们连100多号人，就剩下3人。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六十七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他想，日本军队的武器好，而且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硬与日本人碰，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

陈公博此次北上，本来是慰问前线军队，为前方将士打气。结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军队都退了下来，他自己也被吓破了胆。从北平回到南京，陈公博便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北平之行，使陈公博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从北平回来后没多久，蒋介石与汪精卫分别找陈公博谈话，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作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本来就不想对日作战的蒋介石与汪精卫，听了陈公博的汇报，一致决定对日妥协。没过多久，南京政府便设置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大开。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受伤治疗，12月辞职，而后赴德疗养。作为汪派主要骨干的陈公博也于同月辞去实业部长职，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专事党务。1937年1月，汪精卫回国。2月，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

“半路出家”当汉奸

抗战爆发后，陈公博和汪精卫等，对抗战没有信心。早在他当实业部长期间，他就散布“抗日必亡”论调，认为“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设第五部，主要分管国际宣传，陈公博为部长。10月，蒋介石要陈公博以特使名义访欧，以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其中有一个任务是要陈利用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以前曾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因此与陈熟识）的友好关系，向墨索里尼游说，劝墨索里尼同日本散伙。陈知道以其与齐亚诺的这种关系去影响墨索里尼的对外政策，是不可能的，不能完成使命，所以不愿去欧。但在蒋的命令下，只得赴欧，先后访问了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国。翌年1月，他回国到了武汉，向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讲到他与墨索里尼面晤的情况，说墨索里尼不同意与日本散伙，但可以向中国提供军火。

1938年4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汉口失陷后，他到重庆。9月底被任命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0月到成都赴任。

对于1938年10月以前，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与日本勾结“议和”的活动过程，陈公博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甚至并不知晓内情（因汪等为绝对保密起见，并没告诉陈）。但由于他在与日“议和”主张上与汪等一致，因此，汪在决定投敌之前没有忘记拉上这个老伙计。

1938年12月初的一天，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办公室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电话。陈公博放下电话，火烧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陈公博一进门，汪精卫来不及给他让座，急忙说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日本首相近卫表示了中日亲善的谈话。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陈公博忙说：“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正处危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在党内万不可有两种声音。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看陈公博如此激动，汪精卫便自我解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这件事情暂不讨论，以后再说吧。”汪精卫很了解陈公博，做事时事先没必要征得他的同意，一旦生米做成了熟饭，他是会跟着自己走的。

12月14日，汪精卫派一名副官来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降日之事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

12月18日，成都下大雨，飞往昆明的航班不能起飞，直到20

日，天气转好，陈公博才前往昆明。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

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中国招降的声明。26日，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讨论决定按照与日方的约定，发表汪精卫的"响应声明"（即汪的《艳电》)。受汪指派，陈公博和周佛海、陶希圣携《艳电》到香港，计划在征得在港的顾孟余的同意后，交《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发表。不料顾看了电稿大吃一惊，表示反对发表，要去电向汪力争。周、林则坚持要如期发表。在此情况下，陈公博"敢于负责"地说："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迫，现在无法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就谈不上电报往返磋商，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此事只好由我负责。"结果使臭名昭著的《艳电》得以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也就使汪伪集团向全世界公开了其卖国降日主张。

此后，陈公博和周佛海等，受汪精卫指派，在香港建立汪伪组织机构——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陈公博是政治、军事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由汪精卫自任）。汪精卫提出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等人为汪伪集团的"首义分子"，可享受领取5万元港币安家费的待遇。实际上，陈公博并未参与汪伪集团最初与日本勾结"议和"的活动，作为"首义分子"，是不太够格的，只是因为他在原来的汪派派系中地位仅次于汪，这"首义"头衔是汪对他的"钦赐"，由此而引起周佛海等人的不满。

但是，此时的陈公博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并不完全赞同汪精卫的一些做法，但也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深明顺逆、拒当汉奸；另一方面，他鉴于和汪精卫原有的密切关系以及在对日妥协问题上的一致思想，响应汪的“倡导和平”，是想借助汪的地位实现他自己的主张。因此他知道，除汪之外，他自己“还没有资格和声望来号召这个运动”。因此，他在香港顾虑、彷徨，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在港出席“政委会”会议数次，在私人间不和周沸海、陶希圣、梅思平往来。1939 年河内刺汪案后，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等群奸选择上海为活动中心，陈公博仍留港不去上海。他深居简出，还蓄起胡须，以避人耳目。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他也不曾参与早期的日汪密约谈判。所以，使得汪精卫曾当着别人的面几次骂他。

同年 8 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召开，选举陈公博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对于这一职务，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陈公博没有明确表态。1940 年年初的一天，陈公博在香港的家中陪着母亲在客厅里聊天，忽然汪精卫伪政府的骨干分子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来访。高、陶两人此次来陈宅，是想探探陈公博的口风，约他一起叛汪，然后投奔重庆的蒋介石。如果陈公博能够和他们一起走，那影响就大了。哪知陈公博态度冷淡，并无叛汪之意。

1940 年 1 月 21 日，《大公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高、陶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高宗武与陶希圣在报上公开叛汪，还把汪伪内部机密全部曝光，汪精卫再遭国人唾骂，当初引诱汪精卫降日的就是高、陶二人，汪精卫上了贼船后，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陈公博想，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一波三折，国人唾骂，日本人施

压，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我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只有这个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朋友真情，看样子我只有往这火坑里跳了。这之后，汪精卫曾去过上海，并发表过鼓吹“和平”的文章。但是陈公博对汪精卫集团另组政府还不是太赞同，因此仅在沪停留了一小段时间就又返回香港了。

1940年春，汪记伪组织快要开台了。陈公博还是在香港徘徊观望，汪数次邀他往上海南京，他还借故推搪，但没有拒绝。最后，陈璧君亲自到香港见他，半哭求半责骂地对他说：“公博，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却这样态度，不肯帮一点忙，局面怎样展得开。”她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你怎样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愣了一会，毅然答道：“夫人，我明白了，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请夫人先回，报告汪先生，我随后就到便是。”陈璧君去后，他便立即北上，亲友们还有向他劝阻的，他不答了，临起程那天他向母亲辞别，抱头大哭，并安慰各人，说他这次不担任重要职位，只以客卿身份或在内幕帮帮汪先生而已，各亲友也不必前去谋事，请大家安心。

1940年3月11日，陈公博到了上海。从此，陈公博公开参加了汪伪集团的汉奸活动。

同月17日，陈公博和汪精卫等到达南京。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汪精卫自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以下均为委员，不设副主席）、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他在南京发表对日本的广播讲话，说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中日和平”的基础。他还向日本主子献媚道：今后要“自省和自责”，做“日本的永久

的亲挚的朋友”。

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

这时的陈公博，已公开成为汪伪集团的第二号巨头。当时，汪伪集团的许多重大问题，往往都由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三个人会商决定，然后形式上提交有关会议照例通过一下，汪伪内部称之为“三巨头会议”。同年4月，汪记广东省政府成立。因广东是汪精卫、陈公博的老家，广州往往又是国民党人搞西南独立的据点，汪伪集团对广东这块地盘十分重视。而陈公博在广东有知名度，又以汪伪集团二号人物的身份，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但因其身在南京，鞭长莫及，对此兼职不感兴趣，便由陈璧君之弟陈耀祖代理。同年8月，陈公博还任伪中央党务训练团副团长（汪精卫兼团长）、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9月，他又引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为了表示其对傀儡政权的宠爱，于1940年4月下旬派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使到南京，同时派出所谓“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一行20多人，包括日本贵族院议长松平赖寿、众议院议长小山拙寿、东洋协会副会长水田秀次郎、同仁会副会长宫川末次，以及经济界、新闻界的代表，出席庆祝汪伪政府于4月26日在南京举行的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汪精卫、陈公博等受宠若惊。

为了答谢主子，汪伪政府于5月间派出“赴日答礼使节团”，以陈公博为专使（一说特使），褚民谊（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为副使，陈群、林柏生、陈君慧等汪伪政府部长、大员为使节，前

往日本。行前，陈公博发表谈话，他说，当前对内是如何使全国“共同归趋于建国旗帜”，对外则“在于谋中日两国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从而共同“建设东亚”。到东京后，陈公博等拜会了日本天皇和军政首脑，同首相米内和前首相近卫进行会谈。在抵、离东京时，陈公博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掩饰日本的对华侵略，讨好日本主子，声称“中日合作”是东亚安定的唯一要件云云。

汪伪集团的卖国政策，是要由伪立法院通过立法程序的，以示其“正统”、“合法”化，再由伪行政院冠冕堂皇地施行。作为伪立法院院长的陈公博，其中自然起着重要作用。如 1940 年 11 月 29 日，陈公博召集立法院会议，批准了汪精卫将于次日在南京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以及将与日本、伪满洲国发表的《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对汪记伪政府的正式承认）。12 月，陈公博还就日汪条约的签订发表广播讲话，宣扬卖国理论，掩饰日本侵华罪责，居然要中国人民“自省自责”对中日战争的责任。他说中日战争“至三年之多，这是谁的责任呢？我们用自省自责的精神来检讨，我相信，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吧！”谈到卖国的日汪条约，他表示“应用沉着的态度来接受来自勉”。他还向日本主子献媚说：“我们的态度，首先为中国打算，更为日本打算。”1941 年 1 月 1 日，陈公博又发表题为《划时代的责任》一文，说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使 1941 年由划时代而进入新纪元。8 月，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中国人民停止抗日，投入他们的“和平运动”，“共同担负东亚安定的任务”。

汪伪的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兼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为常务委员。陈公博的地位在周佛海之上，又兼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很想“以政统军”。无奈，周佛海因身兼财政、警政两部部长，

握有实权，特别是掌握财政大权，是伪府“财神”，伪军高级将领对周巴结很紧，交往甚密，有事、要钱都去找周，使得陈公博颇伤脑筋。陈公博不仅是汪伪二号人物，也是历史上汪精卫最得力、信赖的助手，汪有意维护陈的地位，让陈多管军事，便示意伪军将领们有事多找陈而不要找周。

1940年10月，原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宗耀）被刺杀身亡。傅是1938年在侵沪日军支持下任伪上海市长的，是伪南京维新政府时期的人物。1940年3月，汪记伪国民政府成立，名为“中央政府”，其实不过是一个傀儡小朝廷，只能管辖极有限的苏、浙、皖三省和京（南京）、沪两市，兼及武汉、广东、淮海（徐州一带）、山东。而且汪伪政府成立时，这些伪地方长官仍是原来由各地日军扶持起来的原班人马，不是汪系中人，日本主子有意要维持一个时期，以示怀柔，汪伪政府不得不一一加委，后来才在影佐祯昭的支持下，采取蚕食政策，逐个换上汪系人马。

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因有侵沪日军的支持做有力靠山，汪伪集团虽久欲攫取，但却迟迟无法对其下手，不能换马。而上海既是日伪占领区中最大的都市，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对汪伪集团来说，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地区，而且在日汪关系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当傅筱庵被刺身死后，这个肥缺属谁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汪精卫和周佛海、梅思平都认为，此缺继之者，只有具有“国际声望”的陈公博才合适，日方陆（军）、海（军）、外（外务省）亦均表赞同。因此，陈公博于1940年11月兼任伪上海市市长，免去伪广东省省长职，翌年8月又兼伪上海市保安司令。同时，在汪精卫出国期间，陈还代行汪的职务。

1941年，日军策划在长江流域地区实行“反共清乡”，镇压共产党和抗日力量。汪伪集团为了配合日军这一计划，于同年3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陈公博为副委员长（汪精卫为委员长）。同年夏起，首先在苏州实施残酷的“清乡”，以后在苏北和浙、皖等地展开。以陈公博为市长的伪上海市政府，也于翌年8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陈自兼主任。同月，陈与日方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他还发表“清乡”谈话，说“清乡”是“中日和平”的基础，也是确立汪伪地方政权的基础，是推进日伪的“前方胜利”。9月起，上海郊区开始“清乡”，首先由日军进攻抗日游击武装，进行“军事清乡”，然后由陈公博的“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进行“政治清乡”。后来，陈公博撰文夸耀其对上海的“清乡”，“是以八分政治来配合军事而推进的”。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一周年的1942年12月8日，陈公博根据汪伪集团向日本要求参战、向英美宣战的意图，以伪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宣称中国民众“应当准备参加大东亚战争”，为虎作伥。

在这之前的4月，美军由航空母舰运载的飞机开始大举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城市。12月下旬，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从而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首相东条英机面临对日不利的战局形势，只得准备抵抗美英军队大举反攻的战略布置，他企图利用被其占领的中国国土作为与美军决战的战场，以避免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直接进攻。另外，由于日本国内战略物资日形枯竭，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掠夺中国沦陷区的物资。所以，根据上述战略需要，东条内阁与日本大本营联席会议于12月18日决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

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并经日本天皇亲临的御前会议批准，决定在英美大举反攻之前完成各项具体措施。其“根本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促使汪伪政权参战，彻底与日本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日汪重新缔结基本协定；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实行日汪双方官商的经济合作，以加紧掠夺中国沦陷区及抗战区的战略物资；为了笼络中国人民的民心，软化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玩弄所谓向汪伪政权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撤销在华治外法权，并将英美等国在华财产移交汪伪政权的把戏。

汪伪集团按照日本主子的决定，于1943年1月9日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并发表了对英美的《宣战布告》，成立了伪最高国防会议，由汪精卫自兼主席（不设副主席），陈公博等为委员。接着，汪伪集团与日本签订了《共同宣言》，声称双方为完成英美作战，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合作。2月，以陈公博为市长的伪上海市政府，召开对英美作战示威大会。陈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吹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着解放全东亚”和“东亚共存共荣”，要求民众“以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同时，他的伪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日本的物资掠夺，还实行粮食统制新办法。此外，他还在上海发起搜集废旧金属，以供日军之需。同年5月中旬，日汪在上海联合成立物资调查委员会，陈任委员长，日方委员有公使田尻、经济部长石井等，对上海各种主要物资进行调查，对棉纱实行强制收买。

1943年3月30日，日本宣布将北平、天津、汉口、苏州等地的专管租界“交还”伪政权。为了感谢日本主子，汪伪政权以陈公博为特使，专程去东京答谢，并向主子表达汪伪集团协助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决心。陈公博抵日后，访问了东条英机及其他

日本军政要人，并发表谈话，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好，表示汪伪政府“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

同年7月底8月初，日本又将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还”汪伪政府。伪政府举行接受仪式，将原租界地区分别改为第一、第八区，陈公博兼两区公署主任。根据汪伪官制，立法院院长为选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区长则在荐任、委任之间。对于陈公博以立法院长而兼任军委会政训部长、上海市长、区公署主任，而汪伪政权下辖苏、浙、皖、鄂、粤五省，无一省完整的情形，当时上海曾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之。对联曰：“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可谓妙不可言，道出了陈公博在汪伪集团中权倾一时，而汪伪政权只不过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傀儡小朝廷的实际情形。

同年9月，陈公博随汪精卫秘密访日，10月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声称要“为建设大东亚”而与日本“互相紧密协力”。

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情恶化去日本治疗。为此，经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中央政府主席职权，并主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最高国防会议以及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

同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不治而死。两天后，汪尸体运回南京。13日，伪政府成立了“哀典委员会”，以陈公博为

委员长，演出了“公祭”、“守灵”和大出丧等一系列活剧。

汪伪集团，原是靠“一头两手”撑持。所谓“一头”，便是汪精卫；“两手”，则是陈公博和周佛海，如同汪的左右丞相。汪一命呜呼后，伪政权还得存在下去，还得有人继承汪的地位。这不仅是汉奸们也是他们的日本主子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决定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日本主子的手里，汉奸们只有唯命是从的份。有“资格”继承汪位的自然不出陈公博、周佛海两人。日方认为，周佛海虽原位居汪伪集团第三号，但为促成汪精卫叛国、组建傀儡政权出力最大，且在伪政权中握有实权，形成较大势力，还在日本主子面前最具奴性，最驯服、可靠。而陈公博，虽实力不足，但代表汪精卫的“公馆”派，又是原来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是汪的自然继承人，继承汪位比较顺当，也可稳定汪系分子的人心。因此决定由陈继承汪的职位。1944 年 11 月 13 日，通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履行公事”，“推选”陈公博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同日下午，伪中央常委会推选陈公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主席。

关于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的“代理”两字，汉奸集团内曾有过可笑的争论。当初汪精卫自称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说是在为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执行职务，后汪去掉了“代”字。汉奸们认为，汪病危时，陈公博代行汪职，称“代主席”是可以的。因为按照官场定例，凡代理活人的职务，可以称“代”；现在汪既死，陈不能代理死人的职务，只能称主席，不能再称“代主席”。但陈为了标榜自己是继承汪志，坚持要和汪活着时一样，仍称自己为“代主席”。因此引起不少人反对，说陈这是代理死人而行职权，从古未有，既不合“国家体制”，也不合历史传统，势必

贻笑中外，使人耻笑伪政权毕竟是个傀儡小朝廷，连名义都不正。但陈公博始终不肯取消“代”字。

实际上，陈公博这样做，除了公开标榜其是继承汪志外，另有其老谋深算。他是为了向重庆国民党当局表示姿态：国民政府主席应是蒋介石，他只不过是替蒋看守南京政府，蒋回南京后，他要把南京交给蒋的。这就为以后一旦伪政权垮台，他可以向重庆当局“交代”埋下伏笔。原来，他对汪伪政权本来就信心不足，这时，他更看到了日本和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败势，看到伪政权末日的临近。他曾对亲信下属表露过这一心迹。他说：“老实说，我从‘组府还都’的那一天起，就缺乏信心，而且国际形势又如此急剧变化(指那时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墨索里尼也已垮台)，前途很难想象。我已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所表示的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办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的。这一项结束工作，我已考虑到一个办法。”他说的“办法”，就是企图实现“宁渝合流”，即向蒋的国民党当局靠拢，争取蒋的谅解和接纳。所以，汪精卫的死，陈公博的继位，为伪政权蒙上了浓重的“收场戏”阴影。

但是，在其日本主子尚未最后失败之前，作为儿皇帝，陈公博在公开场合是不得不向其主子和群奸作垂死挣扎的表演的。他在汪精卫棺材前的就职典礼上，身穿“吉服”，胸前佩带大红花，却红着眼睛，悲悲切切。他在就职词上声称，要以汪的“手定之政策”为他的“奉行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局如何迫切……决不动摇。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在以后的几次伪中央和地方会议上，陈公博都反复强调了这一意思，还说他是以汪生前所定的方

针为方针，此外他无自己的方针；他是以汪所要筹划的设施为设施，此外他无所设施。当然这一姿态也是为了频频向蒋介石表白心曲，以便日后减轻、推脱罪责的。

就职后不几日，陈召集各伪省市首要人物和伪军各将领开会，要求继续奉行、完成汪精卫的“遗志”和“事业”，全力“协同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12月，他又兼任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和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

陈公博在继位后一个月，即1944年12月14日，又到日本会见了日本天皇和首相小矶、陆相杉山、参谋总长梅津等，“作新任之寒暄”。他向日本主子表示：“今日中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们唯有本于汪主席昭示我们的由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心，勇往直前。”

1945年元旦，陈公博发表《元旦致词》。他引用上年汪精卫的元旦致辞，颠倒黑白、自欺欺人地说：“中日友好关系之增进，有了更光明”，“大东亚战争决战之胜利，有了更确实的把握。中国的独立，东亚的解放，有了更可靠之保障。”他还说：“中国危机，现正四伏，苟不努力，或则沦为决战之战场，或则沦为全面之赤化，或者再沦为英美之殖民地”，“故全国人民，宜乘时奋起，要求全面统一和平，合全国之人力，以根除赤祸，以排除在华之英美外力，更实行中日同盟条约，使中国得以完成自由与独立。”他还强调说：“要之，中国必须统一，然后始能获得国家之完全独立，亦唯有和平，始能获得国家之完全自由，更必坚忍沉毅，始能合作全力，以获得今后国家与人民之确立。”

显然，陈公博这后半部分话，主要是说给重庆国民党当局听的，以表露其所谓“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主张，向重庆献媚；

同时也是贯彻其日本主子的旨意——促使重庆当局迅速结束对日战争，实行所谓“全面和平”。

其实，陈公博继汪位后，在继续为其日本主子效命的同时，就已频频向重庆当局示好献媚了。早在1944年11月20日他在就职典礼上的就职词中就表露，他的“国民政府自始即无与重庆敌对之心”，“重庆之同志，亦即为吾人之同志，吾人自始即以为和平亟须实现，国终不可分”。六天以后，他主持的伪中央六中临时全会发表的宣言中便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向重庆表明合作“再建中国，统一本党”。这是陈公博提出的向蒋介石表态的口号，是向蒋“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当时情况下，“党”、“国”如何统一？当然不可能由南京伪政统一重庆国民党当局。陈公博表达的意思就是暗示蒋介石，请重庆来统一他的南京伪政权、伪党，他愿意归顺蒋介石，“上表称臣”。而他一再声称的“反共”、“根除赤祸”，也最合蒋的口味，最能博取重庆当局的赞许。因此，陈公博开始在实际行动上，一面着手准备“收摊子”，一面布置反共军事。

陈公博感到，伪政府是当时汪精卫通过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结束伪政府，也得开一次伪党代表大会。为此，他于1945年1月自兼伪中央组织部长，布置亲信部下，从整理党员党籍到伪党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大会召开，要在六个月内完成。计划通过伪党代表大会，取消原与重庆方面分庭抗礼唱对台戏的牌子（包括伪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各院、会、部等等），准备代之以“特别委员会”或“东南办事处”之类的临时名称，为归顺重庆当局、“宁渝合流”做好组织准备。陈手下的一些汉奸，对陈的用意心领神会，也想借

机在日后洗刷汉奸臭名，便也积极行动起来。然而伪党党员号称 10 万之众，实属虚报，实际人数恐怕连半数也不到，究竟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楚。到 1944 年 11 月汪精卫死时，不少地方党部和下层组织，已很少有人在专事负责，因此使陈公博的“整理党务”、“党籍登记”、“选党代表”等等，颇费周折。陈公博导演的这场丑剧正在进行之时，随着晴空一声霹雳，日本投降，也就不了了之。

在布置反共军事方面，陈公博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日后归顺蒋介石的见面礼。从 1945 年 3 月起，他开始对各沦陷区进行“视察”，布置反共军事。他先到杭州、苏州，4 月到北平。到了 5、6 月间，太平洋战争已是最后阶段，日军败局已定，盟军飞机经常出没沦陷区天际，轰炸日伪目标。日军气焰也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一般伪官也纷纷准备后事。这时，陈公博抓紧了其反共军事的布置和“视察”。6 月中旬，他带着伪府参军长卢英、主席公馆侍从室主任（兼日语翻译）周隆庠、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等军政大员，还有日本军事顾问，由其公馆的卫士团随从保护，先后到扬州孙良诚部，泰州李长江部，蚌埠吴化文部，徐州郝鹏举部，商丘张岚峰部，郑州庞炳勋、孙殿英部，进行“视察”，每到一地，检阅伪军，训示伪军政人员，布置反共军事。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陷入困境以后，急欲从中国战场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便采用多种方式，一面发表声明诱重庆蒋介石政府“媾和”，一面进军威逼重庆就范，但均未成功。1945 年 7 月 17 日，同盟国在波茨坦举行会议，美、中、英三国于 26 日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这时，日本败势已定，对其傀儡政权——陈公博的伪政权的控制也有所放松。而伪政权的上层分子，对此局势早有预料，一些部、省级大汉奸，纷纷四出活动钻

营，寻找后路。有的找门路献媚重庆；有的大捞钱财，准备逃到海外；有的伪军将领，趁局势混乱抢地盘，抓军队，扩展实力，作为日后投蒋的资本。重庆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需要利用伪政权和伪军，阻止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以便全面控制对沦陷区的全面接收，夺取抗战胜利成果，并利用日伪军进攻共产党武装。陈公博早在此以前，就通过重庆的军统情报特务，与重庆当局进行勾搭，建立了秘密联系。原来，早在 1939 年 8 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时，军统特务徐天琛受上司郑介民的密令，伪装投汪，由林柏生在香港招兵买马来上海出席伪“六大”，以后在上海常去陈公博家搜集情报。1942 年，由陈公博委为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后当陈公博苦于无门路勾搭重庆“军统”时，徐天琛便向陈公开了他在私宅内所设的秘密电台，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为陈与重庆戴笠的勾搭效劳。陈求之不得。陈的亲信何焯贤也参与了这件事。因此，当陈继汪位后，便委徐天琛为伪府文官长。另外，陈公博还派人到重庆建立了专用电台。

1945 年 7 月 3 日，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破获，抓走了发报人员，站长陈祖康侥幸脱逃。

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到处搜捕陈祖康，陈在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到了陈公博。于是，他大着胆子来到位于哥伦比亚路的陈公博家，说明来意，请陈帮忙。陈公博想，这正是在军统面前有所表现的时候，便一口答应，这事由他来处理。陈公博把陈祖康安排到一个地方住下，对陈说：“假如日方人员来找你，你可以说是我的电台机关长，其他事情你就要他们来找我谈。”第二天，陈公博打电话约请日本上海特务处长王岛及宪兵队特高课长到家里吃饭，一见面，陈公博就以责备的口气对两个日本人说：“贵国首相请我设法

和重庆方面联络，这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现在我们刚好有一点头绪，与重庆方面取得了初步联系，你们便来破坏我的电台。这样，我怎么向贵国政府交待。”两个日本特务不知内情，害怕陈公博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的上司听，怪罪下来不得了。只好连连向陈公博道歉，马上将抓起来的人放了出来。

亡命日本

日本正式投降以前的一些日子，陈公博都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开始把精力转移到与重庆的勾搭联系上。当时曾传言美军准备在中国沦陷区登陆作战，对日军反攻，日军也在准备抵抗。这曾使陈公博大伤脑筋，他不知是配合日本主子抵抗美军好，还是配合重庆与美军一起攻击日军好。后来证明美军不可能在中国沦陷区登陆，才又使陈公博一门心思地配合、投靠重庆。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曾密电重庆，报告日军将于几个地点集中、准备撤退的情况，并建议蒋介石将伪军收编为国军，以防共产党军队的接收。但是，使陈公博大为伤心的是，蒋介石、戴笠对他并不很重视，倒是看重周佛海。个中原因是，陈虽为伪政权一号巨头，但却没有像周佛海那样握有兵权、财权，实际利用价值不如周。所以，周佛海被重庆当局委以“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一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抗日工作者”，又成了“党国”要员，喜滋滋地迎接重庆接收大员到来。而陈公博却未得重庆方面的任何委任。

日本主子一投降，儿皇帝只得乖乖结束伪廷，陈公博想借结束伪政权之机，公开发表一公告，以便再次向重庆当局表示其“归顺”姿态。但因发表公告，须取得几个汉奸巨头的同意，尤其是要周佛海的同意。陈请在上海的周去南京会商。这时，周正在沪忙于组织武装，为重庆效劳，竟对陈不理不睬。陈又通过电台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蒋对陈更是不理。陈公博非常绝望。

8月16日下午，即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陈公博奉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之命，匆匆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告结束伪政府。陈通过其秘书长赵叔雍（尊岳），拿着陈的亲笔信，跑到上海催周佛海去南京开会。一些在南京的伪府上层汉奸也参加了。会上，由梅思平读了一份预先拟好的稿子，予以通过，算是宣布伪府解散，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伪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周佛海分任两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以等待和协助重庆方面的接收，立功赎罪。陈公博在会上提出：“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南京方面所牵涉的人数很多，如何善后，应该谈谈。”还提出如果伪府人员不被重庆方面接受，能否另走他路。陈的话未讲完，已吃了重庆当局“定心丸”的周佛海即反对说，伪府既已通过解散，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便拂袖而去，忙着准备伺候他的老主子蒋介石去了。非但如此，周佛海还向蒋介石密报邀功，说陈公博在南京不稳，想投共产党；同时又请蒋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催促，要冈村逮捕陈公博及其他大汉奸。陈公博感觉到自己被周出卖，怨怒、羞愧、惧怕交集，开完会后即回寓所抱头大哭了一场。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派人找到先期到达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他牵线，向蒋介石表示，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行

动，来求得他的宽恕。杜月笙表示愿意帮忙，他说："我可以把这一信息转呈委员长，请陈先生耐心等几天。"可是陈公博满怀欣喜地等了好几天，杜月笙那里没有任何消息。

在此绝望情况下，陈公博请求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帮助他乘飞机逃亡日本。飞机原计划先飞青岛，然后再飞日本。可是到了青岛机场后，得到消息，盟军已通知日本，每天中午 12 点以后，日本上空禁止飞行，否则会遭到盟军飞机拦截和攻击。于是日本军方临时决定，飞机直飞日本，抢在 12 时之前到达目的地。

日方派出了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原汪伪军事及经济顾问小川哲雄陪同陈公博一行，并负责安排沿途的生活起居。因为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日本军方认为，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介入，便决定让飞机在不为人注意的米子机场降落。陈公博上机后，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当小川哲雄把飞机将在米子降落的消息报告陈公博后，陈公博愣了一下，接着说："全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一切以安全为要。"

很快，飞机飞临日本本州岛阴县西郊的米子机场上空。飞机做好准备正要降落时，飞行员忽然发现，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跑道上还散落着被炸飞机的残骸。

飞机无法降落，便在机场上空绕行了一圈又一圈。这时，飞机燃料已尽，油压表上红灯闪烁，提示再不降落将会机毁人亡，飞行员只好横下心进行迫降。

飞机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好在飞行员技术熟练，飞机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停在了跑道尽头。此时，陈公博脸色苍白，飞行员也是一身冷汗。

时间已是正午，陈公博一行下了飞机，但见机场上空无一人，

烈日当空，炽热难耐。小川哲雄让他们先在飞机机翼下躲躲太阳，他跑到机场附近的一片松林里找来一辆破卡车，将陈公博一行送到了市政府。

米子市市长为他们弄了点吃的，然后将他们安排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去住。

从市政府到水交馆还有一段路程。市政府没有车，市长好不容易找来一辆消防车，把陈公博夫妇安排坐进驾驶室，其他的人则站在消防车两边，像受训的消防队员一样，壁虎爬墙般双手抓紧拉手。陈公博的情人兼秘书莫国康身着艳丽旗袍，挂在车上格外显眼。这一行中国人站在消防车上，招摇过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水交馆”原是日本海军的俱乐部，日军战败后，这里已是人去楼空，破烂不堪，房间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陈公博只好在草席上安身。堂堂“国民政府”主席，如今连乞丐都不如，陈公博的心里不是个滋味。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陈公博一行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暂住。考虑到陈公博的安全问题，在望湖楼没住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陈公博送到京都，陈化名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时值盛夏，溽暑蒸腾，陈公博住在金阁寺，满腹心事，寝食难安。一天晚上，周隆庠匆匆走进陈公博的房间，说道：“我刚刚看到晚报，梁鸿志等已遭重庆方面通缉。”

陈公博闻讯，脸色陡变，自言自语道：“梁鸿志不过是和平政府的监察院院长，我还是代理主席，如此看来，蒋介石肯定不会放过我！”

陈公博挥了挥手，周隆庠退了出去。

“看样子，我一切全完了！全完了！”说着，陈公博猛地拉开抽

屉，取出一把手枪，对准脑袋："劫数难逃，与其这样东躲西藏，活着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

李励庄见状，跑过来一把抓住手枪，争夺中扳机被触动，只听"砰"地一声，子弹打到了天花板上。

"早晚不得好死，为什么不让我早点死了呢？"陈公博嚎哭起来。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从这以后，她寸步不离守着陈公博，防他再寻短见。

陈公博欲寻短见的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日本政府心生一计，便通过同盟通讯社播发了一条假消息：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日本政府这样做的用意是，让陈公博就此长期隐居日本，逃脱中国政府对陈公博的惩罚。

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何应钦指出，陈公博私逃日本，对外宣称自杀，企图逃脱制裁，日本政府必须马上将其交出。陈公博如果真的是自杀，将由中国方面派人验尸。

毙命苏州监狱

日本政府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最后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10月3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将陈等从日本押回南京。同月11日，陈公博被解到看守所候审。

与其他汉奸相比，陈公博在看守所是比较受优待的。他独自关押一室，吃饭有人送，刚去的时候，伙食也还可以。只是有一点颇

感不便，就是每天下午倒便桶的时候，陈公博与众囚犯挤在一起，人多，吵吵嚷嚷，时常发生挤撞，他感到有失体面，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天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要求获得了批准，陈公博得到了每天提前倒便桶的优待。

后来，看守所的伙食越来越差，用黑面粉做成的面疙瘩，嚼在口里如同木屑，难以下咽，关在这里的汉奸们称作"原子弹"。陈又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这次没有人理会他。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陈没有被提审过。他不甘寂寞，每天吃过早饭，便伏案写作，主要是撰写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在这篇长达 3 万字，题为《八年来的回顾》的文章中，陈公博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

一天上午，陈正在写他的文章，军统局长戴笠突然来看守所看望他。戴把陈公博叫到办公室，与他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戴笠说："陈先生，委员长对你的事情很关心，这次特地派我来，是要我转告他对你的问候。同时，要你安下心来，好好反省，到时候，政府会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你的问题。这里的条件不好，只得委屈你几天，生活上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话，可以告诉狱方，能解决的他们会尽力解决。"

"谢谢委员长对我的关心，也谢谢戴先生来看我。我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唯一的请求，就是对我的问题希望快作决断，是死是活，我都认了。"

与戴谈话后，陈公博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囚室里喜形于色。他想，戴笠此时来看我，是在向我传递一个好的信息，平时一言不发的他，这时也无话找话地与看守聊上几句，高兴之时还哼上

几句《春草闯堂》。

可是没过多久，戴笠乘飞机失事身亡。得知戴笠摔死的消息后，陈公博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太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了。戴笠不死，老蒋作过的承诺，有可能到时兑得了现。现在戴笠死了，死无对证，蒋介石说过的话，肯定会一阵风吹过。

果然没过多久，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心中暗暗叫苦：进了“狮子口”，看来生还的机会没有了！

1946 年 4 月 6 日下午 2 时，法庭开庭，公开审判陈公博。这天，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踩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这身装扮，不像是一个就要被审判的囚犯，倒像是出席会议的代表。见记者前来拍照，陈公博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由首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陈公博听完起诉书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八年来的回顾》。审判长同意了他的要求。陈连忙打开卷宗，朗读起来。

在这份自白书里，陈极力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为自己当汉奸推卸罪责。最后，陈对起诉书提出了辩护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花了 1 小时 55 分钟，陈才把这份材料读完。

随后，审判长按起诉书，逐条询问犯罪事实。陈公博均供认不讳。接着，又由法庭指定律师为陈辩护。

对陈的辩护理由，法庭一一予以驳斥。铁的事实，使陈公博哑

口无言。退庭时，已是晚上 8 时 20 分。4 月 12 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宣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陈的双腿不停抖动，神情紧张。审判长继续宣读："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这时，陈才回过神来，回头向左右旁听席上四望。当法官询问陈是否上诉时，陈回答道："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过，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在上次让我朗读完《八年来的回顾》全文，我心满意足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感谢。"

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可是同月 20 日，陈妻李励庄还是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企图救陈一命。同时，她还向报界发表谈话，声称陈通过"军统"徐天琛所设的电台，向重庆当局汇报日军情况。而重庆方面经奉"委座"嘉勉的录谕转达电报现在仍然保存，是否可以公开。李的申请状被最高法院驳回。

5 月 14 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呈送司法行政部核发执行命令。

6 月 1 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次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陈公博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倒也显得心神气定。同狱的大小汉奸们，想趁这个机会，求点陈公博的"遗墨"。陈公博有求必应，乐此不疲。

这天，天刚蒙蒙亮，陈公博起床后，刚刚洗漱完，看守长拿着一迭宣纸，匆匆进来。

"陈先生，请你为我写一副对联吧。"看守长的语气有些急促。"你想写什么呢？"陈公博似乎有些不太情愿，碍于看守长的面子，不写也不好。"写什么都可以，你看着办吧。"

陈公博展开宣纸，稍作思考，饱蘸浓墨，便写了起来：大海有真能容之量；上联写完，陈公博眯着双眼，仔细端详这几个字。可能是刚刚起床，心境平和，字写得刚劲有力，他面露几分得意之色。接下来，陈公博一气呵成，写完了下联：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当写到最后一个“心”字时，囚室门“哗啦”一声打开，几名法警荷枪实弹走了进来。

陈公博手一抖，一滴墨水掉在白纸上。

“是不是今天执行？”陈公博面色苍白，极力想掩饰内心的恐慌。法警不置可否。

“我可以写几句话吗？”陈公博又问道。“可以。”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点了点头。陈公博提笔又写了起来。

他先给家属写了遗书，接着又给蒋介石写了封信。信中，陈公博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想想停停写了好一阵，仍未写完，他自言自语：“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写了也未必管用，还是不写了吧。”将笔一放，说道：“走吧，来生再会。”说完还故作洒脱地跟法警握了握手。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信。

大约在8点半钟，陈被带到监狱设置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我给蒋主席的信，只写了三分之一。”“可否在1小时内续成？”“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你们可以调查。”

“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法官见陈至死不改汉奸本性，打断了他的话。

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及褚民谊诀别，狱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陈公博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隔壁陈璧君的囚室。他向陈璧君鞠了一躬，双手捧上茶壶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

陈璧君闻言失声恸哭：“公博，我们曾经患难与共，岂知你先我而去？我们来生再见！”

法警带着陈公博来到褚民谊处，两汉奸四目相对，自知罪大恶极，默默无语。

随后，陈公博向刑场走去。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对行刑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干净点。”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理了一下蓝色的布料长衫，然后左转面北，双手插入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道：“快开枪！快开枪！”

“砰！”枪声响了，陈公博应声倒地。

几分钟后，法医上前检查，陈已气绝。

这天上午9时，陈公博之子陈干偕汪精卫的女儿来到苏州。此时，列刑刚执行完毕。他们没有到刑场，只是嘱托陈公博的副官将陈的尸体送苏州殡仪馆入殓。随后，将陈公博葬在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没有立。

周佛海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蒋介石的亲信

周佛海，原籍湖南沅陵，1897年5月，出生于他父亲任职所在地——福建莆田。周佛海10岁时，他父亲因为禁烟受当地士绅威逼，上吊自杀。周佛海的母亲马氏就带着子女返回沅陵，依靠100多亩田产维持生计。

周佛海出生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剧烈动荡之中。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程大大加深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不甘被奴役的炎黄子孙，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周佛海出生后的第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就发动了一次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虽然这场运动只持续了105天，就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扼杀，但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却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1899年，北方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虽然这次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

合绞杀，但是义和团运动使外国侵略者意识到了中国人民是不可用武力征服的，他们被迫采用“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和清政府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登上了历史舞台，掀起了更加猛烈的救亡图存高潮。

然而，这些对周佛海来说太过陌生。因为沅陵这个地方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外界的新思潮很难波及此地。1911 年，周佛海 14 岁，正在乡间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这一年的 10 月 10 日，武昌爆发了反清起义，激烈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到 11 月底，全国即有十几个省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陷入土崩瓦解之中。这个时候，周佛海才读到了梁启超写的《中国魂》，对文章中的许多新知识、新名词以及忧时愤世的风格，他感到十分新奇，受到启发，因而把他背得滚瓜烂熟。可以说，这个时候，周佛海才受到新思潮风气的吹拂。

1912 年初，周佛海获悉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招生的消息，就立即进城报考。不料，进城以后一经打听，高小入学考试已经结束，离发榜只有三天了。周只好托在县政府任教育科长的同乡吕鹤立去说情，得以补考。补考这天，考试出的作文题目为“爱国说”，周佛海就机灵地学着梁启超的风格，把《中国魂》里的新名词、新知识全部搬到了自己的文章中。在当时风气未开的小县城，这样的文章，自然出类拔萃，结果周佛海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周佛海人很聪明，又由于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为班长，颇出风头。第一年他刻苦好学，平安无事。可是第二年他就开始惹是生非了。

原来，沅陵高小素有老生欺负新生的风气。周佛海刚进校的时候也被别人欺负，第二年他就开始欺负别人了。在一次体育课上，

周佛海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要坐在草地上看他们热闹的一个新生走开，可这位新生偏偏不吃他们这一套。他们就把那位新生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位被打的同学将此事报告了校长。周佛海因为没有被认出来，侥幸免于处分，但是他的一位年长的同学因此却被开除。周佛海心里感到很内疚，认为自己无颜在学校继续待下去，就自动退学去了长沙一家中学就读。不久，因为功课跟不上且费用高昂，周又通过吕鹤立的关系转到沅陵县立中学，这时的吕也已经从教育科长的位子调到该校任校长。

这时的周佛海读书非常用功，虽说不上有什么大志，却是颇有上进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还开始关心起政治来。他一面学习功课，一面常常阅读《东方杂志》等刊物。此时的周佛海血气方刚，眼界大开，心里充满理想与抱负，“因为留心政治，居然隐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气概”。当时军阀各派争权夺利，内阁更换频仍。这种政局让周甚至做起了入阁的美梦。当然，这对于出身低微的周佛海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折。1917 年夏，沅陵河水泛滥，周佛海无法去县城继续读书，只好滞留家中自学。大水退后，周佛海离家返校，一个同学见到他就告诉他可以到日本留学了。周佛海以为是开玩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穷乡僻壤，不要说留学，就是考上京城的大学也比登天还难。但这次周佛海确实是交了大好运了。原来，校长吕鹤立不久前收到留学日本的一位校友的来信，说东京的生活费用并不高，一年只需一百五六十元就足够了，如果学习努力，第二年还可以考取官费。吕校长非常器重周佛海，决定让他去试试。周一听，欣喜万分，认为这就是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在校长和几位好友的大力支持下，周佛海凑足

了去日本的费用。7月他就告别了师友和妻儿老小，东渡日本抵达东京留学。

入住东京湖南人开办的一家旅馆后，周佛海就开始学习日语和补习其他课程，准备明年报考官费留学生。后来，由于留日学生闹学潮，他的学业曾一度中止。原来，那时候，亲日派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掌控着中央政权，1917年初，他以参加欧战为名，向日本大举借债，以扩充自己的实力。1917年8月到1918年9月，段祺瑞以银行、矿业、交通事业作担保，向日本借款5亿日元。1918年5月，段政府又同日本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大批的日本军队以此为借口，占领了东北和蒙古。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群起反对。他们一面派代表赶赴北京、上海发动学生请愿；一面鼓动全体留日学生统统回国，以抗议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

周佛海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起初积极主张回国。但真要回国时，他又犹豫了。回去的话，就意味着要抛弃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但是不回去，又有失面子。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一个朋友介绍他到辽宁省安东县厘金局一个同事那找点事做，等过了这个风头再回来。

计划已定，周佛海就离开东京，直奔东北去了。可一到那儿，情况让他大失所望，负责接待他的同乡说这个局已经人满为患，无从安插。进退维谷之中的周佛海对前途感到悲观绝望。他甚至想到跳海自尽，一死了之。最终理智使他决心重返东京，努力报考当时比较难考的东京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于是，两周后，周向那个同乡借了盘缠，再次回到东京。

按当时北京政府的规定，考取第一高等学校和另外四所日本国

立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均可享受官费。周返回东京时，离第一高等学校的考期只有三周了，周佛海就开始废寝忘食地复习各门功课。各科中最让他头疼的是日语口语面试。然而几年来的经历和锻炼，使老练世故、善于投机取巧的周佛海向面试通过的同乡打听到了已经面试的内容。随后，周请人把面试的内容预先准备好。到考试的时候，他就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结果，周佛海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第一高等学校。

入学后，周佛海就用起苦功来。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晚上11点就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年以后，周佛海从一高预科毕业，离开东京，入日本风景秀丽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一方面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潮正席卷全国。周佛海在进入日本第七高等学校前已经接触到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入校后，他专门阅读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对西洋历史和国际形势，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受到感染，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此时的周佛海不光用心阅读，他还开始在阅读之余，将心得写成文章，寄给国内的《救国日报》，结果被采用。周受此鼓励，以后，不时向国内各种刊物投稿。1919年10月，周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刊登在张东荪主编的杂志《解放与改造》上。此后，他又在该刊发表了数篇文章。同时，周佛海还翻译了一本日本社会学著作，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文章及译著的出版，不仅使他与张东荪有了交往，而且在上海知识分子中也小有名气。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省亲。当时，

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使他无法回乡，不得不滞留上海。周佛海虽然探亲不成，在上海期间却经李达夫人的介绍，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杨淑慧。其间周佛海还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并在张的介绍下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相识。

一天，周佛海和张东荪、沈雁冰等人应陈独秀之邀来到陈在上海的住宅，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也在座。魏金斯基指出：中国思想界太复杂，要改变思想界的这种局面，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必须组建中国共产党。魏金斯基的谈话，对周佛海来说，非常新鲜。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兴革命党？这个问题立刻在他脑海中萦绕。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一块敲门砖吗？于是，周佛海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他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共产党的活动。暑假结束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0年11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共产党》月刊，为创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上、组织上的种种准备。周佛海是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以"无懈"的笔名，相继发表了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夏天，周佛海得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后，便利用暑假赴上海参加了"一大"。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委员长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一大"以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而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

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返回上海后不久，他带着恋人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照理，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没有继续前进。相反，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渐动摇起来。

早在1921年，由于他在上海的活动已经被日本警察侦知，当他回到鹿儿岛时，便受到日本警察的暗中监视。他的导师们也以学籍相威胁，于是周佛海十分害怕，“就老老实实地用功”，每天躲在图书馆里，随之也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时的周佛海事实上已经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1923年即将毕业之际，周佛海又添了一个男孩周幼海，生活负担加重。周经常为找不到适当的工作而犯愁。起初他想去北京大学当教授，可是北大人才济济，周佛海名不见经传，其学历、水平根本不够资格，因此被北京大学拒绝。不得已，他又想到商务印书馆去当编辑，薪水不低，工作也清闲。可是编辑工作也并不好安排。就在周佛海为了毕业找工作焦虑不安的时候，他的意外惊喜又一次降临。

原来，1924年初，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秘书。收到戴的信后，周佛海喜出望外，在没有完成论文答辩的情况下，就急忙返回国内，于5月抵达广州。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到达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以每月240元的高薪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周佛海从此对这二位“救星”感恩戴德。

但是戴季陶、邹鲁二人都是属于国民党右派，他们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政策心存不满，是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周佛海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但他此时还没有脱离共产党，仍然参与党的工作。按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拿出四分之一的薪水缴纳党费。此时已成为周佛海妻子的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的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党吧。"为了达到退党目的，周佛海拒不缴纳党费，拒绝参加党的组织活动，而且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尽管如此，中共广州组织还是耐心地批评教育他，帮助他认识错误，引导他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周佛海却毫无悔改之意，决意与党分道扬镳。对于周佛海的这种变化，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十分重视，想方设法挽救他。1924 年秋的一天深夜，广州区执委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并没有听进去。第二天，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为纯净党组织，中共中央准其脱党。

脱党后，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他多次拜见戴季陶，戴季陶对周佛海这个反共"后生"寄以"厚望"并面授机宜。周佛海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并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制造舆论，摇旗呐喊。1925 年 11 月，他参与"西山会议派"掀起的反苏、反共逆流，并被推举为宣传部长，后因赴日参与学位论文

答辩，未就职。

1925年3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后辗转到上海，一面为反动报刊写些反共文章，一面仔细观察形势。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地位也节节上升。周佛海决心效力蒋介石，以实现其更大的政治野心。不久，他拿着戴季陶的推荐信，到武汉面见蒋介石，但不巧的是当时蒋介石不在武汉。同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周佛海被任命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建立了与武汉政府相对峙的南京政府。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迅速在武汉掀起，周佛海坐卧不安，决定离开武汉乘“汉申号”轮船前往上海。周佛海买的是头等舱，妻子、岳父，还有两个孩子，一家五口共住一室。

第三天上午，船过镇江，船上负责照料周佛海的服务生匆匆进来，说：“周先生，刚才从镇江码头上来四个人，说是要找您，等您到了上海后要把您抓起来。”周佛海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他分析：这几个人不会是武汉方面派来的，要不然他们不敢在上海动手抓人。如果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人，那倒不要紧，我这次就是投奔蒋先生而去的，一切到蒋先生那里都可以说清楚。转而他又想，上海现在乱糟糟的，万一与蒋先生联系不上，坐几天班房、受一点皮肉之苦倒没有什么，要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当作武汉方面派来的间谍，拉去枪毙了，岂不成了枪下冤魂？

周佛海随即与妻子商量，到上海后，自己先上岸找电话，想法与南京张治中联系，告诉他此行的目的，避免上海因误会遭逮捕。随后，妻子带着孩子和行李再上岸。

晚上8点多钟，“汉申”号一声长鸣，靠上了上海码头。按照

计划，周佛海与岳父杨自容先上岸。杨自容把周佛海送上出租车，见码头上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才返回船上搬运行李。哪知周佛海的汽车刚开出没多远，便被一群法租界的巡捕拦住。他们把周佛海拉下车，戴上手铐，把他送到了巡捕房。周佛海被捕的时候，恰好昔日留日同学陆勇财路过此地，情急之中，周佛海用日语告诉陆勇财，请他赶快告诉还在“汉申”号上的老婆杨淑慧，要她设法营救。

周佛海在巡捕房关了五天，后被引渡到丰林桥特务处。

丰林桥特务处是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就被枪毙了。几乎天天都有人从这里被拉出去“审讯”，他们出去以后，就没有再回来。周佛海关在丰林桥，又度过了惊心动魄的十天。只要监房里提审犯人，他就心惊胆战，吓得要死，生怕把自己拉出去枪毙。再说杨淑慧接到陆勇财的报信后，知道周佛海被抓。她把孩子和父亲安排到一家旅馆住下，便四处奔走，设法找到了张治中、戴季陶等人。张治中打听到了周佛海关押的地点，还亲自到牢房看望周佛海，安慰他说正在为他办理出狱手续。

丰林特务处处长叫杨虎，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在他眼里，周佛海就是武汉政府派来负有秘密使命的间谍，是共产党重要嫌疑犯，这么重要的人物，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人说情都不能释放。为此，张治中还与他大吵了一通。

周佛海被逮捕的事逐级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蒋拿起特务处送来的材料，只看了一眼标题，就在旁边写了几个字：“与周面谈一次，蒋。”

就这几个字，救了周佛海的命。

周佛海吃了14天的牢狱之苦，终于被放了出来。一出监狱，周佛海便来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同年8月，由于宁汉双方及蒋桂矛盾，蒋介石被迫下野。周佛海失去靠山后，便也离职而去。

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大权独揽。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周佛海官升一级，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蒋代拟重要文稿。他负责出版以反共、巩固蒋反动统治为主旨的《新生命》月刊，并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此后，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高喊“共纾国难”，但又不愿放弃私利，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三个地方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周佛海参加了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国民党四大。由于蒋介石的提携，他当选中央委员，且得票最多，占出席代表的百分之九十，由此被他周围的人戏称“状元中委”。12月29日，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周佛海还一度列席南京临时常务会议。1932年1月，经蒋介石同意，周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后来他在这个位子上待了六年多。1933年，他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相继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从1927年到1939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可谓红极一时。但是，蒋介石却料想不到周佛海会背叛他。

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

从历史上讲，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无渊源，而且由于蒋、汪对立，他是反汪的主要人物。在历次蒋、汪斗争中，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在助蒋反汪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周、汪两人似乎是势不两立的对头。早在 1925 年底，周佛海背叛共产党并大骂共产党的时候，汪精卫那时仍然标榜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对周的政治品质非常反感，斥责道：“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对于汪的指责与嘲讽，周佛海反唇相讥：“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起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周还挖苦汪精卫是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的官僚政客。

由此可见，周、汪之间的怨恨之深。但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当全民抗战的浩大风涛卷来之时，各式各样的人开始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蒋介石集团被迫停止内战，进行国共合作，容共抗日；汪精卫却坚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国论”。蒋、汪为了各自的利益分道扬镳。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由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上的相通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周与汪本来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怎么走到了一起呢？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怨沸腾，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于是就利用汪精卫见利忘义、变化无常的特点，派人与汪精卫暗中联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实现了蒋汪合作，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负责军事；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主持政务。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与行政院长汪精卫成了部属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和汪精卫来往。蒋介石了解周佛海的处境，曾经对他说过："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

得此密旨后，周对汪的指示总是很顺从遵照执行，从而深得汪的赏识，两人的关系也就亲密起来。1935 年 11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周佛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目睹了汪精卫遇刺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场面。周当时吓得六神无主，躲在了一个墙角不敢动弹。不久，汪精卫出国治疗枪伤，周佛海暂时与他失去了联系。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感召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前去督促他们和红军作战的蒋介石。汪精卫得知消息后，急匆匆地从法国赶回。次年 1 月抵达香港，国民党派周佛海等为代表，专程前往香港迎接汪精卫。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汪精卫和周佛海都表示坚决反对，两人一见面，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由于对日主张的一致性，周、汪越走越近，最后周干脆背叛蒋介石，积极帮助汪从事投降活动。周佛海曾对友人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

教育厅厅长，当过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政治野心。最后，周佛海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0 年 3 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可谓位高权重了。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虽然下定了抗战的决心，但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主和”潜流。周佛海与汪同调，“始终认为战局不会扩大”。周认为，中国与日本开战，是决不能侥幸取胜的。在他看来，蒋介石“绝顶聪明”，蒋不是不知道这个，但是在朝野上下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时，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还要比别人唱得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在这样的想法下，战争一开始，他就与汪精卫、陈公博、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频繁密商与日和平外交。当时他们几个人经常汇集到周佛海在南京的一所寓所的地下室里，一则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一则大谈“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调子。胡适深感这个地方的气氛与外面不大一样，就给它起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这一时期，周佛海的日记中充斥着他悲观情调的语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始终认为，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宜准备外交接洽。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他主张，当胜负未分之际，最好“保全实力进行外交”。但他们“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他认为，“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时局如何收拾，战争到何程度，似未在考虑之中，令人焦灼”。战

事逐步扩大，周佛海“焦灼万分”，“殊觉苦闷”，“食不甘味”，“瞻念前途，仍有不堪设想者”。每谈前途，他都颇觉黑暗。

至上海失陷，军事溃败，拟行迁都，周佛海“心乱如麻”，感到“前途暗淡已极”。11 月 14 日，他日记中记载：“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比（利时）京会议（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将发表宣言，一散了事。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悲观万分。午痛饮解愁。综合各方情况，前途暗淡已极。”为避战祸，他将妻儿老小送回湖南沅陵，与他们分离相别时，他写的是：“黯然魂销，唯别而已。复念时局如此，家庭团聚不知何日。返家后，睹人去楼空之日，尤令人感伤不已。”撤离南京前夕，1937 年 11 月 17 日，他在日记中写与友人相别的情景：“重雾笼城，天昏地暗，此别不知再会何日，相对泫然……日来悲观之至，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何必记日记？”

11 月底，日军占领上海后，开展了陶德曼调停的阴谋活动，企图通过“和谈”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尽快从战争中抽身。得知这一消息后，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成员极力主张与日“停战”。周曾多次向汪精卫进言，希望能促成陶德曼调停的成功。事态的发展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愿望相反，由于日本缺乏诚意，所提条件甚为苛刻，损害了蒋介石英美派集团的利益，因此这笔交易未能实现。但是，周佛海一班人并不死心，他们继续寻找门路，想方设法与日本暗中联络。1937 年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周佛海伙同陶希圣，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半官方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周任该会总务总干事，陶任研究总干事，其他负责人也大多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该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执行反共降日任务的反动组织。

在武汉期间，周佛海一心想着的还是与日“言和”。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盖久战之后，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唯正因此种种关系，将来必有严重悲剧。”1938年2月，周佛海征得蒋介石、汪精卫同意，让高宗武以及汪的亲信林柏生分别在香港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和“国际问题研究会”，以搜索情报为名，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进行求和活动。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周佛海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不思如何宣传抗日，反而一心“谋求和平”，他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赴香港与日方秘密“交涉”之打算，后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告知他要打消这个主意，“恐起物议”，他还“闻之不胜懊丧”。在抗日阵营中，“和”与战两条路线之争，使周佛海与蒋介石距离愈来愈远，而与汪精卫越来越紧密。周与人“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人共党，复不愿为日人傀儡，除自杀外，尚有何法？”蒋介石对于他的宣传工作不满意，他认为：“唯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现实，决不能实现。”他感到：“以后局势日益紧急，前途困难，方增未已，为之怃然。”1938年8月中旬，当他飞离武汉赴渝时，其心境：“出发在即，一时心绪纷烦（繁）”，“忍痛动身……别矣武汉！后会不知何日。武汉八月，宛如一梦，人生别离，本极痛苦，况永别耶！”

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竟毫无奋发勇进、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气概，却整日里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之中。在周佛海的心中，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相反，他越来越觉得，抗战必然亡国。他写道：“民国成立27年，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不禁凄然欲绝。临与武汉告别

之前，均觉垂头丧气也。”“今后局势愈益艰难，而无补救之法，为之太息。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的思想心理支配下，他追随汪精卫，想“打破难关”，采取“非常之举动”，名为与日本谈“和平”，实则走向投降日本的深渊。从周佛海的日记中，不难找到他走向这条死道的心路历程。

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关于这一点，周佛海有所说明：因为“汪先生（汪精卫）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主和）写给蒋先生（蒋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运动。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不借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不以汪为中心，他们将一事无成，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周、汪配合得相当默契，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在日本政府的诱降政策下，11月中旬，汪精卫、周佛海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日军占领区虹口东体育会路重光堂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举行会谈，秘密签订了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并拟定汪精卫等人逃离重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建立汪伪“和平”政府的步骤和办法。

按照预定计划，周佛海先让他的老婆杨淑慧带着子女前往香港。1938年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由重庆先行飞至昆明等候汪精卫等人。可就在这个时候，事情突然有了变化。

原来，就在汪精卫预计叛离重庆的前一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返抵重庆，这无形中打乱了汪精卫的出逃计划。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让陈布雷电召周佛海立即返任。这下可吓煞了周佛海，后来周曾向别人道及当时的心情："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来了，会有这样的巧合吗？"周佛海一面用含混的说教制造假象，一面派人携带其亲笔信立即飞往重庆，探听汪精卫的消息。直到汪精卫告诉周佛海，目前蒋介石尚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时，周佛海才惊魂稍定。12 月 18 日，心急如焚的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的时候，逃离重庆，飞抵昆明。19 日，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周佛海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专机，顺利逃到了越南河内。20 日，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也尾随而来。

为了便于今后对日"和平"工作的开展，汪精卫一到河内，便指定汪本人、陈公博、周佛海等八个"首义分子"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又组织了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军事均由汪充任主任委员，财务委员会则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不仅如此，周佛海还兼任了政委会、军委会秘书长。这就奠定了他以后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从此，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投敌的情绪也越来越高。

对于汪精卫集团的出逃，日本方面提出近卫三原则，要“和中国同感优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汪精卫对近卫声明“大喜而深信”。但是，汪伪集团核心领导人中间，对于“和平运动之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以在野的立场集合同志，以宣传和平运动”；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以在野的立场进而组织政府，以实现和平运动”。周佛海坚决主张后一种意见，结果被汪精卫采纳。

对于周佛海的叛逃，蒋介石曾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劝他回心转意，但遭到周的拒绝。后来重庆方面又通过上海大亨杜月笙去劝告，杜亲自找周佛海谈心。周表面上作出“后悔”的样子，说他拥戴蒋委员长始终如一。实际上，他此刻正在上海积极进行成立伪政权的活动。

27 日，汪精卫将亲自拟就的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交与周佛海及陈公博、陶希圣三人，令他们带往香港，让林柏生在他所控制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三人一下飞机，由陈公博出面，将电文交给当时在香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后，表示坚决反对，道：“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汪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由我负责。”

顾孟余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8 年 3 月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始终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因此其职务只得由周佛海代理。他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他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陈公博长期以来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力反对汪发表投敌声明，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回重庆，比之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日谋和，却仍随

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在大相径庭。

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

周佛海自河内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5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独立式小洋房里。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日夜守卫在门口。

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看了看发愣的陈公博，继续说道："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公博夹在周佛海和顾孟余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不同意吧，汪精卫、周佛海那里不好交账；同意吧，顾孟余的情面又一时撕不开。但陈毕竟是个老政客，他决定将电报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林柏生在1924年就担任过汪精卫的秘书，成了汪的亲信。抗战爆发后，林柏生奉命带了《中华日报》主要成员来香港，出版《南华日报》，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国际编译社。当陈公博将顾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这样，经过一番争论，12月29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对华声明的电文在《南华日报》上刊登了出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

《艳电》发表后，周佛海就以财委会主任，政委会、军委会秘

书长的三重身份，在港开展活动。首先，周拉拢香港金融界的实力人物——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联系国民党留港的银行家，一次就筹集到20万港元的活动经费。其次，周佛海在香港物色对象，先后拉拢了滞留香港的大批国民党失意军人，如原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叶蓬、原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长杨揆一等，另外还招到了一个笔杆子——反动文人樊仲云。

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也是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的主要组织者。周佛海会讲日语，和日本方面策划汪伪政权的要人关系密切，包办了与日本的勾结和谈判。1939年5月，周佛海随汪精卫等人一起飞赴日本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经过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伪政权的保证。

1939年7月，汪精卫发表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公开宣传建立伪政权。作为汪伪“和平运动”参谋长的周佛海立即与汪精卫相呼应，发表《回忆与前瞻》。在此文中，周佛海竭力吹捧日本侵略者，为他叛国投敌进行辩护，说中国抗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条件，与日本“停战议和”等等。周佛海此番投降卖国论调，自然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和宠信。从此，汪精卫更把他视为最重要的近臣，委以重任。1938年8月底，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了取得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合法依据，在特工总部所在地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汪、周等人在一片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接着又开始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追随汪精卫，竭尽全力筹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为了在汪伪政权中夺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方式，发展和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周佛海还

搞起特务组织，并亲任特务组织头目。经过与日本侵略者讨价还价，周佛海作为全权交涉代表先后于 1939 年 12 月和 1940 年 11 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签订秘密的和“正式”的卖国条约。1940 年 3 月 30 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旋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并先后任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质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汪伪政权成立时，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十分钟之内产生的”，伪政府实际是由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是踌躇满志的。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虑生一世也！”

当然令周佛海烦恼的事也接踵而至。在伪政权建立前夕的青岛会议时，高宗武、陶希圣（汪集团成员）将日汪密约携至香港在《大公报》上披露，令汪、周等人进退失据。接着，丁默邨、李士群（汪伪特工）为争夺警政部长席位而相互火并，周佛海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顺势兼了警政部长。周佛海在日记中发牢骚说：“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又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可见其狼狈情状。

不仅如此，还有更微妙的人事纠纷，涉及周佛海与汪精卫、陈璧君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周佛海与陈公博的内部冲突，而周、陈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周、汪冲突的曲折反映，因为陈是老牌“改组派”，和汪的历史渊源更深。

褚民谊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汪原打算安排他任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此事对汪精卫强烈不满，公开指责汪任人唯亲。他在日记中写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周还愤愤地说：“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汪索性自兼海军部长，周亦无可如何。

在决定伪政权人选时，为了操纵各个部门，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一再向周进言，要想“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周采纳了罗的意见，由罗拟了一个名单，让周核定十人（即十人团），以拥周为目的，称兄道弟，结为金兰之谊，使其成为周佛海系统内的核心、死党。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再次改组十人团，把他们安排到各部、会，成为各部、会的次长，使周的耳目遍布于各要害部门。安排罗君强其人的工作，就颇具这样的目的和戏剧性。一次，在伪高级干部会议中，周佛海提出以罗君强任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俾驾轻就熟，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知道来者不善，看穿周佛海想通过罗打进政治训练部，就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也从旁敲边鼓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罗君强虽未达到最初目的，却捡来了一个特任官。但这件事本身却暴露了周、陈（公博）也间接暴露了

周、汪之间的矛盾。

金雄白在汪伪时期与周佛海过从甚密，对周在伪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说过如下的一番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分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精卫），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权力如此之大，作风又是那样飞扬跋扈，汪精卫要是不心生猜忌和企图加以限制，那才是怪事。

褚民谊挂名汪伪外交部长，1940 年 11 月，当日、汪双方调整邦交谈判进入扫尾阶段时，有人问褚民谊，交涉情况是否顺利？褚牢骚满腹地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和影佐（祯昭）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周佛海也毫不谦逊地谈到他在日、汪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去年（1939 年）在沪两月间之谈判，全由余负责，此次余虽非外交当局，但事实上之责任恐不能不由余主持。"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德、意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周佛海的汉奸气焰极为嚣张。当时，国民党中统局在上海的情报特务人员要周佛海"暗中布置，以便将来去汪"，周佛海拒绝了。他表示要与汪精卫"生死相共，患难相随"，"决不反汪，决不反悔"。他在 1940 年 9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到："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

以国士相待，余焉忍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但汉奸毕竟是汉奸，心猿意马的周佛海言不由衷，对汪精卫作过信誓旦旦的政治道德上的“保证”后，又很快将自己的表白忘却了，再度朝秦暮楚。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下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逐渐发生变化。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最能看风使舵。周佛海在 1941 年的日记中，对形势的发展就感到不妙：“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亦不清，因观察谬误，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真可谓自怨自艾，“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但是后悔药是不好吃的。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他高叫“抗战无用”、“和平谈判”。眼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周佛海曾私下对人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周佛海决定向重庆靠拢。

周佛海先是偷偷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时，未向蒋请示，是受了汪精卫的欺骗，是对蒋的背叛，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报效党国，效忠蒋介石。

新四军在华东的发展壮大，正使蒋介石感到头疼，看到周佛海的自首信后，他喜上眉梢，马上打电话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周佛海现在向我们自首，我准备接受他的自首，要他戴罪立功。我想，命令周佛海利用一切机会遏制新四军的发展，同时抢占东南沿海地区，为日军投降接收做准备。你看怎么样？"

戴笠马上回答说："委员长英明，我立即命令上海的工作人员，与周佛海接触。"

经过上海军统特务与周佛海秘密联络后，军统便向他交待了任务。此后，周佛海就按照重庆方面的命令，开始大肆破坏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伪军，进攻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周佛海还安排了一部秘密电台与戴笠经常保持联系，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日军重要情报。

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之后，日军败迹渐渐明显。周佛海愈加把自己的希望寄予重庆蒋介石集团，一切视重庆方面马首是瞻。根据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的手谕，周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并主持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死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才走马上任。他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这正适应了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

1945年8月周佛海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立即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将利用他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维持上海的秩序，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此时国民党军队远在

大西南，也只能同意大小汉奸们“反正”了。很快，重庆方面就给周回电，并任命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得到重庆的认可以后，周佛海喜不自禁。他先是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接着又以上海市行动总队的名义发布布告。一夜之间，周佛海摇身一变，由卖国汉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风流成性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

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她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当时才 20 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

要再度作新郎了”。当杨淑慧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他们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 24 岁的张国焘与 19 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连忙紧张地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过起了小日子。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周佛海风流成性，到处拈花惹草，但杨淑慧也不是好糊弄的，在这方面，她表现得十分泼辣。1939 年 10 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

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的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度陈仓，直到抗战结束。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1949 年上海解放后，杨淑慧和儿子周幼海留在大陆。杨后来还帮助中共中央找到了中共一大的会址，为此事，董必武还专门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但不久"潘汉年、杨帆"案件牵连到她的儿子周幼海，她也被株连入狱，直到 1957 年 1 月才被释放出来。此后，她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的一个破旧的小阁楼上。1962 年冬，年迈的她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坏了腿，既无人照顾，也无钱医治，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凄凉地死在家里。

没能逃脱历史的判决

抗战胜利后，舆论界的首要话题，就是如何惩治卖国汉奸。周佛海因反共、“接收”有功，蒋想极力保他。但周佛海投敌当汉奸却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包庇汉奸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蒋介石，要求对周佛海等卖国巨奸严惩不贷。

舆论的压力，迫使老蒋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经过与戴笠的一番密谋后，蒋介石决定先让周远离上海这个是非窝子，将他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蒋认为这是一个两全之计，对周佛海，就说是避开舆论中心，送他到重庆进行保护；对外则宣称，把大汉奸周佛海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政府的处理。去重庆，是凶是吉，周佛海不摸蒋介石的底。但他知道，不去是不行的。所以当戴笠故意用商量的口气将这一决定告诉周佛海时，他只好将信将疑地答应了。

1945 年 9 月 30 日晨，戴笠的专用飞机从江湾军用机场秘密起飞，机上坐着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汉奸，戴笠随机陪同。中午 11 时半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周佛海等人被秘密安排住进了白公馆。

白公馆内的条件也不错。周佛海住在二楼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间房曾关押过叶挺将军。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齐全。周

在这里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与同来的丁默邨、罗君强等人相互串门、打牌。还可以与家里人通信。生活待遇也好，有专人做饭，顿顿荤素不缺。只是限制到楼下院子里散步，严禁到院外行走。

天长日久，周佛海便感到这种不自由的日子难熬。加之听说白公馆原是看守所，里面死过不少犯人，更是心生烦闷。他便向戴笠反映，要求调换住所。戴笠虽然对周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搬到当年美军顾问梅乐斯的寓所。这是一排十来间的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有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草地，鸟语花香。免除了那种与死人为伴的感觉，周佛海对这个地方，甚为满意。

周佛海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礼遇"呢？原来，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在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受重用的时候，戴笠也是蒋面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两人自然有着较好的工作与私人关系。抗战胜利前后，周戴关系急剧升温，好得不得了，则是利益使然。在戴笠而言，一方面，为了"党国"利益需要策反周，利用周维持上海及南京的治安，等待国民党政府的还都；另外，戴还看中了周手中的亿万财产。因此，戴对周"网开一面"，特意示好。而对于周佛海，为了留后路，则不惜与军统勾结，效劳蒋介石，戴笠就成为他的保证人与中间环节；而且，周知道汉奸罪的下场，因此他也是把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拽住不放。哪知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死去，当听到这一消息时，他慨然长叹："雨农（戴笠的字）死，我也完了！"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已经鸦雀无声，大汉奸周佛海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姑息

养奸的行为。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理亏在己，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只得指示军统局将周佛海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理。

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

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金、陈都是当时有名的刀笔吏，他们也都认为，根据掌握的证据，周佛海是非死不可的。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开庭审理周佛海。

周佛海请了三位当时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蒋介石最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抗告。最高法院驳回抗告，核准原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戴笠生前曾对周佛海拍过胸，说已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保证周的身家性命安全。可是如今，法院一再驳回申请，维持原判，这使得周佛海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周佛海知道大限已到，随时都有被提出去执行死刑的可能。所以，每当监狱里法警走动，人声嘈杂，周就以为是来提他行刑，惊

恐万状。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进行完毕，周佛海要想活命，只有蒋介石的特赦令才能够救他。

当周佛海在监狱里坐以等死、度日如年的时候，他的妻子杨淑慧正在南京城里四处奔走。杨向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等人托情，请他们向老蒋进言，周佛海不再提与重庆联系的事，只看在周抗战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入沪、协助重庆接收等，对他予以特赦。

这些国民党要员，与周佛海都是旧日的同事和朋友，对周佛海一案十分帮忙。陈果夫、陈立夫专门找到蒋，以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不无微功，请蒋予以缓刑或减刑。一次，杨淑慧去找陈立夫，恰逢陈卧病在床，他便要秘书代见，告诉她，周的事陈已专呈报蒋，要她放心。陈布雷是周佛海的旧友，他给杨淑慧出谋，要她写一呈文，向老蒋求情，请求特赦，他可以代为转蒋。陈布雷谒蒋时，将杨写的呈文交给了蒋，并与蒋密谋，如何才能将周佛海特赦出来。

周佛海的上诉被驳回的这一天正好是1947年大年除夕。满城迎新年的爆竹声，使杨淑慧心头酸痛无比。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能枪毙，杨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家。

陈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她是为何事而来，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陈一听，

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陈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地走了。

大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其实，要说的话老蒋都知道，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这也是陈布雷为杨淑慧设计的，在面见蒋介石之前，陈布雷对杨淑慧说："见了蒋先生后，你长跪不起，什么话也不要说。"

果然，这一招起到了作用。蒋皱着眉头，看着地上的杨淑慧，思索良久，以低缓的语调对杨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杨得到了蒋的许诺，感激而归。

1947年2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司法部，命令对周佛海进行特赦改判。特赦原文如下："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唯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

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签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3 月 27 日，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患有胃病、心脏病多年，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后，胃病和心脏病时有发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用了很多贵重药品，仍无济于事。

1948 年初，他的心脏病复发，只能日夜俯伏在被褥上面，喘息着、呻吟着。医生为他注射强心针，他也茫然不觉。2 月 28 日，周佛海油尽灯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的一生，时年 52 岁。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判决。

褚民谊

参加革命

褚民谊，原名明遗，字重行。浙江吴兴人。1884年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早年丧母，1898年他14岁时，国内风气初开，不久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也波及吴兴。他父亲认为：“中医有如强弩之末，不可不支西医”。于是，他父亲把他送到苏州“天赐庄”博习医院学习英语，为日后学习西医打基础。但仅二年，因继母病重回乡探望，就进当地浔经公学，开始阅读中西文学书籍，并接触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

褚民谊青少年时代，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强邻环列，虎视眈眈。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深刻的民族矛盾，越来越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全国到处弥漫着反抗的气氛，褚民谊也受到了感染。他痛心于清廷的“纪纲日坠，国事日非”的现状，因此提倡反

清革命，并给自己取名为“明遗”，表示继承明朝衣钵，想成为一名反清复明的志士仁人。

1903年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先入高中，后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阔了视野。

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去法国，途经新加坡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法国一面进修法文，一面与吴稚晖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世界画报》等刊物，并出版各种小册子，“鼓吹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主张民族解放、教育平等、思想自由”，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晚，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褚民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兼程回国，参加了次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典礼。3月，褚民谊受孙中山先生委托，赴上海任上海同盟会总机关干事。可是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野心家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许多革命党人都表示“激流勇退”，上海同盟会总机关也消弥于无形之中。褚民谊即于同年9月再次去法国，期间曾求读于比京自由大学，重过校园生活。

汪精卫的死党

就在武昌起义后回国之际，1911年底，经黄兴介绍，褚民谊在上海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后由陈、汪二人做媒，与陈璧君之母

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就这样，褚民谊成了汪精卫的连襟，并逐渐成为汪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

1915年春，袁世凯称帝野心逐渐暴露，于是褚随张静江一起回国，参与“倒袁”活动。事泄，张逃往东京，他三度赴法。

1916年协助汪精卫等组织华法教育会，办理在法华侨及留法学生“诸公益事”。共同的事业，使他对汪精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羡慕汪的历史，钦佩汪的才华。汪也赞赏他“忠厚”，时常在别人面前夸奖他。1920年，汪精卫因孙中山电召回国。褚则与吴稚晖等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同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学医，专攻组织学。1924年，他以“兔阴期变论”这篇毕业论文，获得该校医学博士学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实现了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一系列方针，开创了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大批旅居国外的国共两党人士纷纷回国。褚民谊也于同年底回国，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校长兼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汪精卫任主席，同时又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达到了政治权力的巅峰。水涨船高，在汪精卫的提携下，褚民谊也逐渐走上政坛，步入了国民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圈。1926年1月他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辞去教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负责军队的后方医务。

1927年随汪精卫积极参加武汉政府的反蒋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政客和军阀，在“共赴国难”的幌子下，实行暂时的“和平统一”，形成了所谓“蒋汪合作”

的政治局面。次年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杭州烟霞洞秘密会面后，联袂入京。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由于行政院内工作既复杂又具体，汪精卫就请这个连襟出山，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院内一切事务。

褚民谊任行政院秘书长期间，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自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并改传统的太极拳为太极操。

1934年，国民党政府正式定8月7日为孔子诞生的官方纪念日，褚民谊对此非常重视，亲赴山东曲阜，主持纪念活动，竭力宣扬孔孟之道。

1935年随汪精卫辞去行政院职务，后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29日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要求重庆政府根据日本此前不久提出的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期恢复和平”。《艳电》发表后，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声讨。此时，褚民谊正在上海。他看到《艳电》，“始知和平运动之肇端”。不久，周佛海奉汪精卫之命，抵沪活动，周曾亲临褚家，与褚民谊交谈。此事为中法国立学院的学生获悉，他们选派代表向褚民谊质问，要他表明态度。为了表明自己“清白”，褚民谊于1939年春召集该校学生及教职工，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并于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启事说“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表示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

5月上旬，汪精卫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船从河内来到上海。

当时，日本政府与汪精卫集团对此完全控制消息。汪精卫一到上海，立即秘密召见褚民谊，询问他对自己“和平”主张的态度。褚民谊有点慌张，因为他曾经堂而皇之地发表过反对《艳电》的通知，但一见面，他不仅故意不提此事，还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气概，他说道：“对汪先生的和平主张，我早有同感。”

褚民谊落水之后，由于他在国民党内原来就享有较高的地位，同时又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因而成了汪伪“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8月，他参加汪伪国民党“六大”，任伪中央党部秘书长。

1940年3月，任汪伪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参与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却在年底召开的签约“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说什么条约的签订有重大积极意义，认为它“确立了将来中日亲善之关系”。同年12月出任汪伪政权驻日大使。赴日后，他各方联络，四处奔走，写文章，作报告，拜会日方军政要人。与此同时，他又利用这个机会，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驻日使节秘密交谈，签订协约，谋取这些法西斯国家及其仆从国对汪伪政权的承认。

1941年底，褚民谊回任外交部长。他像一个“凯旋的英雄”，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他在任驻日大使时的“功绩”，表示以后要继续努力，促使基本条约逐渐实施，并与德意等国家“开诚合作，共济艰难”。从此，褚民谊要更加死心塌地地充当日本侵略战争的鹰犬。

褚民谊的所作所为，深得日本侵略者的欢心。1943年4月，日本天皇在会见陈公博时，亲自将三枚一等旭日大绶章赠予陈公博、周佛海和褚民谊，以资鼓励。褚民谊受宠若惊，把自己的命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糊涂与荒诞

国民党要员中，褚民谊素以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而著称。

褚民谊具有医学博士的学位，不过，他的博士论文叫《兔阴期变论》，内容是解剖母兔子阴道以研究其月经及性欲等情况。国民党“二大”后，汪精卫成为“党国领袖”，他附骥尾而腾青云，在政坛露脸，时常因此被人嘲笑。其实作为科研项目来说，无可厚非，没什么可笑。但是搁到糊涂滑稽的褚身上，就难免引人调侃，以至荣获了个“兔阴博士”的“美誉”。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每说及官吏无能，就“钦选”褚做典型。在蒋系抨击汪派时，他也总是首选的活靶子。

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和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拔褚民谊做秘书长，孰料这个“阿斗”更闹笑话。

他作风荒诞。南京召开全国运动会，他以行政院秘书长之尊，替广东省跳水运动员、人称“美人鱼”的杨秀琼当街执鞭驾驶马车，引得观者如山，自认为名士风流，结果被监察院弹劾有辱官声，弄了个没趣。

一次，汪精卫审阅文件，发现其中谬误百出，十分恼怒，召来这妹夫秘书长，一顿臭骂。据说汪为人伪饰，即使背后恨死某人，当面也笑眯眯地很亲切，可是他对褚民谊却不给颜面，大发雷霆。褚浑浑噩噩，还不知错在何处，只吓得目瞪口呆，束手不敢言。汪发脾气把文件推落满地，他慌忙趴在地上捡，直到汪呵斥他“滚出

去”。倒是秘书不忍心，告诉他连最起码的公文程序都搞错了，该用呈文，而用了函件。这个常识性的错误，也只会在褚民谊身上发生。幸好褚民谊乐观，事后认为汪先生到底把他当自己人看，该发火时就发火。

接着，他又闹出更可笑的笑话。一次行政院在新扩建的房子里开会，各部部长到齐，就只汪院长大人姗姗不到。隐约听到院子厕所里传来敲击声和叫骂声，原来，整个工程偷工减料，厕所的门大约也是假冒伪劣产品，锁上了就打不开，把汪精卫锁在里面了。褚民谊作为秘书长，本有监工验收之职责，可他懵懂糊涂，全然不清楚。最后还是请了个锁匠来救驾，把院长大人“解放”出来。可想而知，褚民谊少不了再享受一回“自己人”待遇，挨通迎头臭骂。

不过要说褚在行政院秘书长的位置全无作为，也不客观。他最有建树的是提倡国术，并号召大家没事都去放风筝、踢毽子、唱昆曲、打太极拳。他反对足球、游泳等洋人传来的体育运动，并很有“爱国心”地痛斥热衷这些运动的人：“枉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认为这样的人是“为礼教不能容”的。

为此，他被人阴讽有六般本事：“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追随汪精卫下水当汉奸后，他糊涂依旧，常常效忠陈璧君，在她咳嗽时为她捧痰盂。据说陈有此癖好，曾在和廖仲凯夫人何香凝谈话时，忘形令何为她捧痰盂以供吐痰，结果被何香凝愤然呵斥：“论资格，你只配给我捧痰盂！”但褚民谊忠字当头，甘于奉献乐此不疲，大姨子和妹夫二人处得融融泄泄，相得益彰。

1939年伪“国民党六大全会”召开，褚民谊被选举为伪中央监察常委。后来，一度有风声传出，可能要委派褚当海军大将。这次

可摆脱了幕僚地位，乐得他屁颠屁颠。委任状还没下，他居然先自行找裁缝定做了一套海军大将的制服，每天穿在身上对镜自顾，自觉威武无比，简直天生海军大将的材料。不料最终因陈公博与周佛海的强烈反对，未能遂愿。周佛海在日记里写："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海军大将梦醒，他走马上任汪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倒立下了汗马功劳。汪伪外交的对象，无非是日本和伪满洲国而已，可他居然周旋于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几个从属国之间，乞求法西斯国家对汪记伪政府的外交承认，算是很"尽职尽责"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代表汪精卫姐夫对日本政府效忠，表示"与日本同甘共苦"，希望"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传达与日本皇室"。这时，他大概忘了曾斥责别人"枉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的话。

日本战败，汪记政府砸锅垮台，斯时汪精卫已去世，新任"主席"陈公博难撑树倒猢狲散的颓局，各路汉奸纷纷在重庆政府寻找新靠山，如果可以搞来重庆方面一纸委任，就摇身变为"潜伏敌伪"的精忠人士，只把大门前的招牌一换，就可继续作威作福。褚民谊也稀里糊涂给蒋介石发电献媚，声称一定"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共产党乘机而人，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

羊城被捕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侵华日军已成全面溃败之势，汪伪政权岌岌可危。

11月10日，伪政权头号人物、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更让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并不甘心于伪政府的垮台，仍在做着垂死挣扎。

褚民谊时任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是汪伪政权中的第四号人物。他是汪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的骨干，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汪一死，他就伙同林柏生，全力攻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指责他独断专行，大权独揽，让自己成了个跑龙套的，只能干些琐碎的小事，坚决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但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坐镇广州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眼看形势不好，为了加强对广东地区的控制，增加以后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便电催褚民谊前去广州帮忙。

1945年7月上旬，褚民谊辞去伪外交部长一职，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就任伪广东省省长，同时兼任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主任委员。一踏入羊城，他就声称要“借着整理广东来推进全面和平，借着收拾广东来恢复全国常态”，企图在广东增强自己和陈璧君的实力，为自己留条后路。

可事与愿违，未待褚民谊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全国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月11日，刚上任一个多月，连伪省政府与绥靖公署两衙门的人员尚未全认识的褚民谊，就接到了陈公博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陈公博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政府’寿终正寝，已经自行取消了。”褚民谊一听，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每天仍照常赴省政府办公，静观时局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国民政府委任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褚民谊再也坐不住了，为了逃脱人

民对他的惩处，他大拍蒋介石的马屁，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以试探蒋的态度："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他还公开发表谈话，说："本人肩负广东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自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如因要事在省城者，立即返任，保护地方及人民。静待中央派员来接收；并遵照蒋委员长命令，严饬各师、各部队不得擅自移防，不得擅自收编及受编。"

没过几天，在陈璧君的授意下，褚民谊又给蒋介石发去一电："本人和汪夫人（指陈璧君）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两封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褚民谊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此时，广州市秩序大乱，冒出许多"先遣军"、"别动军"。伪省府及民政、建设、教育、绥靖公署的厅长们见势不妙，纷纷向褚民谊递交辞呈。伪广东海军要港司令招桂章率先在绥靖公署就任"先遣军"总司令职，号令一方。褚民谊见大势已去，就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告知广州市民："广州治安由招总司令负责，本人静待中央命令；并将省政府一切事务交与秘书长张国珍维持，专等国民政府委任的广东省主席罗卓英的到来。"

此时，国民政府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汉奸。鉴于褚民谊身份较为特殊，实施公开逮捕有着诸多不便，国民政府便将逮捕褚民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统局。褚民谊此刻还不知道，在军统局的特务陆续抵达广州后，由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布置，一张"肃奸"的巨网已经向他悄然撒开。

8月26日傍晚，按照事先的计划，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

介民亲自拜访了居住在法正路寓所的褚民谊。寒暄之后，郑介民出示了蒋介石给褚民谊的手令“铣电”两通：“重行兄（褚民谊字重行）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唯我大军入城在即，诚恐人民基于义愤，横加杀害，须饬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安置。”

老奸巨猾的褚民谊似乎看出了军统的不怀好意，他担心如若按照电文所说的来做，会给蒋介石以“畏罪潜逃”罪名来惩办自己的口实。郑介民走后，褚民谊立即来到了陈璧君的公馆，在与陈商量后，褚民谊致电戴笠转蒋介石，先是表达谢意说“委座宽大，我兄关垂，俱深铭感”，但同时表示仍愿意留在广州“现居住址”，“恭候中央安置”。其目的是想静观时局变化，以图另策。

看到军统假传圣旨的把戏即将被戳穿，郑介民再生一计。为稳住褚民谊，他再次登门拜访，一见面就祝贺褚民谊：“重行兄，你的那份电报戴局长已经收到，戴局长让你先安心住在这里，他已请示委座，估计过几天便有结果。”

9 月 10 日晚，郑介民带来了蒋介石给褚民谊的第三封电报：“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唯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叩。”

看到蒋介石如此“顾念旧情”，三番五次地“邀请”自己，褚民谊彻底打消了疑虑，落入了军统设下的圈套。

9 月 12 日，褚民谊、陈璧君等人坐上了郑介民派来的汽车，准备乘飞机去会见蒋介石。车子发动后，却不是向机场而是向珠江江

畔疾驶而去。褚民谊发现情况有变，立即责问郑介民。郑介民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得先去珠江边上船过渡，再上飞机。褚民谊听后半信半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果有汽艇在此迎候。郑介民将陈、褚送上船后，便称另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将两人交给了一位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念道："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至此，褚民谊已经完全明白，什么老蒋的"关照"，一切都只是圈套。但如今沦落到这种地步，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因此，他没有作声。可陈璧君却毫不在乎，还是按照往日的做派，大发雷霆，吵嚷着要回家去。无奈陪行人员手持武器，任她大吵大闹，丝毫不肯让步，最终将他们带到了广州郊外市桥伪师长李辅群的住宅软禁起来。

红极一时的汪伪政权第四号人物——褚民谊，就这样被军统特务诱捕而落网。

法庭上的较量

1945年10月14日，陈璧君、褚民谊等人，还有陈的长女汪文惺、次子汪文悌及两岁的外孙女何冰冰等，在广州白云机场登上飞机，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他们一下飞机便被

押上囚车，送往宁海路25号看守所关押。

刚进看守所，褚民谊便闹出了笑话。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原是伪行政院的科长级小吏，褚民谊的下属。在徐前来“欢迎”褚民谊的时候，褚还很奇怪地问：“咦，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他诧异的是，论级别，自己要高得多，这个小科长怎敢僭越！

第二年2月18日，褚民谊被解送苏州，关押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第三监狱。在狱中，褚民谊写下了洋洋洒洒3万余字的《我参加和运的经过》，为自己表功。

不久，江苏高等检察处开始对褚民谊进行押审、侦查。3月17日上午9时许，褚民谊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老老实实回答了检察官王文俊的问题，同时再次为自己表功。问完后，书记官王雄亚将笔录给褚民谊阅后，让其签完字，由法警押回牢房。

四天后，江苏高等检察处对褚民谊提起了公诉，列举了他所犯的五大罪状：1. 附和汪逆，反抗中央，出任伪职；2. 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3. 对英美宣战；4. 助敌成立振兴公司，帮助日本进行扩充军需；5. 在广东省长任内，擅加关税，补给日本军用。认为褚民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无有宥恕”，并据此送请法院依法审判。

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开庭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审判长为孙鸿霖，推事石美瑜、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一脸灰白胡须，身穿深色棉布长衫，扎脚棉裤，头上戴一顶黑色帽子。在他被押出铁门时，拥在门口的记者纷纷上前拍照，这时的褚民谊还故作镇静，笑着说：“啊呀，材料太贵，经济一点。”一时间，厅内“大汉奸”之唾骂声不绝于耳。褚民谊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检察官韩焘首先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褚民谊几大罪状。褚民谊知道，按照起诉内容，他肯定是难免一死，于是开始为自己辩解："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他把头一扬，继续侃侃而谈："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如果说他不抗日的话，则如中日基本条约改为同盟条约就较前减轻多了。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绝不追究，甚或要掩护他们……"

褚民谊对汪精卫大加吹捧，他说："国难当头，战事颓败之时"，"幸有汪先生其人者，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根据我党27年汉口临时代表大会之宣言，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实在是一个"仁人君子"。对汪精卫的卖国投敌罪行进行了一番掩饰，其目的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卖国的罪责。

褚民谊还大肆吹嘘自己的历史"绩"，特别强调他在任伪职期间的种种"有利于抗战"的事迹，标榜他"于党国，社会文化不无微功"，不仅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许多文物，还主持"收回租界"，他说："本人任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当时我国武力不足，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还狡辩说："检察官要判处我为叛国元首，事实上我是南京政府里的第十二名，前有各院院长五人，副院长五人，内政部长，以后才是我外交部长。我从事和平运动时，即有电给蒋委员

长，是否收到不清楚，后来在胜利时，接到蒋委员长电报，谓汝追随总理十余年，在广东维持治安有功，可从轻发落。”

不仅如此，褚民谊还在法庭上装疯卖傻，插科打诨，出尽洋相。当别的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时，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检察官也面红耳赤。

褚民谊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有战必有和，迟早而已”，汪伪政权的成立是“和平抗日”，“智者”所为，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元气”，其顽固不化的汉奸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褚民谊妄图洗涤他的汉奸罪行的种种诡辩，只能更加暴露他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检察官随即提出各种证据，包括录音片两张，为褚民谊在当伪外交部长时的讲话，说明伪政府所谓“救国救民”完全是无稽之谈。沦陷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和平抗战”更属可笑，故要求依法判处重刑。

1946 年 4 月 22 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根据褚民谊的罪行，审判长向其宣读了民国 35 年特字第 408 号判决。判决认为其罪行“实属甘冒不韪，最无可恕”。着对其“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苏州监狱伏法

江苏高等法庭的判决让褚民谊心里十分害怕，但他表面上依旧故作镇静。事到如今，他知道自己已在劫难逃，但却仍不甘心，因

为他手里还有最后的一个重要砝码——孙中山的肝脏标本。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的肝脏就是国宝。褚民谊一面让自己的老婆陈舜贞向首都最高法院要求复判；一面以自己手里的“国宝”相要挟，要求法官给自己以活命。

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平协和医院，其遗体被解剖后，肝脏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孙中山的灵柩在1929年6月1日奉安南京中山陵，而其内脏则保存于协和医院里。1942年3月下旬，褚民谊去北平“公干”之际，得知孙中山内脏的下落，便带至南京，送交南京市中山陵园保管；不久，褚又从日本人手中取回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原稿及《建国大纲》手迹。这也便是他的所谓“效忠国家，保存文献”的“功绩”。此时，褚民谊竟以交出孙中山肝脏为条件，要求法官给自己减刑。

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监狱，提审褚民谊。

据褚民谊交代：“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31年3月25日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27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28日乘车南下，29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柩后面，至4月1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柩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记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利时，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并称：“总理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妻子）及孙院长（指孙科，孙中山之子，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

和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于是，郑介民亲自赴上海镭射医院找到治疗癌症的专家汤齐平医生，从他那里取回孙中山的肝脏切片，返回南京。5月22日，郑介民向蒋介石邀功，说是自己探听到总理肝脏的下落，并亲自把“宝贝”找了回来。蒋介石很是高兴，把郑介民着实夸奖了一番。

此时，在陈舜贞的多方奔走下，蒋介石也发出了对褚民谊案件从轻处理的手谕，但此举招来了舆论的强烈反对。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驳回陈舜贞的复判要求，“原判决核准”；6月24日，江苏高等法院也做出裁决，再次维持原判，不做减刑处理。

褚民谊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946年8月23日，这个曾被吴稚晖称为“鼠狒黑”的巨奸被执行死刑，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陈璧君

革命岁月

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成的太平埠。她祖籍广东新会，前辈离家到南洋谋生。到19世纪下半叶，马来亚成为英国殖民地。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原是一个橡胶种植园的工人，后来经营橡胶业成为巨富。母亲卫月朗是一个识字的农家女，祖籍广东番禺县，在家养蚕刺绣，勤劳能干。

陈璧君的家庭崇尚男女平等，她在家中排行第二，被母亲视为掌上明珠。孩提时代的陈璧君就崇拜古侠客，对他们的行侠仗义敬佩不已。后来，陈耕基居家迁至槟榔屿的乔治市（今为槟城）。陈璧君入当地天主教嬷嬷堂学习英文及普通科学知识。陈的父亲心系祖国，还从国内请来先生为子女教授国文。这段时间，陈璧君的汉语和历史知识得到了很好的积累，为她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基础。

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使得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

重，国内反清革命风起云涌，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东南亚一带是广东籍华侨移民集中的地区，他们既遭受西方殖民压迫，又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熏陶。因而这个地区的反帝反封运动非常高涨。槟榔屿地处马六甲海峡入口，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孙中山等人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以及国内反清斗争的信息，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陈璧君十几岁的时候，经常阅读母亲卫月朗收藏的古今中外名著，曾有“小说姑娘”的美称。她受母亲熏陶，同情革命，关心政治。对于女孩子喜好的化妆歌舞却不感兴趣，正如她自己描述的那样：“绝对清洁，但不整齐。爱好天然，不事装饰。不会唱歌和舞蹈，好听优美音乐，但是不懂。”在嬷嬷堂学习期间，陈璧君对虚伪专制的天主教很反感，被视为教堂的叛徒。天主教会为了影响她的思想，曾撮合她与她的表兄——一个天主教徒联姻，却被她拒绝，依旧我行我素。

1907 年，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来到槟榔屿进行反清革命，计划扩大同盟会组织，促进反清事业。陈璧君对于革命派的民主思想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产生极大兴趣。对革命派的演说每会必到。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开始对风度翩翩、口若悬河的汪精卫一见倾心。同时，陈璧君经常光顾同盟会会员黄金基的维新书屋，在那里结识了会员吴世荣和汪精卫。陈璧君大胆向汪精卫表达要跟随他参加革命的愿望。

汪精卫，原名兆铭，加入同盟会后改名精卫，取意以“精卫天海”的决心进行民主革命。汪精卫生于 1883 年 5 月 4 日，祖籍浙江绍兴，后来全家迁入番禺。汪精卫出身幕僚世家，从小受到家庭的严格督教，好学上进，聪睿过人。1901 年考中秀才，1904 年考取留日官费生，1905 年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孙指定为起草同盟

会章程的八个成员之一。同盟会成立时，被选为评议部部长，又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1907年，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时报》，宣传革命思想。在报纸筹措资金发行股票时，陈璧君认购了百元股票十股，以示支持。

陈璧君的活动大多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害怕加入同盟会牵连家门，所以不敢告诉父母。但是，陈耕基最终知道了此事，非常恼怒，极力阻止陈璧君与革命党人来往，而卫月朗却并不吃惊并且庇护女儿。陈璧君并未因父亲的态度减退革命热情，看到这种情况，陈耕基提出要送女儿去英国留学。陈璧君与父亲抗争，自愿要去日本，因为日本是同盟会会员聚集较多的地方，她不想离开革命，不想与汪精卫天各一方。在母亲卫月朗的帮助下，她最终说服了父亲，决定前往日本。

1908年，陈璧君带着母亲给的钱款，准备赴日。而汪精卫在南洋的宣传工作也已经完成，准备返回日本。因此，陈璧君便和汪精卫等一些同盟会的人同行。他们一行先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去日本。

当时，孙中山正在新加坡。孙中山曾经多次去槟榔屿宣传革命，得到陈璧君和其母亲的慷慨相助。因此，陈璧君的到来，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欢迎。

在与陈璧君的言谈中，孙中山很赏识陈璧君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也看出陈有爱慕虚荣、争强好胜的缺点。因此，孙中山对她谆谆教诲："君感情过人自是好事，但不知能否允我一事？即君他日无论有何困难、危险，非至支持不住时，万勿愤而自杀。自杀只可为人，不能为己。因从今日起，已是君实行时候，则监狱、拒捕、苦行、饥饿、穷困、疾病、枪决，均将可能连续而来，君决不

至软化及投降，我信得过，能否不惮烦、不自杀，我颇担心。”陈璧君闻后应道“我誓不自杀，除非他人追杀我。或因保护秘密及其他同志之安存始自杀”。

在同盟会，因陈璧君一向表现自信，一些同志常爱开她玩笑。一日，孙中山和一些同盟会员来到陈璧君等人的寓所商议事情，邓慕汉与陈璧君开玩笑：“陈君，你的不怕死和勇气，我们都信得过，因为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出生纸，故可以大言不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璧君非常恼怒，她感到自己受到极大侮辱，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陈璧君出生在英国殖民地，因而有英国臣民的出生证。在陈离家之前，其父担心女儿安危，所以让陈随身带着。陈璧君并不认为邓慕汉是戏言，当即取出出生证，当着大伙的面撕碎。孙中山看到陈璧君如此意气用事，便批评她“怕激”。责怪她忘记绝不自杀的誓言。此时，陈璧君心中有些后悔，但更多的还是虚荣心的满足感。不过，对于孙中山的教诲，她自此铭记心头。并认为：“这便是为什么精卫死时我不死，失自由时我不死，诸同志纷纷就死时我不死。因我只要有一线可生之机，我都不死。”

不久以后，陈璧君他们的船到达东京。在那里，她结识了革命志士黄兴、黄克强、吴玉章、廖仲恺、林时爽等。他们都各以自己的所长教授陈璧君，闲暇时常常为陈璧君教授中文。当时，同盟会经费十分拮据，陈璧君慷慨解囊，得到大家的赞赏。

1907 年到 1909 年间，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失败，一部分革命党人意志消沉。也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主张以暗杀统治者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认为暗杀与革命可以并行不悖，汪精卫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推崇者，陈璧君也热心追随。

1908 年，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认为必须以

暗杀手段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与在日本的同盟会员黄复生、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黎仲实等人组织了一个“北上暗杀团”。

当时在日本的同盟会组织松散，没有统一领导。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正在新加坡，因此如何行动意见不一。一部分人要求有实际行动干起来，一部分则主张先学习，没有一个全盘计划。

1909年夏，汪精卫偕陈璧君、黄复生、方君瑛、喻培伦、黎仲实等人到香港，准备进行炸弹爆炸的试验。

清末年间，社会动荡，矛盾尖锐，民怨沸腾，两广总督张鸣歧等人外出行动十分诡秘，戒备严密，暗杀难以下手。同时，汪受孙中山之名主持《中兴日报》，暗杀未成功，陈璧君等六人返回日本。后来，陈找到孙中山的友人宫琦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之用。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听说两江总督端方将调任直隶总督，拟从汉口经京汉铁路北上，便商量赴汉口截杀端方。在汪精卫组织下，陈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带着炸药先到上海，之后转车去武汉。到武昌后不久，端方忽然改去天津，因此暗杀计划又未能实施。

两次暗杀计划落空，汪精卫提出直人北京，舍身谋刺，起到震动中外，唤起民众觉醒之目的。汪的意见得到赞同，于是进行分工，各自行动。有的去香港，

有的去日本购买照相工具，药材器材，各自行动。陈璧君与汪精卫同舟南下，汪精卫到香港，陈璧君到槟榔屿秘密筹款。

到槟榔屿之后，陈璧君为避免父亲知道实情，在同盟会支部长吴世荣家约见母亲。此时的陈母，已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的支持者。母亲知道陈要冒险行刺的实情后极力阻挠，为女儿安危担

心。但敌不过女儿的决心，一面伤心落泪，一面将自己的首饰典当了数万元给了女儿。

吴世荣知道陈璧君十分爱慕汪精卫，便悄悄问她与汪的进展，并告诉她，其母希望女儿与汪早日结合。陈因为摸不透汪的想法，于是说："我无暇顾及此事，希望你别再说，如果为汪君所闻，反多隔阂。"

几天之后，陈匆匆与家人告别。陈母将女儿送至码头，眼见船只渐行渐远，忍不住泪流满面。陈见到母亲以手帕掩面离开码头，不禁心酸不舍。

陈璧君带着钱款到日本后，与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再次见面时，陈璧君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黄复生、喻培伦制作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黄被炸瞎一只眼睛，喻的手部炸伤。

最后，暗杀的准备工作总算就绪。1909 年，黄复生和喻培伦携所需之款，先期到了北京，他们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处租了一所房屋，准备开一家"守真照相馆"做掩护。

12 月，汪精卫偕陈璧君、黎仲实由香港赴北京，方君瑛、曾醒留香港，以作后援。三人到京后，陈以赴京投考的陈四小姐名义住在黎的舅父家中。

在北京安顿之后，他们开始了准备工作。最初的暗杀对象是时任总理大臣兼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后来又改为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来的载洵、载沣等人。在打探到他们归国的确切日期后，汪精卫带着装有炸弹的铁壶，冒雪在北京车站等了一天，不料载洵下车时，有许多戴红顶花翎的人与之同行，根本无法辨认，因而未能下手。

两次失败之后，汪与黄、喻密议，决定"擒贼先擒王"，改为

暗杀摄政王载沣，并作了具体的分工。

载沣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生父。他当时居住在北海北岸醇王府。每天早晨八点出王府，往东经鸦儿胡同，入鼓楼大街，再往南入地安门，过景山，从后门进入皇宫，晚七时下朝，又原路返回。鼓楼前有一道短墙，汪精卫等原计划乘载沣路过时，将炸弹从短墙投下，将载沣炸死。经过多次侦查准备，他们最后商议决定将炸弹埋于银锭桥下，再暗通电线，以电流发火，待载沣过桥时，一按电钮，便可引爆，将其炸死。安电线，埋炸药由黄、喻负责，汪负责引爆。按爆炸力推算，如果暗杀成功，引爆人也可能难以生还。

1910 年 3 月 31 日，是开始行动的日子了。当天深夜，天高月黑，寒气袭人。黄复生、喻培伦冒着严寒往银锭桥下掘土埋设炸弹。直到第三天晚上，他们做好了准备工作，黄、喻二人准备深夜后行动。

当天晚上，陈和汪二人饮酒作别。事前他们商定，此次行动成功，汪很可能与摄政王同归于尽，如果失败，则命运难以预料。因此，这次对饮，也许是永别。陈璧君思绪万千、含情脉脉，汪精卫看到这里，想到陈与自己情深义重，在临别之时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此刻，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拉住陈的手说："我在南洋时，君母以慈爱目光向我，似欲探讯我两人之事，我以为得君之同意，故未能副君母意。明日黎明，君我便成功成仁，能否在此消息报告君母时，以我两人已订有婚约以慰老母？"陈早已有此想法，她知道母亲心意，盼着早定名分，此刻见汪精卫如此说，当即同意，于是两人举杯共饮，依然订婚，先做了名义上的夫妻。

到该出发的时候了，陈穿着长衫，戴着风帽，女扮男装，与汪

精卫共坐骡车前往银锭桥。因恐汪精卫被人认出，在途中，车上放下了车围。陈与汪相依相偎，难舍难分。

半夜时分，黄喻二人将炸药抬到桥下，放入已挖好的土坑内，大功即将告成。不料发现桥上有人，他们立即通知汪不要来。不久警察来桥下看了很久，黄知道谋刺事又告败，即回去商量对策。

银锭桥下炸弹被发现的第二天，北京各报纷纷刊载消息，街谈巷议，众说纷纭。

陈璧君很快离南京南下，取道日本回南洋。但火车到东京时，当地报纸已传出汪、黄被逮捕的消息。因为，炸弹案发生后，清政府十分重视，派人清查。经过检验，他们通过材料的蛛丝马迹，找到守真照相馆，逮捕了黄、汪二人。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被捕消息后，心急如焚，痛哭失声。当即赶往北京，表示与清廷拼个你死我活。

汪被捕后，立即被解送到内城巡警总厅。在审讯中，汪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对埋放炸弹一事供认不讳，声称此事全系他一人所为，并历数他要进行暗杀的原因，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宣称："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按照清政府的刑律，汪等谋杀朝廷要人，必定被处死无疑。但是，清政府当时正在标榜君主立宪，为收买人心，决定"廷谕免死"，以谋杀未遂判处汪精卫终身监禁。

汪被捕时，孙中山正在欧美，当听到汪被捕消息后，万分悲痛。他致函香港南洋等地同盟会组织，筹集款项，以营救汪精卫。

陈璧君很快就获悉汪精卫被判决的消息，便返回香港，约同黎仲实、曾醒等人共谋营救之策。一日，陈璧君提出："营救汪精卫等人，无巨金则很难办到，近来又筹措无术，听说有人是靠赌博发

家致富的，我们为了营救精卫兄，为什么不可以去赌一下，碰碰运气。”经研究，他们决定由胡汉民带领，陈璧君剪发着男子装，与李佩书扮成一对青年夫妇，去了澳门赌场。陈、胡等人不谙赌场之道，非但没有赚钱，还将带来百金输光。

陈璧君重金买通狱吏，给汪精卫暗传信，告诉他，大家正在设法救他。汪得到陈的手迹，非常高兴，手书“信平安到”辗转送出。又把平时与陈璧君一起朗诵的一首诗词略加修改，添人对陈的热爱：“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襟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郄头颅如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陈得到此书，更添思恋之情，更坚定将汪救出的决心。

清政府对监犯关押森严，尤其是汪这样的要犯。因此，营救工作很难展开。同时，同盟会仍在积极地组织武装起义。在吸取了多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后，革命党人开始在新军中活动，密谋再次举义。黄兴在广东设立起义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并严令逗留北京的诸同盟会员迅速至香港集中。陈璧君眼看着营救计划一时无法实现，只好含泪南下。

1911 年 4 月 27 日的广东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武昌起义以前，同盟会领导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也是最为悲壮的一次起义。

19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 5 时 30 分，黄兴带领“选锋”120 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人督署。两广总督张

鸣歧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礼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礼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 40 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 月 30 日回到香港。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 72 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 72 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陈璧君爱汪心切，再次北上，试图营救汪精卫。面对辛亥革命洪流的冲击，清政府一面调兵遣将试图将革命镇压，一面在政治上推行安抚政策，以此缓解民众的反清情绪。27 日，清政府被迫发布了《罪己诏》，30 日，内阁即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称“窃见汪兆铭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11 月 6 日，司法大臣绍昌再次奏请释放汪精卫等，称“汪兆铭亲供所开各节，指陈政之得失，发挥立宪精神，其才可用”。7 日，摄政王载沣、内阁总理奕劻发布上谕，汪精卫等人被释放。

1912 年初，陈璧君和汪精卫在上海见面，真可谓百感交集。他们的感情也更加深厚。随后，他们夫妻二人跟随蔡元培北上，欢迎

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狡猾袁并没有南下，而是设计骗过了革命党人同意他在北京组织政府，这样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

4月2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回到上海，准备返粤。5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欢迎他去武汉。8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二十多人去武汉。在武汉，汪精卫夫妇与孙中山一起，出席各种欢迎会，参观了汉阳兵工厂、造币厂，游览了武昌黄鹤楼。12日，孙中山等人乘原兵舰返回上海，17日，乘泰永号船回粤。

4月底，汪精卫、陈璧君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苍天不负有志之人，陈璧君苦苦追求终获结果。这一结合使骄狂、任性，有着极强权力欲望的陈璧君如虎添翼，她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成为影响汪精卫仕途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许多革命志士，包括孙中山和黄兴都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陈、汪二人也认为清王朝已经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应该功成身退了。他们决定一起赴法留学，8月底两人回到陈璧君故乡槟城。9月5日，陈璧君、汪精卫抵法国马赛，受到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欢迎，大家同去巴黎观光。陈璧君夫妇随后就在家请教师补习法文。次年4月，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在法国蒙太尼城出生，为其“小休”生活平添了无穷乐趣。因陈璧君生育后无人照看，革命党人、汪精卫好友方声洞的妹妹方君瑛承担了全部看护之责，为了表示对方君瑛的感激之情，所以将此儿取名为“婴”，“婴”与“瑛”谐音，以此作为纪念。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篡夺后，袁便凶相毕露，想用铁血手段扑灭革命势力，他首先刺杀了国民党代理主席宋教仁。宋案发生

后，孙中山从迷雾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对此提议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黄兴等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听候法律解决；广东都督胡汉民正与陈炯明争夺广东地盘，顾不上考虑反袁问题；安徽都督柏文蔚准备向袁妥协；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全国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孙中山同时急电汪精卫等人，要他们迅速返国。陈璧君对国内形势的变化也甚为关注，让汪精卫一人回国又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将汪文婴留在法国，由方君瑛代为抚养，汪精卫夫妇及蔡元培等人匆匆回国。不久二次革命因为革命党人行动不一，很快失败。孙中山偕胡汉民、黄兴、李烈钧等人先后避往日本。汪精卫因为和袁世凯关系比较好，没有受到通缉，也就没有立即出国。

1913 年 10 月陈璧君先去槟城，动员其母亲卫月朗与他们结伴同行，一同赴法。11 月底，汪氏夫妇第二次来到了法国。

1914 年 8 月 1 日，德、法两国正式宣战，不少伤兵运回巴黎医治。这时的陈璧君，不安心于蒙太尼的学习生活，毅然到巴黎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充当护士，照看伤兵，裹伤换药，服务极为热情，颇受法国士兵的欢迎。

不久，战火烧到了巴黎附近，法国政府命令各国留学生退出巴黎，陈璧君回到了蒙太尼，但此地也不安全。于是全家迁往法国东北部的阆乡农村避难。在乡下听不到隆隆的炮声，汪精卫夫妻过着田园式的生活，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1915 年，国内形势再起波澜，袁世凯阴谋篡国称帝，逆迹日益暴露。尤其是他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顿时全国掀起抵制日货、声讨袁世凯

的高潮。孙中山也策动第二次讨袁。陈璧君主张立即回国，她怕万一中日决裂，归途且将断绝；汪精卫则主张去南洋进行筹款等活动。6月，汪精卫、陈璧君等回国，后经上海去香港，陈璧君登岸去广州，汪精卫乘原船去南洋。

此时，孙中山仍留在日本，革命尚处困难时期，陈璧君回国数月，觉得无事可做，又思念儿女，乃于12月再次赴法。不久，汪精卫从南洋返回。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1919年1月举行的“巴黎和会”。孙中山委派汪精卫赴巴黎了解和会的情况。

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入国内，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不断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同盟会志士以极大的鼓舞。当时在上海的陈璧君与廖仲恺、朱执信等一起发起组织学习俄语，以为研究俄国革命之用。

1920年夏，孙中山为克复广东，令粤军陈炯明、许崇智回粤讨伐桂系军阀，并令朱执信、廖仲恺等去漳州协助。孙中山请汪精卫设法筹借了30万元钱款作为粤军回粤的开拔费，并要陈璧君设法经厦门将钱款秘密送到漳州。陈璧君这时正怀着第三个孩子，时值盛夏，而钱款中有一部分是一元小票，携带比较困难，陈璧君特意携其妹同行。她们从上海乘轮船出发，先将纸币捆扎在身上，待海关检查过后将纸币取下，然后一人在船舱守着钱款，一人去舱面活动吹风，轮番更替。可陈璧君妹妹晕船十分厉害，呕吐不止，几乎昏迷不醒，陈璧君只能寸步不离舱房，所幸旅途十分顺利，船只经三日航行即到厦门，上岸前，两人又将钞票扎在身上，陈炯明派其弟弟陈炯光到码头接应，三人又一起到漳州，交妥钱款

后才松了一口气。

10月，粤军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克复了广东。11月，孙中山再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汪精卫也随孙中山到了广州，出任军政府最高顾问和广东省教育会长，并且成为孙中山巩固广东根据地和计划北伐的得力助手。

在此期间，陈璧君有时住在上海，有时住在香港，有时又随汪精卫回到广州，行踪不定，任务不一。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当时汪精卫正在上海，陈璧君在广州，她正怀着第四个孩子。陈炯明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同革命势力为敌，他以商谈为名将时为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诱捕，拘于石井兵工厂。何香凝悲愤交加，千方百计营救廖仲恺。陈璧君与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早已熟识，在共同辅佐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陈璧君也鼎力相助，利用熟识的关系，帮助打探廖仲恺的下落。

数日后，陈璧君去香港某医院分娩，生下一女，取名汪文恂，也许是产前劳累，没能很好休息的缘故，产后，陈璧君的身体较虚弱，一手一足曾一度偏瘫，但很快就痊愈了。汪精卫此时亦由沪抵港，一面帮助照料陈璧君，一面设法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经与香港当局接洽，香港方面表示允许孙中山经香港换船赴沪，于是汪精卫随孙中山同行。几个月后，陈璧君与被释放的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也到达了上海。

在斗争中屡遭失败的孙中山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毅然决定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并筹建军校。改组国民党和办军校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当时国民党的经费又十分拮据。一天，孙中山召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研

究经费问题，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向海外华侨募捐，但又不能说为了开办军校，最后决定以执信学校的名义去美洲募捐。由于陈璧君系华侨出身，与各地华侨有一定的联系，又恰好在孙中山身边，于是决定由陈璧君担此重任。

执信学校是为了纪念朱执信而设立的。朱执信是著名的革命党人，是汪精卫的外甥，其母汪若昭系汪精卫的堂姐，朱执信就出生在广州豪贤街的汪氏随山馆，仅小汪精卫两岁，后又一起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1920年9月，为了驱逐桂系军阀出广州，朱执信去虎门联络民军，遭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5岁。为了纪念他，特在广州开办了这所学校。陈炯明叛变时，该校遭到洗劫，损失惨重，许多实验设备被毁。1922年7月25日，汪精卫和该校校长廖奉思曾公布了该校被叛军蹂躏的经过，并表示要继续办好该校，现正好以此名义去进行募捐，但陈璧君当时又怀孕了，其母极力反对其外出募捐，并出面将缘故电告廖仲恺，这使廖仲恺十分为难，最后，决定请陈璧君的弟弟陈耀祖与她同行，便于照料和开展工作。

陈璧君姐弟两人先到夏威夷，在华侨中小试筹募，成绩至佳，这使他们的胆子更壮，信心也更足了。随后他们到了美国三藩市(即旧金山)，又经美国南部一些城市去古巴，再经美国中部一些城市，最后到加拿大。每到一处，都有当地的国民党总支部或党员负责人予以接待和协助募捐。

当时在美的华侨，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大多为洗衣工、饭店雇员、赌馆烟馆雇工、农场苦工等，每天要从事繁重的劳动，至深夜始得休息。陈璧君等在那里只能利用晚上去联系募款，白天则到会馆、商店、学生聚集处进行演讲宣传。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坛勾心斗角，军阀混战不已，国

弱民穷，海外华人倍受冷遇和欺凌，他们期待祖国早日强盛，走上和平建设之路，听说是为执信学校募款培养进步青年，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海外游子们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交给陈璧君带回祖国，资助国内的革命斗争。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跑了几个国家，陈璧君等共筹集到捐款约30万元。11月，他们由古巴返回美国的芝加哥。由于长期奔波，旅途劳累，陈璧君回芝加哥后出现流产的前兆，出血不止，便赶紧入医院请医生安胎。医生检查后认为不必保胎，尽快生下为妥。经使用催生剂后，第三天晚上便生了个儿子，这是陈璧君的第五个孩子。

分娩后，陈璧君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便出院了，因为没乳汁，儿子留在医院寄养，后由于医生的疏忽，孩子在出生21天后不幸夭亡。

陈璧君美洲之行所筹得的捐款被经费奇缺的国民党人暂时作为创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费，解决了国民党经费之急需。当时蒋介石奉命作战东江，扫平陈炯明，出发时饷款一时无着落，也以一部分捐款交蒋介石以为费用。这次募捐活动，大大提高了陈璧君在国民党中的声誉。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陈璧君和宋庆龄、何香凝是参加会议的仅有的三位女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与胡汉民、廖仲恺、李大钊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成为国民党领导的核心成员，陈璧君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形势的变化，为陈璧君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10月，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中旬，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二十余人乘永丰舰离开广州赴上海。随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及其他一些随员直赴天津，孙中山命汪精卫负责同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进行交涉，为其赴京作准备。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天律，汪精卫等陪同孙中山会见了在天津的张作霖。后因孙中山在天津病倒，滞留到31日才去北京。北京各界十多万人冒着严寒，欢迎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到来。

汪精卫夫妇随同孙中山到京后不久，孙中山即病重不能理事，住进了医院。为了便于领导，特指定在京的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负实际领导责任。这时，陈璧君、何香凝主要是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治病，守候在孙中山身旁没有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汪精卫在孙中山病重后，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主持会议，发表谈话，招待记者，起草来往文电等，有关孙中山病体的医疗和病况的公布也都是由他一手操办。孙中山病危之际，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者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汪精卫、张继、林森、宋子文为第一组执绋人，陈璧君为女子第一组执绋人。

在孙中山病重、逝世期间，国民党内的另一些重要人物，如廖仲恺、胡汉民等均因各种公务未能在孙中山身边，而汪精卫自始至终守护在侧，且主持了起草遗嘱等重大事项，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孙中出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孙中山继承人的当然人选。陈璧君日后也常常自恃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而孤傲自大。

5月中旬，汪精卫、陈璧君回到广州。5月15日，广州《民国

日报》刊登了陈璧君的一份倡议："孙中山先生为民党领袖，一切葬费，似由党员共同负担，较由政府筹拨为宜，且非此不足示隆重。党中有力分子，亦以由政府拨款，匪持不足以示隆重，且粤自经连年战事之后，库帑奇绌，已达极点，临期筹措殊非容易，究不如由党员共同担负之速而易举。"对其倡议，许多国民党人都表示赞同。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地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国共两党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在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1925 年 6 月，汪精卫与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一起讨论通过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的决议案。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汪精卫出任主席的呼声最高。但汪精卫却故意做出姿态再三辞谢。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任。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府主席是由出席的国民政府委员推选。6 月 30 日选举时，16 名委员中有 11 人出席，汪精卫也是其中之一。结果，汪精卫以全票当选。汪精卫一向主张不做官、不当议员，自命清高，此次选举前也多次表示辞谢之意，但正式选举时却留下了自己选自己的记录。当时宣布选举结果的人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将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宣布了两遍，汪精卫满脸通红，国民党内不少人将此视为政治笑话。

7 月 1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就任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这使汪精卫成为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的头号人物，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对陈璧君而言，她由此而成为显赫的第一夫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大大提高。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新旧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陈璧君

的命运始终紧紧地同汪精卫联系在一起，她的思想主张也一直对汪精卫产生很大的影响。

助汪对蒋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更加猖獗。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发生了廖仲恺被刺事件。廖仲恺身中数弹，同行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亦中枪身亡，廖夫人何香凝幸未受伤。陈璧君和汪精卫得此消息赶到医院时，廖仲恺已经气绝身亡，身上到处是鲜血，惨不忍睹。

廖仲恺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是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案。经过调查，确认这次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是国民党右派小团体“文华堂”的干将朱卓文，而主谋者之一胡毅生则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因此廖仲恺被刺真相传出，广州的民众极为震惊，纷纷要求惩办凶手。

在这种情况下，这时候仍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只好以保护胡汉民的人身安全为借口将其软禁在黄埔军校。陈璧君听说后，也来到黄埔住了几天，安慰胡汉民。当时陈璧君怀有身孕，大着肚

子，往来奔走，胡汉民过意不去，第三天劝她回了家，并托她给汪精卫带去一信。陈璧君在身怀有孕的情况下为胡汉民忙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为莫逆之交，情似兄弟，二人既是同乡，又一起赴日留学，同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特别是汪精卫在北京锒铛入狱，胡汉民为营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此情此恩陈璧君没有忘记。在查审“廖案”中，汪精卫、蒋介石都成了获益者，汪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胡汉民出国，除去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少了一个同他争夺军权的障碍。从而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这也为汪、蒋日后的离合争斗埋下了伏笔。

1925年9月，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组织东征，一举消灭了陈炯明的主力，广州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并决定由中央妇女部组织一支慰问队，携带慰问品去前方劳军。慰问队由陈璧君、何香凝和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带队，东征军总指挥总参议罗翼群率领一排士兵护送前往。因船行速度太慢，直到22日才到惠州。此时，东征军又向东发展，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在平山设立了总指挥部行营。通过电话联系，蒋介石极力劝她们不要再往前去，她们坚持要去，蒋介石无奈，只好亲率轿马来迎。

相遇之后，蒋介石先道辛苦，对陈璧君亲自前来劳军，尤为感谢。当时大家都很疲劳，各夫人都愿意坐轿前行，唯有陈璧君坚持要骑马，蒋介石亲自给她挑了一匹训练有素的马，并亲自扶她上马，走了几里路后，陈璧君突然兴起，拍了一下马屁股，马立即奔跑起来，只几步，就把这位第一夫人扔到了马下，将腿摔伤。这一下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组织担架，将陈璧君抬到平山，住进了医院。幸好陈璧君的伤势并不重，仅在平山疗养了一天，第二天就由

其侄陈春圃护送返回惠州。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璧君是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被推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表示要“继续实行总理的主义”，“继续民国十四年我们努力奋斗的勇气”，向着孙中山用他多年的心血和经验，从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来的“光明大路猛向前进”。在会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宋庆龄也专程来广州出席“二大”，陈璧君亲自去码头迎接，并陪同宋庆龄参观了中山舰，还观看了蒋介石检阅第二师。陈璧君不仅是显赫的第一夫人，而且成为广州政界一位头面人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问题，她都积极参与其间。

国民党“二大”以后，为继续筹执信学校的基金，国民党中央决定仍派陈璧君去新收复的东江地区募捐。2月27日，陈璧君抵达汕头，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当天，就请她去东江行政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说明了她这次来东江的目的，希望大家协助募捐工作。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和妇女解放协会，原计划3月1日在汕头市党部二楼召开欢迎会，因地方过窄，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改为3月2日在永平二楼召开。为了帮助陈璧君进行募捐，汕头各界还专门组织了“执信学校捐款委员会”，参加者有何应钦、周恩来、蒋百诚等以及商界代表共十余人。募捐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汕头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募得十万余元。在此期间，陈璧君还出席了国民党潮梅海陆丰各县市党部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主席台上专设之中央委员席座。作为一名中央大员和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陈

璧君在东江地区可谓风头出尽。

陈璧君回到广州不久，汪精卫因肝糖病重，胆囊积面发炎，在办事时几次晕倒，便请假不到国民政府办公，在西华二巷家中静养，陈璧君就在家陪护着他。

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经过秘密策划，借口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于20日黎明时分，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擅自宣布广州戒严，派兵占领了中山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联顾问办事处，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制造了一起反共事件。

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并未向汪精卫请示，因此，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对此全然不知。当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相继向他报告，并带来蒋介石所谓共产党意图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汪主席原谅的信件时，汪精卫勃然大怒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猛地站起来，随手抓起一件长衫，说要同谭、朱他们到蒋介石那儿去，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陈璧君在旁急忙劝阻说：“你身体这样是不能去的。”汪只得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吧，我在党有自己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第二天，汪精卫又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召来，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问他们敢不敢去将蒋介石扣留起来。这几个人与蒋介石有矛盾，但知道此事汪精卫也无充分的理由抓蒋，因而谁也不想去得罪蒋介石，大家一声不吭，汪精卫也无可奈何。

陈璧君对蒋介石试图一手控制党、政、军大权，不把汪精卫放

在眼里非常忌恨，利用各种机会贬低蒋介石，她知道蒋介石对曾国藩十分推崇，对曾的权术和用兵之道更是时常仿效，便常常在一些场合批判曾国藩，把曾国藩说得一无是处，并借此说蒋介石的作伪，孙中山先生白白培养了他等等。

事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24 日，当时在中央宣传部任职的沈雁冰去看望汪精卫，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东西，沈雁冰告诉汪，他要回上海去。汪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5 月 11 日，汪精卫搭乘法国邮轮安者号离开广州，经香港赴法国，开始了他再一次的旅欧生活，陈璧君也一同赴法。因汪精卫"病体缠身"，他们到法后一直隐居，在巴黎附近的乡下疗养。

汪精卫偕陈璧君负气出国之后，可乐坏了蒋介石。此后，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取代了汪精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4 月，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通过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5 月，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部长。同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6 月 5 日，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北伐战争开始时，蒋已经攫取了国民党党政军的一切大权。蒋介石的独裁引起了国民党内很多人的不满，他们想起了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国民党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苏五个省党部及汉口、上海两个特别市党部，联名发表"请汪主席销假复职"的通电，揭开了"迎汪复职"运动的序幕。8 月以后，迎汪运动愈演愈烈，国民党中央每天都可以收到各地党部要求"迎汪"的电报。汪

精卫和陈璧君分析了国内的形势，认为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采取欲擒故纵之策，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请辞本兼各职。

10月中旬，国内“迎汪复职”的声浪再次掀起，10月15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联席会议，有三十余党部提出“敦请汪精卫销假案”，获一致通过，并决定派何香凝、彭泽民等四人去法国迎汪。不久，广州还成立了“敦促汪主席销假筹备委员会”，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如李济探、于右任等也纷纷通电迎汪。中国共产党对于迎汪复职也是赞同的，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形成“中心”，也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

收到国内发来的一份份电报，汪精卫和陈璧君甚是得意，认为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11月下旬，汪精卫、陈璧君携曾仲鸣等兴冲冲地由法国起程回国，可是行至柏林，汪精卫因盲肠炎开刀未愈，发高烧至40℃，不得不又折回巴黎。翌年2月下旬，才重新离法，经德国、波兰，3月初来到了莫斯科。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始终把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因此汪精卫一行在莫斯科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热情款待，他们在莫斯科逗留了五天，除观光外，还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斯大林也接见了汪精卫夫妇。陈璧君后来曾以此为资本，吹嘘斯大林请她吃饭等，以抬高自己。

4月1日，汪精卫与陈璧君翩然抵达上海。去国将近一年，国内局势已大不同前。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革命军已打败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控制了两湖及长江流域地区。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同时，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

的领导下，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控制了上海，并成立了临时市政府。革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共同的敌人即将被打倒，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一些富庶地区被北伐军占领以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就不可避免了。因此，这一时期，国内的局势极其错综复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分裂国共合作的反革命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等人立即与他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蒋介石要求汪精卫与他们一起实行分共"清党"、"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为"。但是汪精卫自有他的打算，他深知蒋介石掌握着军事实力，因此，为了与蒋介石抗衡，必须抓住国民党的党权，而要达到此目的，需借助武汉政府的革命力量，抓住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的旗帜。汪精卫对蒋介石表示，联俄容共政策"决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能赞成的"。汪精卫提出一切问题等待二届四中全会解决。

汪精卫在沪期间，先后两次往访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并于4月5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声称国共两党"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行动，引起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一些人的极大反感，吴稚晖大骂汪精卫猪狗不如，叫他滚蛋，说发表联合宣言，无疑等于承认与共产党共治中国。李宗仁主张，汪如再不同意分共，就把他软禁起来，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这个消息，便于6日夜间，悄悄地把汪精卫夫妇送上轮船离沪。

汪精卫、陈璧君到达武汉时，受到了十多万民众的热烈欢迎，

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更是倾巢出动。那天天正下着雨，汪精卫夫妇并肩站在雨中，陈璧君身着天蓝色旗袍，不断地挥舞着头巾向欢迎的人群致意，汪精卫着灰色西装，右手高举礼帽挥舞着。群众的热情也感染了汪氏夫妇，两个人都显得有些激动。

汪精卫到武汉后，成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中心人物。他表示要维护孙中山的遗训，坚持三大政策。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了革命，不久，又在南京另立了国民政府。汪精卫迅速作出反蒋姿态，痛斥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背叛孙中山遗训的罪行。4月1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蒋介石约党籍，免去本兼各职。22日，汪精卫又领衔发出反蒋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忍革命垂成之功，堕于蒋中正之手，唯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陈璧君也是通电签名者之一。汪精卫的这种态度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因此而巩固了刚刚恢复的权力与地位。

陈璧君到武汉后，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负责指导妇女工作，她曾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组织了伤兵救护委员会，出任常务委员。当时武汉地区的妇女运动，也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样，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她们高举铲除封建的旗帜，要求男女平等，反对束缚、残害妇女的陋习——缠足、束胸等。但有些做法过左，如沿街强迫妇女剪发、放足，不听者就游街示众，因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蒋介石派人收买了流氓头子刘实森、恶少黄震龙等人，用金钱和诱骗手段，在"三八"妇女节曾组织了一次少数妓女的裸体游行，并扬言"五一"节要搞千人以上的裸体游行，借以攻击和诽谤武汉国民政府要实行"共产共妻"。此事引起各界人士的反对，称武汉已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一天，陈璧君正

在灯下看报，汪精卫回来后没头没脑地说："真没办法！"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将几张报纸给陈说："你看，简直太不像活了！"原来是《自由报》等都刊有反对裸体大游行和不满妇女运动的消息。注精卫说，"你和妇女部同志交换一下意见，不要采取这些激烈行动。妇女运动是众矢之的，关系党国声誉，较之工运、农运，其利害只在其上，不在其下"。陈璧君立即和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商议，令军警逮捕了刘实森等人，制止了裸体游行，并发布了不准强迫妇女剪发、放足的通告。

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继续深入，尤其是各地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触动了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损害了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官、政客的既得利益，这部分人开始日趋反动，处处限制和压抑工农革命运动。而汪精卫也千方百计袒护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在右派势力日益嚣张的情况下，汪氏夫妇也日渐右倾。

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之后尘，公开叛变革命，成为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标志着他们对孙中山的彻底背叛，对自己历史的否定。就陈璧君的言行看，她是极积支持汪精卫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的。

1927年末，汪精卫因在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惨败而引退去法国，陈璧君又随同前往。1928—1929年间，身在海外的汪精卫领导国内的陈公博等汪派人物，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发动反蒋。陈璧君和汪精卫等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后汪又策动军事讨蒋，于1929年9月回国指挥"护党救国"活动，陈璧君随同回国，并与汪等联名发表反蒋宣言。军事讨蒋失败后，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和"西山会议派"，发动军事、政治倒蒋。1930年8月，汪和阎锡山在北平召集反蒋的"扩大会议"（即国民党中

央党部扩大会议)，陈璧君作为改组派成员参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1932年蒋、汪合作。6月，陈璧君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12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陈璧君是一个参政欲、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她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敢说敢为，看见不顺眼的事，她就要说，天王老子也不怕。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可六亲不认，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嫁给汪精卫后，陈璧君泼辣作风不减，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汪精卫紧紧联系在一起。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他虽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办事瞻前顾后，柔弱有余，刚猛不足。因此，巾帼红颜的陈璧君反而成了汪精卫的保护人，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回家后与夫人探讨，陈璧君也乐此不疲，积极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陈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过问，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动与想法，就是出自陈璧君的主意。以致汪的同党陈公博曾经议论说："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和汪精卫接近的人，提起陈璧君来，不是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陈是一个行为乖张、性情怪僻的烈妇，在历史上，在小说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女性来比拟。她的性情与行为，有时像小姐，有时似泼妇，有时像西方贵妇，有时似三家村里的婆娘。总之，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她没有；外国妇女所有的风雅她不配。谁要是想在汪氏宫廷立足，非受过无耻的训练不可，非有奴才和狗才的修养不可。

陈璧君横行霸道，还有一怪癖，就是有时要吐痰，让秘书给捧着痰盂；有时忘了形，对来宾也同样对待。

提起她这一恶习，还有一段何香凝怒斥“泼妇”的趣闻。

何香凝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爱妻，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当陈璧君随汪精卫到日本东京时，何香凝已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她们与秋瑾、方君瑛等同住一室，陈璧君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为同盟会重要女会员。当时，陈璧君表现积极，同盟会经济拮据，她慷慨解囊，把母亲给的钱物全部交给组织。这一行动，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但时过境迁，随着汪精卫成为一投机政客，擢升行政院长，陈璧君也渐渐忘了早年的艰苦斗争生活。而汪精卫的叛变革命，使他们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系也日趋变化。有一天，何香凝去汪公馆，汪精卫不在，陈璧君出来待客，谈话间，她忽然怪癖发作，忘乎所以，对何香凝说：“捧痰盂来，我要吐痰。”何香凝听了一愣，她根本没想到陈璧君会这样无耻，气愤地拍案而起，对陈璧君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捧痰盂？”接着，手指陈璧君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满脸通红，狼狈不堪。何香凝又命令道：“快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有资格要你做这事。”陈璧君气急败坏，哭哭啼啼地走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有人敢训斥她。

汪精卫回来后，陈璧君恶人先告状，说何香凝羞辱了她，哭闹不已。汪精卫只好耐心相劝，又说了何香凝几句坏话，来讨陈璧君的喜欢。实际上，汪精卫心里明白，何香凝就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何况他了。1926 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时，何香凝就指责蒋介石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内部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七一五”汪精卫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血

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中，何香凝只身闯入蒋介石宅邸，要求见蒋介石，蒋怕遭到责骂，避而不见。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结婚，邀请何香凝去做“证婚人”。何香凝“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断然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为表示与蒋、汪彻底决裂，她愤然辞去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她以“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有傲雪心”的高洁梅花自励，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怨沸腾，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之下，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汹涌澎湃。汪见蒋处境艰危，就趁机向蒋介石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对独裁，求和平统一”；蒋也利用汪精卫见利忘义、变化无常的特点，派人与汪联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蒋、汪终于携手合流，1932年1月，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汪、蒋联手的新局铸成，陈璧君也跟着显赫起来。身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夫人，主内而涉外，时间一长，趋奉拍马加谄谀，放纵的她居大自尊，骄横跋扈。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味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什么做西餐、做南菜的，广帮、川帮、京帮几乎凑了个全。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于是，明里老蒋与汪精卫在权柄把握上较着劲，暗里陈璧君也与宋美龄较着劲，一心要把蒋夫人的“抖”劲比下去。为了猎取好名声，陈璧君又热心起慈善事业来。当时南京有贫民三万多户，她和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在京郊为贫民建筑住宅，以显示其德政。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广大民众却在暗中拍手称快。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7点，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去中山陵谒陵。9点，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脸色苍白，在会上致开幕词，谓："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摄影。按惯例，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委合影。当中委们齐集中央党部会议厅门口时，蒋介石却迟迟不来。

9点35分摄影完毕，就在此时，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下。枪声把国民党要人们惊得乱作一团。腿脚不便，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连滚带爬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慌忙中钻进汽车底下，待随从费了很大劲把他拖出来，新马褂的袖子已撕成两半。

这时，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起而和刺客搏斗。文者是张继，他见状急奔到行刺者背后，将其拦腰抱住。武者是张学良，他一个箭步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行刺者手臂，其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的卫士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枪还击，行刺者胸肺

连中两弹倒地。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站在汪精卫身边的陈璧君见自己的丈夫躺倒在地，犹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立即左腿跪地，伸出手臂托着汪的头，她把手伸到汪的鼻子前，感到汪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这时，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陈璧君强忍剧痛对她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但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既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料儿女。"似乎在和汪做最后的诀别。蒋介石虽未参加摄影，也闻声赶来，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以示亲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随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左臂枪伤经消毒缝合，并取出左颊大部弹片，背部子弹夹于五、六肋骨间，伤及脊骨，未敢施行手术。11 月 20 日汪精卫出中央医院，往上海人诺尔医院检查治疗，取出左颊残留弹片，背部子弹仍未能施行手术。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陈璧君根据蒋介石不出席摄影，坚信他是事先知道的。于是，闯进蒋介石办公室，气呼呼地指着蒋介石说："蒋先生，你干的好事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想为自己辩解，陈璧君不容他说话，接着说："在军警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你的特务队，还有什么人能混进来？"蒋对此事

本来就满腹狐疑，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责问，顿觉语塞，只好赔着笑脸，一口一个“汪夫人”，保证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陈璧君逼着蒋介石交出凶手的后台，蒋无奈，只好连声答应。由于蒋、汪之间有矛盾，引起社会上种种揣测。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让他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特务们立即四处搜查抓人。

刺杀汪精卫的爱国志士孙凤鸣两天后因伤重牺牲于南京中央医院。

案情后来查明，刺杀汪精卫并不是蒋介石指使干的。行刺者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刺汪前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被击倒，身上仅被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一枚鸦片烟泡，说明他已立下必死之决心。孙被卫兵击中要害，流血过多，到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剂十余次，以便从孙的口中了解到刺杀行动政治背景。孙凤鸣忍受着肉体撕裂的痛苦，对审问他的人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并激情满怀地说道，“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次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离开了人间，谱写了又一曲民族悲歌。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 年 11 月 2 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

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他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诡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于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1936 年 2 月，汪精卫以异地疗养为名，带着枪伤离开上海，去欧洲静养去了。陈璧君则选择留在国内，与汪电函往来，为汪传递国内政治斗争信息；同时和改组派一些核心人物一起，为汪回国与蒋斗法，攫夺最高权力而出谋划策。

1936 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 1932 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复电表示赞同。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唯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陈、汪的计划落空。

投敌卖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蒋介石迫于形势，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汪精卫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但他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他认为"战必大败"，主张对日讲和，最终走上了通敌之路。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组织"低调俱乐部"，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陈璧君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她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人们谈到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

息。当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是转进时，陈璧君就讥讽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了！"

1938 年 6 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竟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瞠目结舌。

1 月 16 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分化拉拢政策。汪精卫有意与日本人勾搭，他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等人商量对策。陈见汪精卫犹豫不决，便替他作了决定："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11 月下旬，汪精卫派出去与日本人进行重光堂谈判的梅思平带来了密约文本。为防泄露风声、密约被搜查，陈璧君曾将密约专门密藏到重庆郊外其胞妹陈淑君家。当时，汪召集周佛海、梅思平、

陶希圣和陈璧君等人连续开了七次会对密约进行讨论。大家对“协议”内容无意见，但对于离开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与日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犹疑不决。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11月底梅思平要去香港给日方答复，汪精卫在家设宴为梅饯行。饭后汪送梅到客厅门口，陈璧君从旁激励他：“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陈璧君不但是汪精卫与日“谋和”的热情支持者，而且和周佛海一样，是个得力的实际行动者。为了给汪精卫叛逃打好基础，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前往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资，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她还向龙边说边哭：“汪在重庆徒拥虚名，对国家无可贡献，很想换换环境；抗日战争旷日持久，蒋介石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共产党势已坐大，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龙云为之动容，向陈保证：“汪先生如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出国，我亦负

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因此，汪、陈等决定取道昆明出逃。

叛逃的计划一一落实之后，陈璧君等做贼心虚，怕逃离重庆时一次行动目标太大，在出逃前先将两个在渝南中学读书的孩子托陈春圃护送到昆明，再请龙云代理出境手续，搭乘货船去越南。

1938 年 12 月 18 日，陈璧君和汪精卫等五人，从重庆飞抵昆明。次日，在龙云的安排下，连同先期抵昆明的周佛海等，乘坐龙云包乘的专机飞抵河内。

汪精卫到河内后，企图拉云南、四川、两广实力派响应其《艳电》声明，同时派周佛海等去香港筹建伪组织，陈璧君则往来于香港、河内之间，负责联络。汪派核心人物之一顾孟余因反对发表《艳电》，悄然离去。陈璧君认为顾是“学者胆小，不足与谋大事”。她急忙召集在香港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开会，说上述五人加上她和曾仲鸣，作为“和平运动”发起人而被汪指定为“最高委员会”，并传达了汪对各人的分工，她本人则负责河内（汪精卫）与香港间的意见沟通。为了保密，拟定了各“最高委员”的电报代号，陈璧君的代号为“兰”（后又改“菊”）。汪伪组织机构成立后，陈璧君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作为“首义分子”享受 5 万港元的安家费。

汪、陈等公开投敌后，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等为主要狙击对象，以警告汪精卫集团。结果林被斧头砍伤，陈却无恙。后蒋介石又命戴去河内杀汪，未果。汪、陈感到在河内、香港均不安全，只得请求日方保护。1939 年 5 月，陈璧君和汪精卫在日方严密保护下，由河内秘密到了上海。其住处为日方控制区，由日本宪兵保护安全。以后移居愚园路，仍由日方保护。汪、陈等到上海后，原伪政治委员会解散，由“首义”诸人加丁默邨组成“高

级干部会议"，作为汪伪集团最高决策机构，陈璧君为成员之一。同年7月，陈璧君被重庆国民党开除党籍。

汪伪集团在建立伪中央政府以前，以"继承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幌子为号召，于1939年8月下旬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陈璧君为伪党副主席。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为凑足人数，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陈把其胞弟陈耀祖、陈昌祖，侄子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网罗进代表人选，其中陈耀祖、陈昌祖、陈春圃都成了伪中央执委或候补委员。陈春圃还先后任过伪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组织部长、海外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要职。9月，陈璧君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日本同意汪精卫集团成立伪政府的前提是：必须满足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对华侵略要求。体现日方这个要求的是《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39年12月26日，作为汪伪集团"高级干部会议"主要成员的陈璧君，参加了"高级干部会议"对这一《要纲》的讨论、审定，并予通过。可是翌年1月，"首义分子"陶希圣、高宗武因怕担汉奸罪责，加之与汪伪集团的内部矛盾，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脱离汪精卫集团，并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这一卖国密约内容及形成经过，使汪精卫等十分沮丧。陈璧君叫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很迟疑，原因是汪精卫本人从没有给他这个名义，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陈春圃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怪责有她承担。随即陈春圃只好草拟谈话稿，对《大公报》进行"辟谣"，以混淆视听。当时，另一"首义分子"、汪精卫集团二号人物陈公博亦在香港，以老母病重，希望

在香港终养为由，推脱来上海。在此汉奸集团内讧、人心不稳之际，陈璧君亲去香港，催促陈公博到上海，以壮声势。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1940年3月，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成立了伪中央政治指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为主席，陈公博等为委员，陈璧君为指定委员。本月底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陈璧君虽未正式在伪政府任什么实际重要职务，但她的“汪夫人”、“辛亥功臣”、“首义分子”、“最高干部会议”成员、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汪伪中央只设主席汪精卫一名，以下均为委员）身份，在伪廷举足轻重，不少伪国府要员对她言听计从。不说汪伪集团的二、三号人物陈公博、周佛海要看她的脸色，就是汪精卫也要受制于她，实际上她与汪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显赫。陈生性泼辣，喜于预汪的“政事”。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

干女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准则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汪家舞台陈家班"。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伪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汪精卫成了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的心愿。但此时汪精卫并不顺心，外受日寇摆布，内畏陈璧君雌威，十分苦闷。

汪一向惧陈，这已不是新闻，汪精卫毫不隐讳地说："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战友，因此，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权利欲极强的她喜欢任用亲信，如有善于溜须拍马、曲意迎合者，则推荐给汪，让汪委以重任，汪对此甚为恼火。为了减少纠纷，免去无谓的争吵，汪、陈二人只好"划地"分权。在私生活上，夫妇二人在上海设公馆两所，汪居愚园路，陈住福履里路，各行其便，不相抵触。在"政权"上，汪精卫坐镇南京，陈璧君则称霸广东。看一看广东方面的伪组织人员安排，就不难看出陈在广东的势派：省主席兼建设厅长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四弟；财政厅长汪宗准，是汪的侄子，此人一向走"四婶"陈璧君的门路，终日脚前脚后，而不甚倾向"四叔"汪精卫；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璧君的义子；至于各县县长，则多数是陈的亲信，选其敛财手段高强，欺压人民残暴的担任。因此，陈长期居住广东，很少回南京，除非汪精卫的生日或节日，才带领亲信，回京与汪同住数日而已。

陈璧君在广东时的官衔，是历代官制中找不到的，也是现代官职中没有的，她为自己加上的是"广东政治指导员"的特殊头衔，

作为钦差大臣，坐镇广东。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搜刮钱财。她不择手段聚敛钱财，就是在贪污成风的汪伪政权内部，也引起许多议论，很多人自叹不如。

陈璧君虽然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但对汪精卫独居南京很不放心。在南京汪的“随从室”中，遍布亲信，以便遥控南京。当时，随从室分为两个部门，第一室为总务，由陈的侄子陈国琦负责；第二室为秘书，由汪的侄孙女婿周恭生负责，工作人员有汪的侄孙汪翔辉及汪的外甥张思麟等。几乎所有内室的人，均是陈的亲信，人们称之为“夫人派”。汪的“先生派”人物宣传部长林柏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则左右逢源，看陈眼神办事，多讨好于陈璧君。为能进一步监督随从室工作，陈建议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命她的堂侄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她的五弟航空署长陈昌祖担任。汪则推荐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三人，共五人，由陈春圃、陈昌祖负总责。由于机构重叠，互相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陈璧君在政界、在社会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权力也越来越大，对人也越来越傲慢，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不有愤愤不平之感。汪伪政权中的人，上至院长、部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人不怕她，也没有人不讨厌她，往往是敬而远之。由于陈璧君到处插手，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汪死后，陈璧君自知南京难以容身，仍想以广东为据点。时陈耀祖在广州被爱国人士刺死，陈遂要求其侄陈春圃辞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而到广东任省长，陈璧君自己则长期坐镇广东。陈公博为将陈璧君的势力清除出南京，批准陈春圃任广东省长。因此，陈璧君将全部嫡系人马集中广东，不再过问南京情况。

1941年春，抗日战争已进行三年多的时间，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汪精卫在日本主子的吩咐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专门负责"清乡"事务。汪亲自兼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由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并负实际责任。

为了强调"清乡"工作的重要，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鼓吹，汪精卫、周佛海等还亲自下去"视察指导"。陈璧君没有在"清乡"委员会中任职，但也不甘落后，几次前往"清乡"区视察。

陈璧君首先视察了苏州，李士群不敢怠慢，除吃住认真安排外，又准备报告，安排会场。但她只是坐车沿着汪精卫的视察路线转一转，只是摆出架势让记者拍些照片，拿到报上发表，吃喝玩乐，政事一点不问。李士群又投其所好，送给她一批古玩，陈璧君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一次出巡尝到了甜头，陈璧君又要去杭州视察。1943年4月初，汪精卫把"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找来，说：'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汪曼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立即说："先生的意思我懂啦。"他马上给李士群去电报，要江苏省沪杭铁路沿线各县的欢迎标语上一律写成"陈委员"，不用"汪夫人"字样。陈璧君带着一大批随员，坐着由"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公司包的一节专车，由上海西站出发。一走进包厢，只见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也在车内，陈璧君心里非常不满，当着众人面，又不好

发作将樊、江二人赶走，只是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到了杭州，你必须对新闻记者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列车进入杭州车站，刚一停稳，月台上乐声大作，欢声雷动，陈璧君正想下车，又退了回来，原来江亢虎已走到陈璧君前面了。江比陈璧君地位高，这样出站，岂不是喧宾夺主，扫了陈璧君的威风吗？汪曼云赶紧上去拉住江亢虎，没话找话地和他谈起来。陈璧君这才派头十足地下了车。

面对欢迎的人群，陈璧君非常得意，谈笑风生，连陈的亲信也很难看到陈这样高兴的时候。接着，陈璧君在浙江省主席傅式的陪同下，来到戒备森严的西泛饭店。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享享口福，在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风味给我们试试。”还说：“只要好吃，即使摊子也不妨。我也知道，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陈璧君在几家有名的饭店各吃上一顿，又上街买了许多东西。临行时，李士群又为每人准备了一大网篮土特产。来时空荡荡的专车，已被各种物品塞得满满的。陈璧君的杭州视察，满载而归。

1944 年 3 月，汪精卫因以前遇刺枪伤病情渐趋恶化，日本政府决定让汪到日本动手术，陈璧君陪汪乘专机赴日。11 月 10 日汪精卫病死日本。汪死前一月，口授《最后之心情》一文，由陈璧君誊正该文为汪伪集团开脱罪责、涂脂抹粉。11 月 12 日，陈璧君及其子女，乘汪生前专机，将汪尸体运至南京，于 23 日下葬。

可悲下场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政府主席。陈公博与陈璧君有隙，遂排挤褚民谊等汪之嫡系。因此，汪伪集团形成陈公博、陈璧君、周佛海三派鼎足而立的局面。当时，日军南进失败，盟军大举反攻，加之汪已死，伪广东省长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就逃往别处。陈璧君不遗余力，兼程返粤主政，一面荐其堂妹夫褚民谊去当伪广东省长。这时，伪民政厅长、伪汕头市长也已逃离。陈璧君大骂他们“无本心”，舍她而去。在此日伪呈现败势的情况下，她终日坐守广州这块地盘，而且在汪伪集团中还以“领袖夫人”、“正统角色”自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今后怎么办？她胸无一策。于是她找到褚民谊商议应对之策。褚民谊也似热锅上的蚂蚁，哪还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见褚民谊比自己还要惊慌，陈璧君安慰他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追随汪先生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卖国当汉奸。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怕的。”

下一步该怎么走，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好决定向老蒋献殷勤，请蒋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网开一面。于是，陈璧君要褚民谊向蒋介石发份电报，试探一下老蒋的态度，说他们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隔天，陈让褚又发一电：“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暂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

广州城内，到处在捉拿汉奸。陈璧君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

郑介民对褚民谊说："你给委员长的两封电报都收到了。此次，我是奉戴局长之命，前来迎接汪夫人与你前往重庆。蒋先生有一封电报要我转交给你。"说着，取出一份附有密码的电报交褚民谊过目。

电报全文如下：

> 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唯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
>
> 弟　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读完电报，褚深信不疑，非常高兴。他问郑介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重庆?"

郑介民回答说："重庆的飞机后天就可抵穗，请你马上转告汪夫人，做好准备。"

褚民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璧君。陈闻讯后，喜出望外，特地让人上街买了一筐刚上市的鲜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宋美龄。

第三天上午，郑介民通知褚民谊："专机已到，请与汪夫人下午三点等候在原省政府门口，有车来接。"

3点整，郑介民带着十余辆汽车和一伙军统人员准时到达。他下车后，即宣布："为了安全起见，每辆车只能坐两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陈璧君与褚民谊安顿坐好后，汽车便出发了。车队刚出省政府，陈璧君就发现汽车不是朝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她惊问："这是去哪里？"

郑介民笑着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这是去珠江边，先上船过渡，再上飞机。"陈璧君便不再怀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早有汽艇在此迎候。郑将汪、褚送上船后，称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便将两人交给一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纸，念道："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此时两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又哭又闹。汽艇来到江对岸停了下来。陈、褚二人被押下船在一栋两层楼房里住了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1946年1月，陈璧君被转解到苏州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候审，但受到优待。她因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症，要求由子女陪伴照应，并选择与褚民谊等人同住一个楼层房间，以便于自由往来，均获准许。但她能恪守看守所中一切规章，并约束同住的人恪守规章，不时对他们呵斥有加，而这些人也对她奉命唯谨，所中职员也对她称呼"汪夫人"。

一天，国民党陕西省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徐某（少将）请准参

观该所，连声叫问："陈璧君在哪里？"陈出得房门，怒容满面，徐立即脱帽立正向陈行礼。陈高声喝道："你凭什么直呼我为陈璧君？就是孙中山先生过去见到我时，都会称我一声'汪夫人'，你怎能叫我陈璧君？简直是毫无礼貌！"徐某被责备得僵住了，进退不得，再无参观雅兴，随即匆匆离去。

1946年3月，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向陈璧君提出起诉，指控她"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并宣布于4月16日公开审讯。

审讯时，陈璧君竭力为其和汪精卫辩护，拒不承认有任何错误，更不承认是卖国汉奸。她还说她和汪精卫不是如起诉书所言"同恶相济"，而是"同善相辅"，他们"是为国家、为社会，不计自己利害"。因此，她说："罪刑我可以接受，罪名不能担当。"她的辩护振振有词，竟使一部分听众感到似乎言之有理，频频点头对她表示同情。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刑字判决三十五年度特字第410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

陈璧君被判刑后，转到苏州监狱服刑，也受到优待，有一侍者，另有一女看守也听她使唤。她除自己作诗填词、背诵汪精卫诗词外，还将一些同监犯集中于自己房中，让她们学诗词古文、临写字帖、阅览报纸、发表议论。一些国民党权贵也时而来看她。她泼辣敢言，狱吏也怕她几分，多对她曲意奉承。后来她情绪不定，靠注射进口杜冷丁安定情绪。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部队精锐丧尽，解放大军饮马

江北，南京政府风鹤频惊，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逼“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月4日，行政院作出“应变”举措，决议迁都广州，并对关押的汉奸作了如下规定：凡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处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

其时，达官贵人的心思只在身家性命安全上，个个忙着撤退家眷财产，哪里顾得上转移汉奸？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其中一支直扑苏州。苏州解放的当日，监狱即被接管，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5月27日，大上海解放，市政府大力改造接管的提篮桥监狱的狱政设施。相比之下，提篮桥监狱的条件较之苏州的好得多，军管会于是决定，把陈璧君这个特殊的犯人从苏州移解上海，以利改造、养病。

上海的初夏连日西南风，气压偏低，陈璧君浑身不适，早先骑马时摔出的老伤又隐隐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干部闻讯后，忙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她患有多种疾病。

考虑到陈璧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年老体弱有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陈璧君要求每天用五热水瓶开水，也予以满足。

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中的条件一天比一天差，陈璧君连饭都吃不饱，生了病也无人过问，而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人道待遇，这是陈璧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忍不住偷偷对同室的女犯说：“这里条件比苏州时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还给我做了全面

体格检查，而在那边整整三年从未检查过。我反共大半辈子，却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实是始料未及。”她讲这番话，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好感，且听她后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随之洋洋得意，大讲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与蒋介石唱对头戏一斗再斗……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信的内容如下：

陈璧君先生大鉴：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关押自己，于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亲，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

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二三年，无期徒刑减为20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则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管教干部例行公事，叫陈璧君写书面交代，她也总是推说头晕或胸闷或手臂酸麻不写。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干部再次约见陈璧君，郑重其事地说："请你系统地写一份检讨。这是领导上统一布置的，每个在押犯人一定要写，一个不漏。"

在管教干部的再三劝说催促下，陈璧君终于动笔了。

至8月间，陈璧君写完了洋洋洒洒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其中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捐助家财，谋刺清廷军政大员、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协助孙中山重组政府及改组国民党等。

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

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

1954 年 1 月，陈璧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 11 月，第四次进医院做了颈淋巴腺炎切除手术。虽然医院经费相当紧张，狱方还是尽力医治，不计价钱，该用的药一定给用，还给她增加营养，供应牛奶、鱼肝油等。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管教干部治了陈璧君的身病，更治了她的心病，请看狱方对她的鉴定：“自入狱以来，该犯一贯表现顽固恶劣，把政府对其宽大当作应有的享受，1954 年后有些转变。耍小伎俩，‘考验’管教干部是否真心诚意对待她。”

狱方思想教育与人道待遇相结合的改造政策，开始让陈璧君从心底里佩服了。她不只服从管教，对过去一向拒绝承认的汉奸罪

行，也开始有所认识，当然并不彻底。她曾多次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检讨、感谢及对共产党的赞扬。

陈璧君自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说是为“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她还学习毛泽东著作，且非常之刻苦。请看其1955年7月在谈自己历史和思想变化的交待材料里写的：“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录下来，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另有一件事，倒是管教干部始料未及的，也可说明陈璧君“努力改造自己”的愿望。

那是一天中午开饭时，陈璧君刚端起饭碗，见管教干部经过，便喊住说：“我已写了报告，申请去农场参加劳动，为什么不见批下来？”

1954年以后，为使犯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狱方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的还送去了苏北的劳改农场。第二年秋天，陈璧君递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到苏北去。

狱方因陈璧君患有多种疾病，又年事已高，未考虑她的要求。管教干部当下转达狱领导的意见，说：“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按照医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知难而上，古有明训。别人能干的，我为什么不能？你们不让我去我就绝食，饿死算了！”她言出行随，果真搁下饭碗。

“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希望你理解这一点，配合我们的工作。”管教干部一点也不动气，悉心开导。陈璧君被感动了，破颜为笑：“我就怕你们和颜温良地讲道理，看来你们的确是为了爱护我的身体。”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

一个多月中，院方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百药罔效，群医束手，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陈璧君自知回天无力，对管教干部说："告诉医生，不要再为我浪费针药了，你们已尽到责任了，感谢你们。"

5月19日，她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从中可见党和政府对这个特殊人物的改造效果：

> 诸儿同阅：
>
> 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进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别念，因你等远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延至6月17日，陈璧君医治无效去世。由于她在上海无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亲收敛火化，骨灰后送往香港。

李士群

叛变革命

李士群1905年出生于浙江遂昌。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12岁那年，李由于发奋读书，考上了杭州城里非常有名的崇文中学。该校是一所新式学校，学生很容易受到新潮文化的熏陶。1924年，年仅20岁的李士群又考入上海美术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专业。

到上海，是李士群人生的一大转变。在这个激荡的世界里，他邂逅了他的另一半——未来的妻子叶吉卿。叶和李同乡，但叶出身名门，家财万贯。她对李士群贫寒的家境并不在意，她感觉这位来自农家的青年有着极高的志向，同时机敏过人，应该有着无限的前途。叶第一次见到李就为他的未来盘算起来，她认为以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学习绘画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劝他到上海大学改修化学，并表示愿意资助李的学费。从此，他们便形影不离了。

在大学读书期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李、叶二人抱着“时势造英雄”的观点，一起投入大革命的潮流，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活动，随后又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参加革命以后，表现也还积极，曾得到领导的信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个时候，李士群接受了党的指派，前往苏联东方大学接受特工训练。在那里，他学到了诸如爆炸、射击、格斗、谍报和化装等各种特工技术，也学习到了如何开展政治宣传的方法。以后无论是在哪里，李都以此经历为骄傲。

1928年底李回到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就秘密设在上海租界里，环境险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成立了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以保卫中央机关和清除叛徒为己任的“特科”组织。李回国以后，就在“特科”工作，公开身份是“蜀闻通讯社”记者。在这期间，他多次参加过处决叛徒的行动。但是不久，他因为激烈言辞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为了避免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流氓季云卿的关系，再由季托巡捕房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事后，李士群专门买了贵重礼物，登门道谢，并向季投了门生帖子，从此与上海的帮会势力拉上了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共两党在上海的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特务凭借反动政权的力量，一方面疯狂地镇压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一方面推行所谓的“自首”政策。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共产党人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下，叛变降敌。1932年春，李士群被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

李士群被捕后，经不起威逼利诱，背叛了革命，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

员。从此，李士群开始了他罪恶的刽子手生涯。

在调查科工作时间不久，李士群又被调到《社会新闻》杂志社做编辑，上司是丁默邨（丁原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也叛党投敌)。这个刊物是由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一派CC系特务直接控制的，用无中生有、信口雌黄的手法，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污蔑诋毁，是当时国内有名的造谣刊物。

李士群对于自己在“调查科”充当小角色，很是不甘心，于是他千方百计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上，谎称他的投敌是深入虎穴，并非叛变革命。地下党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于是给他一项除奸任务，要他干掉丁默邨，因为丁叛党后，出卖组织和同志，恶贯满盈。但李士群却把此事密告丁。于是两人精心策划了一个“调包计”——杀时任“调查科”上海区区长的马绍武，以代替丁，因为这个马绍武在逮捕李、丁二人时，都对他们动过大刑，这次正好可以公报私仇，还能骗得组织信任。

1933年秋的一个晚上，机会终于来了。马绍武约请丁默邨等人吃饭，李士群于是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联络人。这帮人在上海的一家妓院吃饭打牌，折腾至半夜，马绍武喝得醉眼蒙眬，在丁默邨的陪同下，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这时，早已等候在外面的李士群便暗暗尾随上前，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便有人向马绍武开枪，马绍武应声倒地，当场毙命，丁默邨则佯作惊吓，拔腿飞奔而去。事情发生后，南京“调查科”电令上海区限期破案。不久，丁默邨、李士群作为此一案件的重大嫌疑犯，一起被捕。丁因官职较高，在本案中又没有明显证据证明他是同谋，不久就得到CC系的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力保，很快就被释放了；而李士群因没有靠山，被押解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饱尝了皮鞭、

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等酷刑，险些送命。后经他老婆叶吉卿“赔了夫人又折财”的大力营救下，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总算被释放，但仍然规定不得擅离南京，以便有事问询。

不久，李士群被放了出来，浑身的伤痕因没有得到医治而发腐，叶吉卿看了，更添仇恨。自此，她时常劝李士群不要再为中统卖命，并时常咒骂徐恩曾等贪财好色的丑行。1933 年底，李士群又被迫到“留俄学生招待所”担任“留俄同学会”理事。至此，那件震惊整个 CC 系的马绍武被杀案，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渐渐平息下来，最后终于不了了之。但从那之后，李士群感到自己郁郁不得志，一直到抗战爆发他才又开始活动。

投入日寇怀抱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 年底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政府、中央党部撤离南京，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特务人员，奉命做“潜伏工作”。南京沦陷后，李士群等人却从南京逃到了汉口。

这时，国民党为了加强特务控制，将“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又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徐恩曾任局长。李士群等一行到了汉口，便被全部安置在“中统局”的职员宿舍里。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内，因为“中统局临时办事处”也设在那里。

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他职，“中统”便改派李士群继任。李领到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的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局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因为他公开说明是去香港的，反而蒙住了这个老牌特务。

李士群到达香港后，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李在香港人生地不熟，难以发挥作用，便写信把他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李士群到上海后就在清水董三的直接指挥之下，开始为日本驻沪使馆从事情报活动。

李士群在上海选定的住所是大西路67号的一栋洋房。他选中这房子，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当时上海业已沦陷，但生活在租界孤岛上的上海人民的反日情绪极为高涨，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对汉奸、奸商和妥协分子，采取暗杀、绑架手段，打击他们的卖国活动。不少人刚与日方勾结就被暗杀。而李士群来到上海，手里一支烂枪都没有。那时他纵然无力杀人，但如何苟全自己，不能不深思熟虑，细加斟酌。他辗转托人，才租到了这幢房子，李万分满意。这倒并不是由于这幢房子建筑新颖，装修考究，而是由于它的环境，正符合李的要求。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经

济大汉奸谢筱初的家，自然不必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吹嘘“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足见他对这幢房子的满意了。

单凭房子的环境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李士群感觉这还是不够保险。为了进一步保障自己的安全，他想拉拢一些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与国民党最有势力的特务机关——军统发生一点微妙关系。李首先找到他在与丁默邨编《社会新闻》时认识的朋友章正范。章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李知道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则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而杜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是拜把子弟兄，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十分之九都与杜有关。汪也因杜的关系，与军统有一些接触，李就利用章的牵线，与汪曼云见了面。

汪之愿意与李士群见面，也有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时上海的英、法两个租界，虽仍存在，但租界四周，毕竟业已沦陷，美、英、法等国对日本也有所顾忌。日本人要在租界里捉人，虽有一些规定的手续，但想要抓哪一个人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也时时恐惧着怕给敌人抓去，想预先铺好一条通敌的路线，以备万一出了事，有一条后路可走，免得吃眼前亏。汪曼云就是这样想的。因而一经章正范从中牵线，便欣然从命去见李士群。

李士群与汪曼云见面后，李对汪并不讳言他是在给日本人做

事。但他为自己辩解，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中统过去对待他手段太辣了，要想借此报复一下，出出气。同时，也因为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到20万块钱后，就准备溜走。所以他仅答应为日本人做些情报，不做行动，希望汪能同情与理解；如有对他不谅解的人，也望汪能代为解释；可以照顾的地方，尤请多多关照。汪对李的要求表示默许。末了，汪也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上海租界已成孤岛，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你用什么办法救我？"李回答说："这很简单，万一你给日本人抓住，你就说，同我有关系就行了。这样他们就会来向我了解的。"汪又问："那你在他们那里是什么名义呢？"李说："特务机关长。"这五个字，出乎汪、章两人的意料。虽明知李的话不符实际，因为谁都知道这特务机关长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决不会叫个汉奸去做，可又不好意思当场戳穿，只是相对一笑而已。

这样，双方达成了默契。后来，当汪曼云得悉军统派出特务暗杀李士群时，就立刻将消息告诉了李，让他做好防范。军统的刺杀行动最终果然失败。汪后来也投敌，并成为李士群的重要助手。

李士群自做汉奸后，天天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虽然找到了一幢"保险房子"并勾结汪曼云代他向各方面疏通，总觉得自身安全系数还不是太高。他又试图与杜月笙建立直接联系。因为杜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是"拜把子"弟兄，杜还是军统在上海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杜虽已经去了香港，但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他是能预先知道的。李士群深知，在上海无论是保命还是搞情报活动，或是拉队伍搞特务活动，都不能不先打通杜月笙这条线。

恰巧在这时，李士群从清水董三那里得到了一份关于杜月笙的

材料。这份材料是由杜月笙扶植起来的上海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张师石写给日本人的一份资料，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它详细记载了杜月笙的出身、经历，杜月笙与法租界的烟赌业、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及与黄金荣、张啸林、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的一批牛鬼蛇神与虾兵蟹将，如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陆京士、汪曼云、章荣初等人的情况，并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杜与戴笠的特殊关系。

李士群为了讨好杜月笙，专门打电话约汪曼云前来会晤。见面后，他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架势说："老杜待张师石不错，而张却出卖了他，未免太无良心。我虽事不关己，由于激于义愤，所以请你来，拿这东西给你看看，也使你和老杜知道知道张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份材料太长，你带回去看吧！不过原文你看过后，仍须还我，因为这上面已经日本人签了字，所以必须原件归还的。"汪又问李："能否把这原件带到香港去给杜月笙看一看？"李士群早已预料到汪曼会提出这个要求，这也是他把这份资料给汪曼云看的主要目的，他当时便满口应允。汪一经李的应允，无异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把这份资料送给了杜月笙。杜叫他的秘书关了房门整整抄了两三天，才交由汪曼云带回上海，送还李士群。汪临行前，杜向前来辞行的汪交代，要他也对李士群也同样表示"好感"。汪当然照办，就在香港买了一只金怀表与两套西装料，送给李士群。这桩买卖，做得双方都非常满意。李士群从此也就和杜月笙联系上了。

特工巢穴开张

随着李士群在上海情报活动的开展，他在日本特务机关眼中的分量也加重了。1938年秋冬，清水董三有意让李士群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李士群知道，要干这么大的“事业”，以他的声望、地位是没有号召力的。于是他就想把他原先的顶头上司丁默邨拉下水。丁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徐恩曾、戴笠两位大佬相差无几。但抗战开始后，戴笠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速上升，而丁默邨所在的第三处却被裁撤，丁默邨只在大本营挂了个专员的空名，心中自然十分不满，跑到昆明“养病”，以观时局变化。

李士群深知丁默邨这人野心很大，不甘寂寞，便在日本特务机关面前把丁的声望和才能吹嘘了一番，并表示请他出山坐第一把交椅，自己主动“让贤”。其实，李从本心来讲是非常不情愿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利用丁默邨先把特务机关搞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再取而代之。

在征得日本方面同意以后，李便派了丁的一个湖南老乡南下专程去邀请丁默邨来上海。丁一到上海，李士群就请他吃饭。酒足饭饱之后，李开门见山地说：“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我已经同日本人挂上钩了，决心当汉奸了。”说罢便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往桌子上一摔，接着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

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上司，一切听你的指挥。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枪打死我！”三两回合，丁默邨就答应了李士群，他们就成为经营特务机关的合伙人。

李、丁的“合作”，对特务组织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按照日本使馆的要求，从情报活动迅速转向特工行动不是那么容易的。按李士群的想法，这个特务机构一没钱，二没势，三没枪。虽然有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三的支持，但所有的特务是不准带枪的，他们除了用气枪防身以外，剩下的就靠“空手道”了。大使馆的特务活动经费对大量的活动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李士群也知道军统在上海的实力，他深感：如果没有正式的机构，没有正式的名分，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没有日本军队的撑腰，与“精明强干”的军统较量，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他向清水提出要求，直接与日本军部接洽，争取获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

1939年2月，丁默邨、李士群经清水的引荐在重光堂会见了土肥原——日本军部在中国的代表。重光堂是土肥原机关总部所在地，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侵华日军对中国开展特务工作。日方在场的还有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

“我是土肥原，欢迎欢迎！”

土肥原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让丁、李坐下，并按中国的方式，向丁默邨、李士群递烟，点火。土肥原神态自然，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动作娴熟而看不出丝毫做作，可谓“天衣无缝”。似乎一举一动都在表露土肥原招待客人的“真心真意”。

清水给土肥原介绍了丁默邨、李士群二人：“二位是我们可靠的中国朋友，今天来聆听阁下的指示。”

“不，不。这三位对中国的情况都非常熟悉，还是听听他们的意见”。

土肥原看到他们两人都很拘谨，笑笑说道：“两位可以随便些，就像你们在自己的朋友家里……我需要的不是空泛的客套话，要的是真情实话，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的实话。”

土肥原的话一结束，李士群便情绪激动地说：“遵长官的指示，我就直说。为着收拾目前的时局，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联合贵国，有力地推进和平运动，迅速实现日中之间的和平。”

他略略停顿一下又说：“窃以为，第一阶段的工作，以上海为根据地，开展和平运动。这方面需要贵国的谅解。”

“比如去年9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唐绍仪，被人用利斧劈死在自己的寓所。事后，蒋介石装模作样地颁发了对唐绍仪的褒扬令，其实这正是重庆的蓝衣社成员所为。而唐先生是响应贵国的和平主张的。”李士群的话触到了土肥原的痛处，土肥原颇为欣赏地说：“有什么办法对付重庆的恐怖活动?”

李士群正待回答，丁默村又插了上来：“这靠贵国的军队恐怕不行……”

“为什么?”土肥原似乎有点不高兴。

“这是因为贵国的宪兵、警察只能捕获现场的罪犯，而隐藏着的重庆特工、蓝衣社的地下组织依然存在。如果不彻底根除，恐怖活动就会有增无减。”李士群说。

“以你之见，有何良策?”

“我们认为可以用特工对付特工，以我们优秀的人才和严密的组织、先进的武器所组成的特工来取胜重庆的特工。”李士群接着说：“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我们这一批同志，过去都曾在重庆的

特工组织干过，知道他们的内情，他们的力量、弱点、活动规律，全都洞悉无遗。如果再有贵国的援助与指导，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这是我们搜集的国民党方面各种资料汇编和具体的应对方法。请您过目。”李士群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了好几份小册子递给土肥原。

土肥原逐一看了封面，上写着“重庆抗日地下组织一览表”、“对渝方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心理作战研究”、“特工组织规划方案”。每一份的封面上都写有“呈土肥原机关长，李士群、叶吉卿写”几个字，写得端正秀丽。

土肥原面露笑容，观看起手上的“抗日地下组织一览表”来。表上列有各抗日团体的人员、组成情况、活动内容；军统、中统、三青团的负责人、人员、力量配置、情报网、活动地区，所侦得的日方与上海市政府要人的动向。土肥原很感兴趣。他想：这些材料我们怎么没有掌握？我们的这些特工真是无能。

“请您再看看我们的组织规划方案……只要有武器、人员、经费，我们就能立即行动，搞垮蓝衣社是完全可能的。”李士群又献媚说。

土肥原这才开了腔：“承蒙三位讲了有益的话，我认真听了，很感谢！个人认为你们的意见有参考价值。这些计划还待详细研究，再说我也不能立即作出决定，需要请示。这实在遗憾！”

三天后，土肥原的专使晴气带着丁、李两人的这些计划飞回东京，向大本营请示。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他是日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有名的“中国通”。这时，影佐正着手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上海是基地。他正愁汪精卫一伙势单

力弱，而重庆特工在上海又极为活跃。看了丁默邨、李士群的行动计划，正中下怀。他竭力为丁、李两人的行动计划吹嘘。在他的鼓动下，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训令是给晴气的，内容为：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村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联络，援助其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诸项政策，并须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各项工作。分配本诚宪兵大佐和中岛信一少佐，作为你的部属；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应对丁默邨提出如下要求：1.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2.不得逮捕和日方有关系的中国人。3.和汪兆铭“和平运动”合流。4.三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30万日元，并给予彼等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500公斤炸药。

1939年3月1日。一辆日本军用卡车从虹口驶向沪西。车上有一个班的日本宪兵，他们押送着两大箱日本正金银行发行的钞票，整整30万日元，送往极司菲尔路76号。

随车送来的还有枪支、子弹、炸药。

丁、李合伙的特工机关正式开张了。

与汪精卫合流

李、丁二人的特工组织建立后，立即招兵买马。一些臭味相投的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失意政客、军人，纷至沓来。李士群认

为丁默邨尽管地位较高，自己又具有特工才能，然因工作环境和条件所限，要想成大气候，还是不易。而在当时，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已明显表露出投日的决心，因此经汪曼云的建议，李决定鼓动丁与汪精卫合流，如此一来马上水涨船高。但是丁默邨、李士群当年在陈立夫、陈果夫CC派编辑《社会新闻》时，曾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破口大骂过，双方历史成见很深。因此与汪精卫联系，对丁默邨、李士群而言可说是一道难题。正巧汪曼云要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丁默邨就托他途经香港时把一千元交给周佛海。几天后汪曼云在香港亲自将丁默邨的信交给了周佛海，并详细介绍了丁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周佛海听了非常吃惊，便说：“默邨既有信来，我可以见他一面。”就这样几经周折，丁、汪联系渠道终于沟通了。而此时汪精卫正当用人之际，经周佛海出面说合，又见这批人是按日本方面的意见前来投靠的，也就同意接纳了。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日本方面授意丁默邨、李士群前去拜见，并正式商谈彼此合作的条件。丁、李两人提出的条件是：汪精卫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10月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如果新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等几个席位。条件之苛刻，使汪精卫不知所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最后答应说：“很高兴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兼任也是有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

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好了。”接着汪精卫又圆滑地许诺：“8月召开全国党员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双方满意拍板成交，丁、李二人还向汪精卫表示了“愿用性命打赌，定不辜负期望”的誓言。由此，汪精卫的警卫工作，由李士群、丁默邨全权负责保卫。

1939年8月28日，汪伪国民党“六大”在李士群、丁默邨控制的特工总部所在地极司菲尔路76号大礼堂举行。

为了保证开好这次伪六全大会，“76号”甘为汪伪政权充当马前卒。丁默邨与李士群对大会的保卫和汪精卫的安全，真是煞费心机，作了精心布置。当时汪精卫住在愚园路1136弄，与极司菲尔路虽然距离不远，但汪的目标毕竟太大，开会那天往返能否不出意外，把握不大。于是，丁、李便向汪精卫建议，要汪早一天到76号，迟一天回愚园路。

丁默邨与李士群要他在76号里睡两个晚上，心里委实不甚愿意。但又生怕不这样办，万一这天在路上出了岔子，丢掉了性命怎么办？汪于是只好接纳了丁、李的意见，带了内侄陈春圃和几个亲随副官保镖住到了“76号”。李士群为了表示殷勤，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汪，汪叫陈春圃也睡在房里，让他们带去的副官保镖，则睡在房门外面。可见汪精卫那两晚睡在“76号”，也是提心吊胆的。

另外，他们事先还严密封锁会议的内容，连那些所谓“代表”，也是到了会场才告诉他们的。开会的那天，为了迷惑外人，还在“76号”门首高搭彩牌，中间还缀着霓虹灯的“寿”字，把里面的闹剧伪装成是在做寿。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地段在租界的防务方面归意大利的驻沪军队负责，于是由日本人出面与之联系，派了一排意大利的驻军，携带了机枪，荷枪实弹，驻在“76号”的对门，还

煞有介事地把机枪对准了“76号”大门，名为监视，实则保护。因为这样一来，英法租界的捕房方面反而不好有所动作，怕与意大利军队发生误会。“76号”则也给驻沪意军一个“下场势”。在开会的那天，“76号”的大门，始终紧闭着。那些来开会的“代表”，自己有汽车的，一概绕道极司菲尔路正门口，从后面的小路进入“76号”的后门。没汽车的，由“76号”西首的华邨，转入“76号”，也可不经大门。为此，在开会的前夕，“76号”派出许多特务，各持武器，威逼华邨这条弄堂里所有的房客，当夜全部迁出，空出来的房子全部占用，并在“76号”里的花园与华邨相隔的一垛墙上，开了一个壁洞，没有汽车的“代表”，就从华邨钻壁洞而入“76号”。开会前后，大雨滂沱，这些钻壁洞的家伙，固然淋得相当狼狈，而被逼迁移的居民情况更是凄惨万分。

在所谓“六全大会”结束后，又在汪精卫的家里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把魔窟“76号”，安上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的名称。

“76号”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周佛海因不甘于眼看着这一政治资本抓在汪精卫的手里，于是在这“执行委员会”与“特工总部”之间，拦腰加进了一个“特务委员会”，并自兼主任委员，丁默邨为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为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名义上，“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首，但实权却仍操李士群之手。自此，以李士群为代表的特工组织在汪伪国民党内取得了它的“法定”地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为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实力雄厚的特务行动机关，成为汪伪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为非作歹，危害人民最甚的一个血腥恐怖组织。

招降国民党特务骨干

夺取蒋方特工组织，是李士群、丁默邨向日本大本营夸下的海口。汪伪特工总部正式建立后，李士群、丁默邨就运用过去的老关系，采用各种手法，拉拢蒋方特工人员。

早在 1938 年 8 月，中统局高干徐兆麟在上海成立中统局东南督导区，下辖上海、南京、宁镇、苏锡、松嘉等五个分区，并派中统局本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来上海协助搞锄奸活动。他们精心策划指挥特务用利斧砍杀了居住在上海租界内某处的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理由是唐将接受日军拉拢，出任傀儡政府要职。随后又枪杀广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探路长、青帮头目陆联奎，据说也是因他与日本人有勾搭。此外他们又多次袭击过“76 号”的小轿车，而且还在“76 号”布置了“内线”……日本“梅机关”和宪兵队严令李士群迅速侦查破案，汪精卫也迭令严加防范。李士群认为事关日汪对自己的信任及本身的安全，当然不能容忍。再加上李、徐早有旧怨。早在 1932 年李被捕时，就是徐兆麟亲自审讯并屡施酷刑，李早就怀恨在心。此刻徐兆麟又在和自己作对，新仇旧恨，更加火冒万丈。于是亲自布置，严令部下加紧侦缉，务将徐所领导的地下组织彻底破获，并扬言一定要活捉徐兆麟。

李士群知道苏成德一向生活浪漫，而且也有野心，对中统局行动队长一职早就不满，认为是大材小用，常有怨言，于是决定先从拉拢苏成德入手。经过反复侦查，得悉苏成德经常在公共租界某舞

厅跳舞。由于当时日军尚未进占租界，未便公开逮捕，乃采用绑架手段。

1939年9月下旬某晚，李士群派了便衣特务密布舞厅周围，又以部分精干打手佯装舞客混入舞厅。当时苏成德拥着舞伴跳得正酣，这群“舞客”一拥而上，用麻醉药物撒在苏的面部，苏立即中毒晕倒，随即被架上汽车。捕房巡警闻讯赶来，汽车早已逃之夭夭。

苏成德苏醒过来时，已经睡在“76号”接待室的沙发上。李士群连忙过来赔礼道歉，随即命人备宴压惊，待若上宾。酒酣时，李士群劝他参加“和运”，共享荣华。苏成德，听李一番甜言蜜语，当即表示愿意入伙。李士群又要他趁热打铁，先行说服其行动科科长姜志豪率部来归，姜志豪果然率领全部行动队员一齐投伪。苏成德为向李讨好，立即接受指示，命姜忘豪率行动队员出动、逮捕中统局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徐兆麟等人。

姜志豪与徐兆麟私交甚厚，不忍下手抓徐，当他带了行动队员到达法租界徐的住处时，叫部属在楼下监视，说：“让我先上去搜查。”随即上楼敲门。徐兆麟是特务老手，早在亭子间后窗外放好了外逃的跳板，刚开门，姜志豪就向他示意，徐即越窗逃走。姜志豪故意大声说：“没有人，……走！我们再到别处去找。”就这样，徐兆麟得以逃出上海，又设法经香港转回重庆。

不过，姜志豪也逮捕了一些人，其中有中统局东南督导区秘书胡敦云（胡均鹤）、上海分区主任邓达谧，徐兆麟领导的中统东南督导区以及所属分区均被彻底破坏。李士群由此得到汪的嘉许，又增加了他专横跋扈的资本。

1940年1月，李士群又成功地收编了“军统”华北区青岛站。

当时，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伪组织傀儡，在日寇的指挥下，将在青岛举行所谓“青岛会谈”。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青岛做了布置，预备在举行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首脑梁鸿志、王克敏，以破坏会谈。李士群率“76号”特务，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带王天木先于汪精卫到了青岛。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原是王天木的部下，傅的地址王是知道的。于是，李士群率“76号”特务毫不费力先抓到了傅胜兰，后又抓到了傅的部属也是傅的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一起十数人，连电台全部破获。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给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丁美珍被捕后提出，只要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叫傅率领所属人员投汪。李士群当即完全接受了下来，于是，“军统”青岛站集体投靠了汪伪特工总部。

接着，是在汉奸张北生的帮助下捕获、争取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主要成员。张北生，南通人，抗战前是国民党的南通县长，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是小同乡。抗战后，他在家乡丢了官，钻营了一个时期钻不出名堂来，于是在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了一个消息，于是就去找吴世宝，向“76号”密报，说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几个要员吴绍澍、马元放、张渊扬、掌牧民、石顺渊、崔步武等人在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新民邨9号开会。吴世宝带张见了丁默邨与李士群。李士群连忙组织一队特务赶往那里。抵达上述地点时，新民邨9号的整幢房子虽上下空无一人，可是客堂里瓜子壳、果皮狼藉满地，正中摆着一桌酒席，犹原封未动，似刚要人席，闻警逃逸了。门口的衣帽架上，还留有几只呢帽，显系在仓皇逃逸时来不及戴走的。这次人虽未抓到，张

北生却因此搭上了“76号”的关系，领到了1000元的活动费。这次张北生虽“功败垂成”，但心终不死。过了一个相当时期，张又到“76号”来报密，说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主任委员马元放与委员掌牧民、石顺渊、崔步武以及教育部的专员周孝伯等，和他一起在福州路口西藏路的大中华饭店开了房间，准备打麻将，叫向导，玩一个痛快，再回苏北。李士群据报，叫来助手马啸天商量后，决定叫第三处处长张劲庐（女）与马配合行动。着张北生先回大中华，撺掇他们兜好麻将搭子，人局赌钱，而后由张打电话给马啸天，推说是打给向导社叫向导的。于是由张劲庐伙同两女特务，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应陪。马元放等这批醉生梦死的家伙，打完了牌犹余兴未尽，带了这三个冒牌的向导，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一阵。回到旅馆坐犹未定，这时日本宪兵队已与巡捕房交涉妥当，与“76号”第二处所派的特务，会同捕房人员守候在邻室，看马等同进房里，便也一起闯了进去，不容分说便把马元放等人，带到了福州路中央巡捕房。后来他们又被日本宪兵队引渡出租界，押解至“76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主要成员被一网打尽。

1941年10月，汪伪特工总部又破获了“军统”上海区的组织，逮捕了区长陈恭澍、书记齐庆斌等人。陈恭澍曾经是河内刺汪案的主要负责人。陈被捕后，由于李士群对他百般优待，便表示愿率所属干部百余人，参加“和平运动”，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主张，并将秘密电台九座，枪支数十，弹药数千，全部交呈汪伪特工总部，表明其投效之忠诚。这样，“军统”上海区就成了李士群的战利品。

魔窟“76号”

丁默邨、李士群的汉奸特务组织在与汪精卫集团同流合污前后，已经两易其驻地了。由于特工队伍人数迅速增加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他们先从大西路67号搬到了忆定盘路95弄10号的一座洋房，对外由李士群的妻子出面，称“叶公馆”。但不久，他们又感到这里并不理想，因为“10号”位处弄堂里，连一辆汽车都无法掉头，平时为了安全，只好在弄堂口摆起两个水果摊，作为望风哨，还派人不时在弄堂里进进出出，这既不体面，又不大方便。最后，由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搬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这就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极司菲尔路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因此路权归工部局巡捕房管理，路的两侧仍属华界。“76号”就坐落于极司菲尔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的私宅。陈原系北洋军阀直系将领，曾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当年，这里是陈做寿、唱堂会的地方。按习惯，马路两侧属华界的房屋，每户门上都钉有白底黑字的门牌号，唯有这“76号”与它的东邻“74号”，以及和它对面的“75号”三幢大的花园洋房，门上钉的却是蓝底白字的门牌号。据说在前清时，外国人在中国购买土地，它的执行凭证经过洋商挂号，再由旧中国道台衙门登记认可，称之为“道契”。而这三幢洋房都拥有此种“道契”。抗战爆发后，“76号”为日军占领，经晴气庆胤的撮合，把

它拨给丁默邨、李士群做活动场所。

为了适宜特工工作的需要，根据李士群的设计，他们首先对“76号”内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原先的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在两侧的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了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的东边，南北相对地新盖了二十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添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进行现场“指导”和监视。“76号”的主要建筑物是正中的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以及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李士群虽在室内搭了张床铺，但从不睡在那里，却睡在旁边的浴室里。因为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他每晚在浴缸上放一张棕棚，早晨一起床就把棕棚拿掉，以防不测。三楼有两个房间，作“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上一个讲台，算是大礼堂。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除在“76号”大兴土木外，丁默邨、李士群又在日本特务机关的许可下，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名叫“华邨”弄内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该弄二十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的家属住宅。为了安全，他们将靠马路的弄堂口堵死，在“华邨”东首与“76号”大门内相隔的墙壁上开了一个便门，所有居住在“华邨”的人，一一发给出入证，概由“76号”大门进出。为了加强警备，丁默邨、李士群还让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邨”西头墙沿下，搭

了一间木房，派了几个特务，开起一爿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设一家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另外，从曹家渡新康里起以迄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取得经常的联系。“76号”内的戒备就更加森严了。过去，警卫人员一个个身穿黑衣衫袴，敞开胸襟，歪戴帽子，嘴里叼着香烟，手里转动铁弹子，一副地痞流氓的丑相。进“76号”后，除吴世宝外，都穿起草绿色的制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76号”门外是越界筑路，他们不能在门外设岗，便在门内层层加设门警。“76号”大门除汽车进出外，平时总是关着，人由旁边的小铁门出入。这里经常驻守一个班的武装，遇有紧急情况，还要增加人数。凡要进“76号”的人，都必须持有淡蓝色的通行证，上面印着“昌始中学”与本人的姓名号码，并贴有照片。如果要进入其他几道门，还得备有一本贴满照片的簿子，并编好号码，让警卫验明正身后，方可进入。至于出入丁默邨、李士群所居住的高洋房，就更困难了。该处楼梯口设一道铁栅拉门，派有便衣特务警戒，虽持证件，但未经丁、李特许，任何人也不能上楼。这就是“76号”！它是汪伪特工进行罪恶活动的理想场所，作为汪伪特工的代名词，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

“76号”开张后，丁默邨、李士群一伙为压制上海的抗日反汪活动，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上海新闻界，是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自从上海沦陷后，在沪爱国报人利用报刊，宣传抗战，激励民众进行爱国救亡活动。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消息传出，上海爱国报人义愤填膺，揭露日汪勾结的阴谋，汪伪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铲除而后

快。从1939年春开始，“76号”即向上海新闻界开刀。6月中旬，丁默邨、李士群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名义，分别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和有关编辑、记者发去恐吓信，威胁说：“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指重庆国民党的通讯社）之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并公开发表一道对83人的“通缉令”，将一批新闻界人士列为通缉对象。威胁之外，他们进而利用汉奸武装先后袭击了《中美日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报馆，戕害爱国报人，殴打报贩，妄图堵绝抗日反汪报刊的发行。而对坚持抗日的共产党人，他们更是恨之入骨，不肯放过，当时上海妇女界著名抗日领袖、共产党员茅丽英，就是被“76号”特务用带毒的子弹头打中而身亡的。如果说汪精卫集团建立伪政权的活动是在“和平”口号下展开的话，那么“76号”则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

丁默邨、李士群还秉承汪精卫的意旨，靠“76号”的武装力量，运用各种威吓利诱的手法，将人拉入“和平运动”行列，为汪精卫集团罗网党羽，扩充队伍。他们通常是先派一个与对方比较熟识的汪派人士出面游说，鼓吹汪伪“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并以金钱和地位来打动对方的心。如果游说不成，他们就派人将一封恐吓信直接送到府上，里面还附有一颗子弹，限一星期内离开上海，使对方坐卧不安，蒙受重大的精神压力。倘若这一步还达不到目的，他们干脆用汽车将对方强行绑架，送进“76号”内，“嘱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逼其就范。凡是参加者，都要先填一张宣誓书，上有“和平建国”、“拥护领袖汪精卫”一类的内容，

然后在“76号”会客厅内举行宣誓仪式，由介绍人担任司仪，而由丁默邨、李士群等中的一人担任监督。宣誓后，将宣誓书交到登记科，换得一叠新的钞票，算是完成了卖身的交易。如若这时还不从，就有性命之虞。实际上，被“76号”所寻觅的对象，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或逃往外地，便是命归西天，很少有能在上海照旧生活下去的。

就这样，“76号”为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充当打手，为汪伪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始，特工总部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正副主任之下，设有主任秘书、秘书、外事秘书、会计主任，以及总务科、交际科、警卫大队，第一、二、三行动大队，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招待所、看守所、警官训练班（即特务训练班，对外称聚川学院）等。不久，增设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及抚恤委员会。到九月底，又增设了一、二、三、四四个厅。为时仅一个月，则把各委员会与各厅一并取消，改为四处（一、二、三、四处）四室（督察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至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前，“76号”的组织人事又经过了一番较大的变动，将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辖五个大队，并增设了特工总部行动总队，下辖六个大队。还设立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行动组织。同时还建立了几个外围组织，如“海社”、“上海法院同仁会”、“立泰钱庄”、“国民新闻社”、“东南贸易公司”、“上海实业银行”等，把魔爪伸向各行业。除此之外，“76号”还在其他沦陷区设立特工组织，如特工总部南京区、特工总部杭州区、特工总部华南区等。总之，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夕，特工总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76号”汉奸特工组织，成了汪精卫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他们还越出了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当时，沪西一带赌台林立，丁默邨、李士群就指令吴世宝，令他将沪西所有赌台纳入“76号”的势力范围。在日本宪兵队的支持下，他们以娱乐为名，大登广告，招徕赌客，“76号”坐地分赃，攫取大量不义之财。汪伪特务处长级的头目每月可分得五百元，以下三百、二百不等，丁默邨、李士群和吴世宝本人，自然要高得多。赌台之外，“76号”又染指烟、毒。烟，指的是鸦片烟；毒，就是吗啡、红丸、高根、咖啡因等，这些东西是帝国主义者汲取中国人民血汗、残害中国人民的杀人软刀子，而“76号”将此视为珍宝，仍然由吴世宝出面，指挥其徒子徒孙，到各处土膏行、售吸所“登门拜客”，以各种借口，甚至用手枪威胁鸦片烟瘾大的人，强迫各行各所向他们交纳“月规”。与此同时，吴世宝还在沪西郊区开设一爿制造吗啡的工厂，并在八仙桥首安里开店，专售白粉（吗啡），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而“76号”却由此牟取暴利。所有这一切，都是“76号”汪伪特务们干出的罪恶勾当。

欲望膨胀

当李士群由港来沪，为日本大使馆做情报工作时，原本是偷偷摸摸，唯恐人知，后来日本主子要他做行动，对此，一来他自知自己名字的三个字不足以号召；二来生怕露了头面，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拖来了丁默邨，做他的挡箭牌。反正只要有利可图，而又不用

自己出头露面，他都愿意让丁默邨去做前台经理，自己甘居幕后，做后台老板，对此李颇以为得计。

谁知丁默邨一做了这个黑店经理，有了政治资本，竟以此勾上了汪精卫。这，不仅李士群未曾料到，连丁默邨自己也是意想不到的。可是对李士群来说，深悔棋子走错了一着。过去以为只要图利，不必图名，现在不仅要图利，而且要名利双收。也就是说，过去只想搞几个钱，没想到现在还可以做官，做了官便能搞更多的钱。可是经理一职，丁默邨已在干了，大权业已旁落，又不能马上反悔，出尔反尔。再说，自己过去对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又不认识，即使大权在握，也搭不上线。所以汪精卫一到上海，李又托陈春圃转给汪一封万言长书，自我介绍丁默邨是个“摆子”，他是老板，丁只是他用的打手而已。同时，为了讨好汪精卫起见，一切都做在丁默邨的前头，以示愿为先驱。他觉得这还不够，还必须培养实力，以打击对方，把实权渐渐地转移到自己这方面来。

按伪特工总部的编制，主任以下设秘书室和四个厅，五个行动大队，一个看守所，一座无线电台，另外还设一个专员室。秘书主任一职，李士群表示尊重丁默邨，同意以丁的好友应某人担任，四个厅长则完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如“一厅（总务）厅长”叶耀先是李的内侄；“二厅（组训）厅长”马啸天是李士群的把兄弟；“三厅（情报）厅长”胡均鹤，是李士群夫妇说服投汪的；“四厅（侦行）厅长”苏成德，是自动出卖中统地下组织向李投靠的。

五个行动大队更是李一手培植起来的。无线电台总台长晋辉、副总台长周鼎，都是原军统特务向李投靠的。至于“专员”，并无实权，分别由丁、李二人的亲友充任。1939 年 9 月建立的伪南京特工区区长唐惠民，也是李的十兄弟之一。这样，就把丁默邨架空起

来。李士群遇事自作主张，独断专行，还没等到“还都”南京，丁默邨迫于李士群咄咄逼人的架式，只好下台。于是，李士群的伪特工总部主任之梦终于如愿以偿。

李士群一上台，立即撤销秘书室，改设“书记长”，派其亲戚傅也文充任，巧妙地排挤了丁默邨的亲信应某人。同时还把各厅改为处，不过人事依旧。从此特工总部变成清一色的李氏亲信，李士群大权独揽，更加横行无忌了。

李士群很相信“时势造英雄”这句古话，他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正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好时机。在他看来，不管时局如何变化，只要有武装，有经济实力，便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随心所欲。1943 年夏，他曾在苏州举办的“特工人员训练班”上，对学员和列席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将来的政治出路，全靠我们自己的实力。现在和日本人合作，受到重视和重用，就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实力和办法。将来如果说蒋介石胜利了，我们拥有实力，不愁得不到适当的地位，即使共产党得胜，我们凭武装实力，和他们谈判，也可讨价还价。万一不行，还可拥兵割据，以待时机。因此，我们现在不但要扩大和加强特工组织，而且还要建军。所以，大家无论是对和平军、渝军、共军，只要有路可钻，必须想尽方法去拉拢，甚至用‘打入’、‘拉出’、‘分化’等方法，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还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在浙东四明山区建立军事根据地，因为那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很好的地盘……”1942 年夏，李士群开展“清乡”活动，声称要将封锁线外之敌予以剿灭，在征得影佐和汪精卫批准之后，自己担任了苏、浙、皖、赣四省边区行营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杭州，派其亲信傅也文为秘书长，坐镇主其事。这就是李士群实力计划的具体实施。

对此，他曾向其亲信们说："我这样做，主要目的，就是扩军。因为只有提出'剿共'的口号，才能使'梅机关'同意扩军，也只有用这个口号才能成立'剿共'总指挥部。"

李士群是靠特务起家的，所以他在投敌以后，首先攫取了特工指挥大权，然后便培植亲信党羽，排除异己，树立威信，扩充武装，掠夺财源，继续扩充、发展其特务组织。他当上了伪特工总部主任以后，便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感化院"，目的是要"感化"所有被捕人员，使之成为李系忠实党羽。

同时，又在杭州设立一个政治保卫学校，请汪精卫兼任校长，以资号召。以其得力干将、伪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万里浪任教育长，实际把持校务。该校主要任务是欺骗社会青年，吸收学员，培训汪特人员。规定每六月为一期，直到 1945 年日军投降后才停办。这所学校先后为李网罗了不少党羽。

在上海，李士群还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修械所，能制造手枪、步枪，修理轻、重机枪。他得意地说："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兵工厂。"

"清乡"负责人

李士群投敌后，在汪伪集团中可算是"平步青云"了，然而他的野心并不就此收敛。

日、伪勾结发动的"清乡"活动，是日军侵华战争中最凶狠、最残酷的暴行，也是李士群卖国投敌后最疯狂、最丑恶的表演。李

士群具有狂妄的个人野心，这次日军要发动"清乡"，他认为是可利用的大好时机。他明知日军"清乡"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其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的矛盾，以摆脱其财政枯竭的困境，也知道汪精卫是想倚仗日军军事力量来消灭抗日武装，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对他本人来说，这也有利于实现发展武装、扩张势力、争夺地盘的野心。

因此，李士群决定首先谋夺适当职位，攫取"清乡"实权。1941 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提出要在长江下游进行"清乡"的方案，李士群便自告奋勇向汪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出谋献策，并与原上海"梅机关"负责人晴气庆胤中佐（当时任汪伪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等商订实施计划，随即以伪特工总部主任、调查统计部长身份，会同影佐祯昭正式提交汪精卫和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大将。同年 3 月间，正式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李士群当上了秘书长，实际掌握"清乡"大权。另外还有个副秘书长汪曼云，当然也听他的指挥行事。

李士群当上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秉承日军旨意拟就了在苏南、苏北分期"清乡"的计划，并在苏州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自兼处长坐镇指挥。当时，伪江苏省政府也设在苏州，省长高冠吾是伪维新政府梁鸿志系的老牌汉奸，当然不会听从李的指挥。因此，李视高为眼中钉，决定首先拔掉他。

李士群一面向日汪数落高冠吾不与他合作和"清乡"区政令不能统一的危害，一面密令江苏各地特务爪牙搜集高冠吾及其部下的各种罪行，向汪精卫和"梅机关"控告。日、汪为了顾全"清乡"大局，充分发挥李士群这员干将的作用，在 1942 年初的伪行政院会议上，以"清乡区省政统一建制"，"实行清乡省政一体化"为

理由，把高冠吾调任伪安徽省省长，所遗伪江苏省长一缺由李士群接充。接着，李士群又以配合“清乡”等种种借口，谋夺了苏、浙、皖、赣四省“剿共”总指挥等重要职位。

李士群于1942年3月12日到职视事。为了树立威信，他又别出心裁，搞了一次骇人听闻的“肃清不良分子运动”，又称“清城运动”，以此作为“清乡”的前奏曲。他事先密令无锡、苏州、常州、常熟、江阴等地特工站，调查反对“和运”的抗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并开具名单由李等人亲自审查，最后圈定应该处置的“黑榜”。李时时不忘与“梅机关”取得合作，他下令上述各地市的伪警察及特务分子在日本宪兵队的协助下，于一个晚上同时出动，按照圈定“黑榜”进行突击逮捕，共抓2000余人，其中有许多是进步人士，也有一些共产党人，而更多的还是一般的商人和居民。各地被捕人员，少数当时即被“处决”。一部分经家属托人说情，出巨款赎回，大部分都交各地日本宪兵队处理。其中一部分身强力壮的，被送往安徽省裕溪口煤矿做苦力；一部分送日本陆军医院，说是服劳役，实际上有些是被当作解剖的活标本，供实验之用；还有一部分被送往日本国内供奴役。更残忍的是，有一批人被装入麻袋，然后用船运出，抛入长江沉没。

为了贯彻执行“清乡”计划，李士群建立了一整套“清乡”机构。1942年春，李士群在苏州成立“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地址在苏州城内十梓街信孚里。李自兼处长，下设秘书、专员、参议等室和五个组。第一组司政务，组长陈光中；第二组司财政，组长余百鲁；第三组司军事，组长唐生明；第四组司社会福利，组长由汪伪政府社会福利部次长彭年兼；第五组司会计，组长何廷祯。组下各设若干个科，也委派了科长。另外，还设立了党务办事处、民

训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宣传总队、“清乡”警察总队。总队下辖各“清乡”大队。这些机构也属“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受李直接指挥。

在此以前，李士群再次利用特工作为“清乡”急先锋，早就成立了伪特工总部驻苏办事处，派原军统特务黄尔康为次长，开始布置情报、交通网。1942年初该处撤销，重新成立了“江苏实验区”，派胡均鹤为区长。伪特工总部“上海区”也改为“上海实验区”。以原军统特务万里浪为区长。各“实验区”还设副区长一至二人，以下设秘书室和总务、组训、情报、侦行、感化等科，各设科长一人，股长、干事、助手若干人，日语译员一至二人，此外还有一个看守所和一座无线电台。

“实验区”下各辖若干特工站、组，大致规定是，一、二等县设站，三等县设组。重点站还设日语译员、无线电台、警卫班和看守所。这样，李士群的特务魔爪伸遍了华东各敌占区。不过，上述各种机构都是在日本“梅机关”派遣的便衣宪兵监视下进行活动的，直到“清乡”开始后，“清乡”区、站的便衣宪兵才撤走，这才稍稍淡化了汪特分子在人民群众中露骨的奴才形象。这也是日本推行“以华制华”的伪化措施。

为了专门培训“清乡”特务骨干，除了原有各种培训机构外，李士群又举办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特工人员训练班”，地址在南京挹江门内马厂。李指派伪警政部政治警察署长马啸天为主任，共培训职业特务500余人，会计人员200余人。以后，又在苏州等地举办了规模较小的特工训练班和其他各种名称的训练班。这些受训学员结业后，一部分充实了“清乡”地区特务组织，大部分则被派到“清乡”地区，专门从事大、小检问所和编组保甲等活动。

李士群懂得，搞政治活动必须要有自己的舆论工具作喉舌，所以他很早就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新闻》日报（地址在上海愚园路），派黄敬斋负责主编。该报除宣传“和平反共建国”、“曲线救国”等谬论外，还竭力为李吹捧。1942年“清乡”开始后，李又在苏州创办《清乡月报》，作为“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和伪江苏省政府的机关报，专事宣扬李的“清乡”功绩，鼓吹“清乡”政策，报道“清乡”成就，侮蔑共产党人和攻击抗日活动。

1942年4月，苏州地区的第一期“清乡”开始。李士群派得力干将张北生为苏州地区“清乡”主任，成立了苏州地区“清乡主任公署”和“特别区公署”等机构，在侵华日军的配合指挥下，进行了血腥屠杀，使人民遭受惨重灾难。一旦占领城乡后，马上就推行伪化政权，大肆鼓吹其“清乡”胜利。接着于同年7月成立了“太湖东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仍以张北生为主任，开始了第二期“清乡”。到同年12月，又宣告第二期“清乡”完成。日伪认为张北生“指挥有方”，誉其为“清乡专家”。实际上这个地区的敌伪比较猖狂，原来在这一带活动的新四军部队早已主动撤出，地方军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反“清乡”斗争，给敌伪以一定的打击之后，也转入了更隐蔽的分散活动。伪政权并未达到“清乡”的目的。

日伪“得陇望蜀”，又于1943年初，袭用江南“清乡”老谱。筹备在苏北地区“清乡”。同年4月，李士群与侵华日军师团长小林信男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并在南通城内成立了“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仍以张北生为“主任”兼“保安司令”；同时，成立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后改为“苏北分区”）。日军亦调“来小林师团所属联队和部分宪兵为主力，李士群也从江南调来伪清乡警察大队”和大批特工、行政人员，

又把当地原驻伪军、警改编为警察大队、保安队、特工外勤警卫队以为配合。

在日军指挥下，李士群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和残酷的“三光”政策，他满以为凭这一万五千犬狼之军及其特务就唾手可得同江南一样的“胜利”。哪知新四军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早有准备，经过持续的英勇抗击和机智、灵活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伪在苏北的“清乡”阴谋。后来，日伪虽曾以“延期清乡”、“高度清乡”作困兽之斗，但也没有达到任何目的。

建军美梦

李士群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借以拥兵称雄，争权夺利。日军对他既欲重用，又恐尾大不掉，处处欲加限制，防他势力过于膨胀。加之汪伪内部倾轧甚烈，所以李士群只能搞成一支特务队伍以及“清乡警察大队”、“保安队”等地方武装，始终没有搞到伪“和平军”的正规番号。

早在江南“清乡”前，李士群就密嘱汪伪杭州区区长谢文潮拉拢驻浙东的伪“和平军”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自己也曾千方百计拉拢过“和平军”第一方面军的徐朴诚、程万军、龚国梁、熊育衡等部，但仅止于“友好相处”，而无法收编为部属。因此，他决定在苏北“清乡”中实现建军计划。

李士群的具体办法是，一方面，公开利用“清乡地区统一建制”等借口，改编当地伪军、伪警；另一方面，吩咐“76号”特工

总部第二处副处长姜颂平尽力进行。他对姜说："你和李总司令（指驻泰州的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以及颜秀五、丁聚堂、陈才福等几位师长都有过直接联系，又和施师长（即汪伪第七师师长施亚夫，后据了解他是经中共组织同意打入汪伪组织的）是老友，所以你此次成立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首先要去拉拢他们，说明我的打算是把新四军赶出江苏，希望他们通力合作，将来总有出路。"姜心里也有数，知道李的"合并"计划是不容易实现的，但还是在南通分区成立前就先去如皋找了施亚夫，转告了汪、李关于"和平救国"的主张，最后谈到李士群要求合作的意图。施表示愿意合作。姜又请他介绍与伪三十四师师长田铁夫面谈，同样也作了转告。田铁夫也表示拥护"清乡"。后不久，姜又陪施亚夫到苏州和李士群见面，李设盛宴款待施，又吹了一通其"和平反共建国"的谬论和他的计划，施自然也应答一番。但过了没多久，施就把队伍拉到了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反"清乡"斗争。田铁夫部有一部分被编为"清乡派遣队"，但由日军直接指挥，李士群的打算还是落了空。

对李长江部的联系，姜颂平是交给汪伪泰州站站长李乃光去办理的。李长江表面还算客气，说："好呀！我们全是姓李，本家，好说！好说！"实际上，李长江哪把李士群放在眼里，连一兵一卒也没给他。

南通地区原驻有伪军七师二旅张圣北、季达君、赵伦仪部，以及平潮自卫团张自健，天生港自卫团朱天放等部，他们都和姜颂平有点旧交。听说要"清乡"了，他们怕被改编吃掉，都来找姜。长兴公司（狼山附近江边垦区）地主武装郑长继也通过宗子敬和姜联系，姜当然表示欢迎。但特工组织没军队编制，姜只能给他们一

个“外勤警卫中队”名义。但他们都是当过团长、旅长的人，庙小佛大，只好派个下属来充中队长，自己弄个“专员”之类的名义。对此，他们都感到失望。姜报给李士群，他也不能委以伪和平军师、旅、团那样的番号，最后还是编成“清乡警察大队”，按“清乡”编制受张北生指挥。张对他们和姜颂平联系，早有醋意，再加上他自恃深得日军宠信，事事秉承日军旨意，不大尊重李士群。李非常气愤，多次愤愤地对属下抱怨说：“这家伙（指张北生）太没良心。”

新四军汤景延部的假投诚，也是先同姜颂平联系的。起初，他带来120余人枪，姜据情转报，上司也只委以汪特“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外勤警卫第四中队”番号，汤指定朱志清为中队长，他本人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之后，汤要姜带他去见李士群。见了面，他当面对李奉承一番，然后说他还有许多带兵弟兄，愿意拉来为李效力。李更加高兴，马上设宴款待，并写了手令交姜转给张北生以“苏北清乡主任”名义，派汤为南通“清乡”地区“第五清乡警察大队长”。汤回南通后，果然从启东海门一带拉来了500多人枪。张北生派员点验整训后，日军命令该部分驻金沙、石港、刘桥一带，以分散其兵力。到1943年9月，汤景延便把部队拉回抗日根据地，同时破坏了当地的一些伪组织，打死了汪特金沙组长翟光耀、南通县伪警察局局长傅来群，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在此之前，李士群的建军梦还没实现，就一命呜呼了。

被毒身亡

“清乡”期间，李士群个人的权势发展到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他身居数要职，频繁往来于上海、苏州、南京之间，每次外出都兴师动众，触动大批警察到车站或机场送迎，甚至举枪为他致敬。他在三地的官邸也是车水马龙，家中几乎天天摆宴请客。每逢他本人、妻子、母亲过生日，不仅厅堂走廊摆满酒席，花园空地上搭棚设宴，还要让剧团到家里搭台唱戏，真是不可一世！可是好景不长，李士群势力的过分膨胀，使得人人侧目，不仅加剧了他同汪伪集团内部其他各派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他的日本主子的疑虑、不安和不满。

李士群的权力膨胀，在汪伪集团中引起了一片恐慌，为抑制李士群的恶性发展，防止他尾大不掉，汪精卫于 1943 年初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成立一个政治工作委员会，代号叫“成和通运公司”，目标是逐步削减李的势力，进而翦除之。李士群权力的膨胀同样超出了让日军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严重冲突。在这之前，李士群手下的流氓杀手吴四宝竟公然劫夺日军的金砖，使日军对李士群的恶势力已有了进行抑制的计划。他借苏北“清乡”之机，大肆扩充地盘，原驻该地的日军南部旅团长对李也大为不满。

李士群在汪伪政权内部的飞黄腾达，主要是靠晴气庆胤的支

持。1942 年冬，晴气调华北任职，李士群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继影佐祯昭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的柴山中将认为，李士群的权力太大，又不完全听从日本方面的指挥，必须把他除掉。为此，他于 1943 年 8 月，亲往北平拜见晴气，商谈关于处置李士群的事。他跟晴气谈起曾暗示李辞职一事，但李不肯就范。这次会商虽由于晴气没有表态而无结果，但日本主子要抛弃李士群的大势，却已不可挽回了。

当李士群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逐渐失宠之时，他与汪伪集团内部其他派系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到处树敌，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最为突出的则是他介入了汪精卫与周佛海的争斗，威胁了周佛海的地位。伪特工总部成立时，周佛海竭力推荐同乡丁默邨任主任，李对此极为不满。后来，李使尽花招，把丁挤下台。因此，周、李也结下了怨恨。

1940 年 3 月，汪伪“还都”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周佛海当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了警政部长，而李士群只当个警政部次长，于是更加妒恨。后来李士群费了很大的劲又夺取了伪警政部长职位，周佛海大为丢脸，因此，二人矛盾更深了。

同年，周佛海与陈公博争夺伪上海市市长。李士群拼命反周助陈，致使周的“市长”梦落空。周佛海以伪财政部长兼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两职位本是一脉相承，但李士群见他独揽财政大权，心实不甘。李派王玉华去担任汪特广州区区长时，就曾对属下说过：“做了汉奸不搞钱，也对不起自己，将来逃难，还没资本哩！”因此，他决定要在财政方面与周较量一番。于是，李首先找他内侄叶耀先面授机宜，由汪伪特工总部拨资金在上海外设了一个“立泰银号”。叶当时任特工总部第一处长兼财务科长，又是伪警政部总务

司司长，自然是近水楼台。他便把这两个部的全部经费，拨给“立泰银号”进行投机活动。

李士群谋得伪江苏省长之职后，又派叶耀先为“江苏省地方银行”助理，运用职权首先补充“立泰银号”资金，改为“立泰银行”，并新建起银行大楼；又和上海几个实力雄厚的商办银行如上海实业银行等接上了业务关系，因此信誉大振。同时，李士群又根据“省银行经管省金库”的规定，命令江苏省一切财政田赋、税收等必须由省金库（伪江苏省地方银行）经管，与周佛海抗衡。这样，李士群就完全把持控制了江苏省的财政经济，使周的伪财政部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政令和业务在江苏境内受到层层阻碍。周佛海哪能容得，当然一遇时机就向汪精卫和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以及专门联系（控制）李士群的“梅机关”反映陈诉。

为了保护汪精卫及其伪政权，李士群还带领“76号”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下，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等人对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但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得逞。

后来，日本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对国民党实行诱降，周佛海是当然的合适人选。周与戴笠联系上之后，日方认为由周劝降蒋介石，比李士群出面可能性要大得多。于是，对周更加重视，甚至同意周在南京私宅架设电台，专与重庆戴笠私人电台联系。

由于李士群对国民党特工活动构成威胁，1943年夏，周佛海接戴笠密电要他设法除掉李士群，这正合周意。周与丁默邨密商，决

定向日方揭发李士群的个人野心，历数其专横行为，以此激怒日本人；同时密派亲信搜集证据供给日方，又利用李氏属下熊剑东与李的仇恨，取得熊的支持。几个方面一拍即合后，决定由熊策动其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课时任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的冈村设计下手。冈村对李早已切齿，经熊一激再激，终于下决心向“梅机关”提出杀李的报告。“梅机关”负责监视李士群的中岛信一也收到很多揭发李士群的材料，经“梅机关”研究，征得影佐祯昭同意，最后决定由冈村负责执行，处死李士群。

周佛海接到除奸令后，制定了杀死李士群的三个策略。“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即日本军人和李士群之间的矛盾杀死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与其他汉奸的争斗除掉他；“下策”就是直接派军统特务搞暗杀。经过反复比较，最终军统采纳了“上策”，要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不听使唤早就不满意。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冈村少佐，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

冈村满口答应下来。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1943 年 9 月 6 日晚，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李士群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到了百老汇大厦，宾主共四人，冈村、熊剑东、李士群及其随行的伪调查统计部的次长夏仲明。

随后，冈村的夫人将日本风味的菜肴一道道端上桌。李士群心

里有戒备，看见别人动了的菜，他才稍加品尝。最后，冈村夫人端上了最后一道菜，是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夫人最拿手的菜肴，今天李部长来了，特地做了这道菜，请李士群赏光尝一尝。

牛肉饼只一碟，李士群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敢吃，他把碟子推给了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来，笑着说："李部长是今天的贵宾，冈村夫人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决不敢占先啊！"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这时，冈村夫人又用盘子托出三碟牛肉饼，在冈村、熊剑东和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

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四人，所以分成一、三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他反而不高兴了。"李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俗，经冈村这么一解释，他也就不再怀疑了。而且，看到其他三人把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也吃了三分之一。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可是医院方面根本查不出来李的病因是什么。在苏州驻有一个日军师团部，师团长小林中将是苏州地区的"清乡"指挥官。平时李士群对他卑躬屈膝，唯命是从，所以小林对李颇有好感。当李的病情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小林因为不知道这是他们日本人自己干的，曾带了他师团部的军医官和华中铁道会社的一个铁路医官来看病。李看到了小林，以为他是来看看自己是否已死？要是还没死再来干一下的，于是一反过去胁肩谄笑的态度，变得声色俱厉，指着小林大骂"给我滚出去！"小林虽是说明来给他看病，李却坚决拒绝，不要他看，更不要吃他的药。后来小林与叶吉卿商

量，给李检查。检查结果，证实是中了阿米巴菌的毒。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等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到了这时，人就无法挽救了。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所以人死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这种病毒只有日本才有。

李士群在死前曾想开枪自杀，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倒不怕，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我这是自己对不住自己。"1943年9月11日，李士群在交代完要手下干掉熊剑东的遗命后，便一命呜呼。

李士群一死，李的亲信和他的老婆，为了他的所谓"生荣死哀"，推马啸天到南京去，向汪精卫要求四事：1. 要把李士群"国葬"；2. 要汪派代表致祭；3. 要汪精卫给一件纪念品殉葬；4. 要汪精卫题墓碑。汪精卫对这四个要求，除国葬说是经提交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为"公葬"外，其他三事，全部照办。汪派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致祭，纪念品是一方田黄图章，墓碑是"李士群先生之墓汪兆铭题"十一个字，在李士群大殓的前一天，由马啸天陪同陈春圃，带了伪中政会的决议及那方田黄图章和汪亲题墓碑字来到苏州。

李的尸体虽已缩得像猴子一样，可是还是用了一口顶大的楠木棺材成殓。李本人虽死，当时的伪江苏省政府还在秘书长黄敬斋的控制下，各部门掌握在他的虾兵蟹将手里，省库有的是钱，因而极尽铺张之能事。好在用不着他们掏腰包，反正都是民脂民膏。来吊

丧吃豆腐的，都是李生前的喽啰头目和各县的大小汉奸。当地的日本侵略军，如师团长小林、江苏联络部长金子，以及苏州的宪兵队长等也都是猫哭老鼠般的来作吊客。

人殓后即“移灵”上海，少不得又来一个大出丧。当出丧行列路过南京路国际饭店时，李士群的老部下、“76号”的行动总队长、军统特务林之江，带了十几个喽啰拦住了李的棺材，不让通过，说是他替李士群搞了许多钱，非要李的老婆，摆句闲话出来不可，后来经人说好说歹，才给放行，使这个神气活现的大出丧出足了洋相，真是大煞风景。

李的棺材虽已运出苏州，可是日本宪兵谋死李的传说，仍流传很盛，大概日军生怕引起其他恶劣反应，于是又由其驻苏州的宪兵队长表演了一套狰狞毕露的“城下之盟”。

在一个晚上，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派出几个宪兵，把“76号”在苏州的几个特务头儿，如傅也文、胡均鹤、谢文潮之流，以及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局长，分别召到李家，并叫他的宪兵把守了李家的大门，把这些人连同叶吉卿，聚集在大厅上，然后当众宣布说：李士群的死，我们是深感哀痛的，意外的是你们在李死后竟放出了一个恶毒的谣言，说李士群的死，是我们日本宪兵毒死的，这是绝对的造谣，我们日本宪兵是代表日本天皇执行宪兵任务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你们的造谣不仅对我们日本宪兵是最大的诬蔑，也是对我们日本天皇的大不敬，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为了要证实我们宪兵是不干这种事的，这几天我们进行了调查，已得到了两个线索，李士群的死是你（用手直指叶吉卿）和储麟荪（时任江苏伪省立医院院长，和李士群家非常熟悉，后来和叶逐渐发展为情人关系），把他害死的。

这时大家以惊奇的目光突然集中到叶吉卿的身上，而叶吉卿也像一下子触痛了她的灵魂似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委实抬不起头来，说随你瞎讲吧，接着就拿出女人的看家本领来，流着眼泪呜呜地哭起来。日本宪兵队长更不含糊，继续讲下去：据我们调查，你和储麟荪通奸，生怕给李知道，大家没命，于是先下手为强，把李毒死，以免东窗事发。叶吉卿听到宪兵队长对她将的这一军，把她的丑事这样当众宣布，真是又羞又恨。明明自己的丈夫是给他们毒死的，现在却给他们利用她与储麟荪的丑事，反打了一记耳光，使自己有话说不出，只好放声大哭了。

那个日本宪兵队长看到叶这么大哭起来，就把对叶的话说到这里打断了。接着便提了第二个线索，他说这第二个线索就是，李的死也可能是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把他毒死的，因为吴的死是李主谋毒死的，佘爱珍为了替夫报仇，也把李士群给吴吃的东西，暗里给李吃，所以吴与李的病情经过与死后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李士群要是被毒死的话，佘爱珍也是一个重要的同伙与嫌疑。他威胁说假使这个谣言不止，他们为了要拿事实来辟谣，就一定要把三个嫌疑者逮捕起来，进行侦查，以期得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过这样一来，不仅李士群与叶言卿等人出乖露丑，声名狼藉，对南京政府来说也不好看。并且他们知道李确是因病而死的，也不愿把这件事情扩大。不过对日本宪兵的造谣诬蔑，必须立即停止并应该书面承认李确是因病死亡，并无别的缘故。他们和李士群生前也是好朋友，在他死后，为了顾全他的名誉，对他的家属的错误，也可曲予原谅。现在他们有一张书面声明，要大家签名承认，否则他们就要把叶吉卿、佘爱珍、储麟荪三人立即逮捕，何去何从，应该立即决定！于是大厅里便东一堆，西一堆地开起小组会议，窃窃私议起

来。这些人平时凶神恶煞一般，可这时在日本人面前，都像老鼠见猫一样，连骨头都吓软了。于是彼此相视了一下，以目光代替了语言，都乖乖地表示接受。这时叶吉卿虽在号啕大哭，想用此来回避签字，事实却容不得她，不仅日本人气势汹汹，即一群汉奸，也生怕事情会弄到自己身上，都连劝带逼地要她屈从，于是在这张纸上签了字，立下了城下之盟。

为了李士群之死，大汉奸头子汪精卫，曾感慨地对汪曼云说："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的！"汪精卫的感慨，暴露了他的真实思想：自己的命运与他手下"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正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于是才有这兔死狐悲之感！